

无论经济学家的思想观点正确与否，他们都比我们普通人看问题深刻得多。一些有识之士，深信他们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往往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快读大师

五十位顶级经济学家传略

冷兆松 主编

李嘉图

亚当·斯密

凯恩斯

卡尔·马克思

萨缪尔森

布雷德曼

马歇尔

利维

快读大师

五十位顶级经济学家传略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威廉·配第

李嘉图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食物，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马克思

“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

——马歇尔

卡尔·马克思

“在长期内，我们终将死去。”

——凯恩斯

马歇尔

责任编辑：孙 岩 戴玉龙

封面设计：红十月作家

ISBN 7-5017-6824-2



9 787501 768240 >

ISBN 7-5017-6824-2/F · 5449

定价：28.00元

五十位顶级经济学家传略

快读大师

冷兆松 主编

中国经济学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快读大师·冷兆松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5.6

ISBN7·5017·6824·2

I. 快... II. 冷... III. 经济学家—简介—西方国家

IV.K81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398 号

出版发行:中国经济出版社(100037·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www.economyph.com

责任编辑:孙 岩 戴玉龙(电话:81458038, E-mail:dayulongxp@yahoo.com.cn)

责任印制:张江虹

封面设计:红十月工作室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人民文学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2.875 **字 数:**295 千字

版 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7-6824-2/4·5449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68369418 68319282

服 务 热 线:68344225 68369586 68346406 68309176

68353624

前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冷兆松

经济学家无论其思想观点正确与否，他们对经济生活和经济问题的观察，都比我们普通人敏锐而且深刻。为了传播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本书把这些凝结着人类精神文化遗产的精华奉献给所有的人，特别是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人们。

经济学的兴起，是在世界神圣法则的图景褪色之时，人们对“自然秩序”研究的一个成果。今天的人们 应该用没有成见的眼光，去找寻当代经济理论的根，去重新发现那些古老的景象和我们不该遗忘的事实。

本书的特点在于，打破既往经济学说史著作的一贯模式，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中出现的著名经济学家的重要理论思想和观点，以新颖的体例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论述。

本书所呈现的是一个山峦起伏、峰岭交错的整体画面。我想，如果一个人在有生之年能够尽可能多的将获取的文化宝藏传给世人 那么他是幸运的 因为这种丰富的宝藏 是滋养我们心灵的甘露，也是延续我们生命的源泉。她将使所有的人都能够知晓并体验人类的高贵品质，明白人类是如此伟大。

同时 也把本书奉献给戴玉龙先生 正是他辛勤的耕耘 才使我们收获了这份礼物。

威 廉 • 配 第

William Petty (1623-1687年)

英 国 古 典 经 济 学 创 始 人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和“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他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马克思

“配第比亚当·斯密更好地阐明了级差地租。”

——马克思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 年), 英国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 , 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他出生于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 , 从事过很多职业 从商船上的服务员、水手到医学、解剖学以及音乐教授。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他拥护革命 并担任了英国驻爱尔兰侵略军总司令的侍从医生。后来在他担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时 , 狂掠夺了约 5 万英亩土地 使他成了新发家的英国地主。英国复辟时期 , 他又转而投奔国王查理二世 , 而且取得了男爵称号。配第晚年成了拥有 27 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 , 还先后创办了渔场、冶铁和铝矿等企业 , 同时也做投机生意。作为政治活动家配第是毫无品德的 , 善于投机和见风使舵。正如马克思所说 : “ 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豪无气节的冒险家。 ”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是资产阶级与新贵族结成联盟 , 所以配第的新贵族身份并没有妨碍他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出贡献。配第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功绩在于他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最基本的命题 , 从而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从配第开始的。



言 论

1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2

“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

3

“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到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和以前一蒲式耳五先令的价格是一样便宜。”

4

“假定这一个人前往生产白银的地方，在那里采掘和提炼白银，然后把它运到另一个人栽培谷物的地方铸成货币，并假定这一个人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也能够得到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衣服，我认为这个人的白银和另一个人的谷物，价值一定相等。假定前者所有的白银为二十盎司，后者所有的谷物为二十蒲式耳，那么，一蒲式耳谷物的价格就等于一盎司白银。”

5

“工人之所以注定要生产剩余产品，提供剩余劳动，不过是因为人们强迫他用尽他全部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以使他本人得到仅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

6

“我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要违背世俗的习惯，努力于限制利息，都是没有理由的，除非制定这种法律的是借者而不是贷者。但是，制定违反自然法则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

7

“土地价格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即一定年数的年租，或者说，一定年数的地租总额”



学术思想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创始人，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配第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主要的成就是在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

配第在经济学上一个重大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基础。他接受了霍布斯“劳动是财富源泉”的观点，认为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商品交换以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主张用劳动时间测量商品的价值量。此外，他还提出价值量的大小是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观点。他把前人有关价值论的零散见解系统化为一个整体，从而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他也因此成为劳动价值论的奠基人之一。

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

际上就是指商品的价值，政治价格则是指商品的市场价格。他说，假如一个人在能够生产一蒲式耳谷物的时间内，将一盎司白银从秘鲁的银矿中运到伦敦，那么，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两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一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谷物一蒲式耳十先令的价格，和以前一蒲式耳五先令的价格，是一样便宜。他还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家中，他最初认识到劳动分工会引起劳动生产率相应变化，以及劳动生产率变化会引起价值量相应变化的关系。与重商主义不同，配第不仅认识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而且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量决定的。马克思指出：配第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比较量来确定商品的价值。

配第认真研究经济现象背后所隐藏的规律，要研究为什么一定量的商品恰好换取一定量的货币。为此，他把劳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金银的劳动，一类是生产其他普通商品的劳动。在他看来，并不是一切劳动都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能直接生产交换价值，至于其他种种劳动，只有在这些产品同金银交换时，才产生交换价值。他还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地租和利息。配第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并试图以此为基础求证剩余价值的实质，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配第把工资和生活资料的价值联系起来，提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按照他的观点，一日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劳动者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配第在进一步阐明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时，并且规定了两个因素，即自然的限度和由气候决定的支出量。马克思在评论他的工资理论时曾指出，根据配第的见解，工人之所以注定要生产剩余产品，提供剩余劳动，不过是因为人们强迫他用尽他全部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以使他

本人得到仅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

配第从劳动价值论和工资论出发，提出了地租理论。这也是配第分配论的中心问题。他实际上把地租当成了他并不真正了解的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配第认为，工资加上种子就是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如果从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了这种生产费用，剩余的部分就是地租。在他看来，地租就是产品价值除去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种子）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余额。配第认为，剩余价值只有两种形式：土地的租金（地租）和货币的租金（利息）。他不仅把剩余价值和地租混为一谈，而且还把作为剩余价值的地租与独立生产者的生产品在扣除消费后的剩余混为一谈；但是，他却第一次论述了地租和工资之间的对立关系。

配第是最先提出级差地租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提出同等面积的土地因其肥沃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的概念，而且提出同等肥沃程度的土地由于距离市场的远近不同而产生的级差地租的概念。因此，马克思评价说：配第比斯密更好地阐明了级差地租。但是，由于配第混同了地租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能了解地租的本质，所以，只是分析了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而没有能够分析级差地租产生的真正原因。

配第认为利息是地租派生的，称利息为货币租金。他认为，每个货币所有者都能够购买土地并收取地租，所以，货币应当跟土地一样会产生收入。这就是说，货币所有者不用自己的货币购买土地，而是将它贷放出去，而贷放出去的货币就要收取利息。利息水平应当由货币的供求来决定。由于他把利息看作是地租的一种形态，因此他又很自然地把利息率的高低看作是由地租的高低决定的。

配第还是古典派国家经济职能和财政理论的奠基人。他的有关思想对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有重大影响。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民应当从其劳动收入和土地收入中缴纳一部分充作公用，其中出自土地的部分即土地税

收。配第揭示出了土地税收的最终来源，认为土地税收来源于地租及其派生收入，而地租是劳动剩余物，是劳动创造财富扣除劳动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费用之余额。在此基础上，配第提出了征税的一般原则，即：公平、便利、节省原则。这些税收原则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后来为斯密所继承和发展，成为长期奉行的税收原则，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主要著作

《政治算术》

《政治算术》大约写成于 1672—1676 年间，出版于配第死后的 1690 年。无论从政治经济学还是从统计学来说，它都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重要著作。马克思曾经指出：配第的《政治算术》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

《政治算术》的内容包括一篇序言和十章，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有关英、法、荷三国的“财富和力量”即国力的对比的十个问题。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荷兰与法国的国力对比来说明，小国尽管领土小且人口少，但如果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众多、领土辽阔的国家相抗衡；而且，如果赋税的征收和使用合理，会使王国的财富增加。第二部分从总体上对英、法两国的实力进行分析，说明英国的人口和领土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同法国的人口和领土有大体相同的重要性，分析了两国领土面积的差别不是重大问题，主要应看财富生产和产业收入。第五章至第十章是第三部分，从各个侧面说明了英国在实力竞赛方面完全可以获胜。

配第是由重商主义向古典学派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清楚地反映出这种过渡的特点。在配第的一些著作中

还存在着浓厚的重商主义见解。在此书中，他还专门论述了殖民扩张的主张 热烈颂扬和拥护殖民制度。《政治算术》一书还标志着统计学一个分支学派的初步创立，他使用社会宏观数量对比和分析的方法揭示了统计学所要研究的内容。

《赋税论》

配第的价值论主要发表在 1662 年出版的《赋税论》中。他是在分析英国当时的财政和税制问题时，提出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观点的。他首先把商品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商品的价值）和“政治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并认为前者是后者上下波动的中心。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消耗的劳动所决定的，商品交换要以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他的认识，大大超过了重商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对配第在劳动价值论上的这一贡献，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在《赋税论》中，配第坚决主张实行间接税，认为课税可以防止货币流出国外。在他看来，金银宝石就是财富，他写道：产业的巨大和终极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它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配第也按照重商主义的精神来看待人口问题，认为人口的稀疏才是贫困的真正原因。配第在《赋税论》中表达的思想对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有重大影响。

（埃多安娜）

大 卫 • 休 谟

D a v i d H u m e (1711-1776 年)

早 期 货 币 数 量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除了一般的经济哲学之外，休谟对于特殊的经济学观念的原创性贡献集中地表现为货币理论和国际贸易……休谟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对于作为货币和贸易的诸多经济的和政治的数据和问题之一部分的心理因素的强调。”

——里昂惕夫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1711—1776 年) , 是 18 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 , 不可知论的创始者 , 同时也在经济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休谟出身于爱丁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 ,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对文学产生了极高的热情 , 这种热情是他一生中的主要情感 , 而且是他快乐的无尽宝藏。他因为好学、沉静而勤勉 所以众人都认为法律才是他适合的行业。不过除了对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外 , 他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遏止的嫌恶。曾经由于家资微薄而试图从商 , 不过几个月后 , 就觉得那种生涯完全不合他的脾胃。于是到了法兰西 , 在乡下隐居 , 从事研读 , 在那里奠定了他一生的大计。 1763—1776 年 , 休谟担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秘书 , 结识了法国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尔哥及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达兰贝尔等人。休谟还是亚当·斯密的亲密朋友。在他晚年知道自己将要死亡的时候 , 他的精神却没有一刻消沉 , 正像他在《自传》中写的那样 , “ 我的研读仍像以往那样热烈 我的谈笑仍如以往那样快活 ” 。休谟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影响是其货币数量论 , 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比较有体系地阐述货币数量论的西方学者。



言 论

1

“利息就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就是人民兴旺的几乎屡试不爽的标志。”

2

“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钱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

3

“海外贸易的好处：既使臣民富裕幸福，又使国家国力强盛。对外贸易能够增加国家的产品储备，君主可以从中把他所认为必需的份额转用于社会劳务。对外贸易通过进口可以为制造新产品提供原料，通过出口则可将本国消费不掉的某些商品换回产品。”

4

“严格地说，货币并不是一个商业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人们约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换的工具。它不是贸易机器上的齿轮，而是一种使齿轮的转动更加平滑自如的润滑油……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量劳动与商品的方法。”

5

“一般公认，国家的昌盛，黎民百姓的幸福，都同商业有着密切难分的关系，尽管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以认为彼此之间并无制约互赖的关系。而且，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来。”

6

“我们不必担心工业的资源会枯竭，也无须忧虑我们的制造工匠因和邻国的工匠仍然处于同等水平而有失业之虞。各国之间你追我赶的竞争，反倒会使各自的工业蓬勃发展。”



学术思想

作为西方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巨匠，休谟主要是以其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思想闻名于世，但他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论著。对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问题的分析对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思想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形成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休谟经济思想方面的最突出贡献是货币数量论。按照这一理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休谟写道：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起伏。看来这是不言自明的原理。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就涨价。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都具有相反的倾向。不过，休谟这里所说的“商品”，指的只是处于流通中的商品，而不包括堆放在仓库中不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而他所说的“货币”，指的也是处于流通中的货币，而不包括窖藏中的货币。在他看来，

不进入市场的商品和不进入流通中的货币，对于商品的价格的升降是不起作用的。

休谟把金属货币理解成铸币，又把金属铸币理解为单纯的价值符号。他说：十分明显，货币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他还进一步认为，货币对劳动和商品的关系，也不过是一种数量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休谟对商品的价格和流通中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休谟的货币数量论表述了三点结论：（1）一国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2）一国流通中的货币量代表国内现有的全部商品量；（3）如果商品增加，商品价格就降低，或者说货币的价值就提高。相反，如果货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提高，或者说货币的价值就降低。

休谟的货币数量论与他的自由贸易论密切相关。休谟认为，在国内保持过多的货币，对于开展对外贸易，对于出口商品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货币一多，百物昂贵”，必然会降低英国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妨碍商品出口。不仅如此，休谟还指出，国内商品昂贵，会无法阻止国外商品过量入口，最后导致不该有的大量货币流向国外。他假设说，如果英国的全部货币在一夜之间增加四倍，我们的一切劳动和商品就会贵得出奇，以至于所有邻邦没有哪一个能买得起。在另一方面，如果别国的商品相形之下变得便宜，不管我们制订什么样的法律都无法阻挡这些商品的走私入境，从而使我们的货币外流，直到我们的货币量下降到和别国相等，把那种曾使我们蒙受如此不利的巨大财富优势完全丧失为止。休谟还研究了一国贸易平衡以及贸易与货币数量和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考察了货币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及其变化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并从这个角度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在他看来，自由贸易必然导致货币的综合平衡，贵金属的数量与财富并没有关系，关键在于市场功能是否发挥得当。为此，休谟主张促进商品流通，发展贸易往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际

化。他认为国际自由贸易肯定会为一国带来稳固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并最终促进本国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经营改进，从而使得生产更具竞争力。总之，休谟认为社会繁荣的根源不在货币本身，而在社会习惯、生活方式、欲望的满足等文明社会的内在机制。

除了贸易论和货币论，休谟还针对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发表了自己的深刻的看法，涉及到赋税、利息、社会信用等很多方面。例如，利息高低问题一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争论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问题上，休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休谟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减与利息没有实质性的关系。他说，同样的利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与本金相应的同样比例，不论货币量如何变化，都不会影响这个比例。所以，想从一国所有的金银量的多寡中寻找利息率涨落的原因，实在是徒劳的。休谟分析了导致利息高低的原因，指出，利息率的高低主要是决定于可用来借贷的货币，即借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如果借贷需求大，而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资本少，则利息率就会升高；反之，如果借贷需求小，而可供借贷的资本多，则利息率便会下降。同时，利息率不仅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于经商所获利润的大小。在《论利息》一文中，休谟提出，如“经商的利润高”，则利息也就高；反之，如“经商的利润低”，则利息也就低。休谟认为高利息率和高利润是工商业不发达的表现，一旦工商业发展、资本增加，利息和利润就会降低。他说：利息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是人民兴旺的屡试不爽的标志。

休谟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卓识见解，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和他有着亲密交往关系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当然，斯密作为伟大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系统化者，对休谟的经济思想也并非是完全赞同的。



主要著作

《休谟经济论文集》

休谟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大量经济论文之中，本书是从休谟的经济论文中精选出来的，主要有“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均衡论”等，反映了休谟的主要经济思想。休谟在经济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货币数量论和新的利息理论。货币数量论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数量比例，在利息理论中他认为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和需求，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无直接关系。此外，他对贸易均衡理论也有独到见解。

在“货币论”一文中，休谟着重阐述了货币数量理论。他认为，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只是一种代表劳动和商品的象征，一种评价和估计劳动和商品的方法。货币对劳动和商品的关系，也不过是一种数量关系。一切东西的价格取决于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比例，任何一方的重大变化都能引起同样的结果——价格的波动。商品增加，价格就便宜，货币增加，商品价格就上升；反之，商品减少或货币减少也有相反的变化。休谟用货币数量论来反对重商主义中将货币等同于财富的观念，认为货币数量的多少并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影响，更与财富的多少无直接关系。

休谟在“利息论”一文中提出利息率的高低与货币数量的多少无直接关系。在利息和货币资本之间的比率已知的条件下，用货币表示的利息的价值和用货币表示的货币的价值都会随货币价值的升降而升降。因此，货币的价值不会影响到利息率水平。休谟认为，利润与利息密切相关，他将利润看作是利息的基础，将利息看作是利润的派生物，但认为二者并不存在

着因果关系。他为了维护工业资本的利益，还主张实行降低利息，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张瑶)

布 阿 吉 尔 贝 尔

P. Boisguilbert (1646-1714年)

法 国 古 典 经 济 学 的 创 始 人

“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

——马克思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 (P.Boisguillebert,1646—1714 年) 生于法国北部诺曼底省卢昂的一个律师家庭 , 他本人后来也成为律师 ,1678 年谋得子爵称号 ,1689 年他又担任卢昂地方法院裁判长和陆军中将职位。从 1690 年起 他担任卢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在他当法官期间 曾审理过许多与农民有关的案件 , 因而对法国农民和农村的经济状况有很深的了解。布阿吉尔贝尔坚决地为农民的利益辩护 因而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 说他“ 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 , 却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 ” 。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古典经济学先驱者中的典型代表。他的思想是法国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的反映。这种过渡不是渐进式的 , 而是以同重商主义彻底决裂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很多 , 主要有《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法国详情》、《法国详情补篇》、《法国的辩护书》、《谷物论》、《货币缺乏的原因》等。



言 论

1

“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

2

“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一个国家愈富裕，就愈可以不需要硬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硬币可用一张名为纸币的纸来代替。”

3

“统治者的贤明或无能对于国家财富的影响，不亚于土地的肥沃程度和自然气候的条件。破坏经济秩序规律一定要受到惩罚。”

4

“就像四种要素是万物的本质，万物赖之以形成一样，欧洲一切财富的整个基础就是小麦、酒、盐和布，因之，法兰西的一切财富便分为两类，即农产品和工业产品。”

5

“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

6

“人们日夜当作偶像来膜拜的金钱，实际上本身完全没有

任何用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

7

“虽然法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了银钱，虽然法国到处穷奢极欲，糜满仓流；但由于这只限于某些人，而绝大多数人已经处于赤贫的境地，所以某些人的富有并不能补偿国家绝大多数人的损失。”

8

“所有行业形成了一条财富的链条，只有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价值，一旦从中脱掉一个环节，它们就会失去价值，至少会失去大部分的价值。”

9

“财富就在于一方把自己的多余物给另一方以换回对方充裕的东西这种连续不断的交换；它只是在人与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甚至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相互调剂、融合的结果。”



学术思想

布阿吉尔贝尔是法国古典经济学中的典型代表。他重视农业的思想为后来重农学派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从而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者。

布阿吉尔贝尔对农业的重要地位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财富是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一切财富的来源就是土地的耕种。”农业衰落则其他行业也会随之衰落。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成为财富。他认为，一国之国力和财富的基础不是城市居民，而是与

健康的农村居民，国家财富与土地的肥沃程度、自然气候的好坏成正比，要使国家强大必须使土地能够生产出更丰富的物资。

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要增加社会财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他指出，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从而稳定国王收入的经济协调，就决不应该使某一部分的发展超过其他部分；这就是说，必须使一切贸易往来这样均衡发展，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同样得到好处，各得其所。他指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地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它们形成了一条财富的链条，只有组成链条的各个环节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才有价值，一旦从中脱掉一个环节，它们就会失去价值，至少会失去大部分的价值。

布阿吉尔贝尔强调消费和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当时法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赋税太重使农业遭到破坏。他呼吁减轻赋税，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如果我们看到一块以前耕种得很好的土地而现在却全部荒废了，这就是因为土地的产品不足以支付某些新的赋税，只得放弃耕种；于是就破坏了一切靠它为生的人们的生活，而在全国却没有一个行业不是靠土地的产品来维持生存的。他在分析法国整个社会经济时指出，法国国民收入锐减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他说，“消费和收入只是一种同样的事物，破坏消费就是破坏收入”，“大量的消费会得到大量的收入”。他还举例说明消费对增加收入从而对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布阿吉尔贝尔清楚地认识到消费和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认为只要税收合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就会提高；从而增加消费，进而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他揭露了封建国家以过重的税收和压低谷物价格损害农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破坏，极力宣传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当时发展经济的要求。

布阿吉尔贝尔论述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他力图从经常变动的市场价格背后寻找“真正的价值”。他用个人劳动时间

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的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这就是说，他认为社会上的劳动应当依据正确的比例分配于各生产部门，使社会生产和需求保持平衡。如果某一部门分配的劳动过多，这一部门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多，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降低，过多的劳动就会从这一部门转移出去；而另一部门如果分配的劳动少，生产的商品就会少，商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上升，就会吸引一部分劳动到这一部门来；通过自由竞争各部门就能达到按比例地分配劳动，从而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费的劳动时间决定。他贬低金银，而重视农业劳动，实际上是把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归结为土地生产物。可见，布阿吉尔贝尔在宣传农业的重要性中，已经有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萌芽。

布阿吉尔贝尔轻视货币，贬低金银，甚至对货币持否定态度。他斥责重商主义的金银拜物教说，指出将金银当作财富和生活的惟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他认为货币本身并非财富，货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于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这表明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承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布阿吉尔贝尔甚至主张保存商品交换的同时废除货币。他说，如果各种商品价格符合于各部门分配的劳动，而且相当稳定或者变动很少，并到处都可以按比例交换，那就可以不用贵金属做货币，直接进行物物交换。他认为把货币用作交换手段，破坏了商品按照“真正价值”所进行的交换，破坏了商品的再生产。他说，由于统治者把货币当作财富而极力追逐货币，因而肆意加重赋税。这样，货币就成了人民不幸和农民贫困的基本祸害。同时，由于追逐货币，买卖双方尔虞我诈，这就破坏了商品按一定比例的交换，从而使各行业生产萎缩。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涉及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对后来的魁奈、斯密以及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使他成为法国古典经济

学的创始人。由于他的经济理论中首次强调了信息和预期的重要性，因而也被当作孔狄亚克思想的先驱者。



主要著作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

《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是布阿吉尔贝尔的主要著作之一。作者着重批判了重商业主义关于财富和货币的观点，以及他们所推行的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追求货币的财政和赋税政策。

在著作中，作者首先阐述了对财富性质的看法，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指出给人们带来富裕和丰足的不是所占有的土地的幅员，也不是所拥有的金银的多少，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被称为财富的结论。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批判了重商主义者对金银的崇拜，论述了所谓“金银的真实职能”问题。指出，无论现在或过去，金钱只是领取商品的一种手段。金钱本身无任何用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的自然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且，金钱也不是惟一使用的货币材料。

作者还分析了金银超出它的自然职能，对农业以至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指出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不劳动却享受着应有的快乐；另一个阶级从早到晚地劳动着，却常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金钱迈出了超出其自然职能的第一步。此外，本书还研究了什么是真正的财富，特别强调保持各种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平衡并以此作为致富之道的重要性。

(韩笑妍)

魁 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年)

法 国 重 农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马克思

“魁奈的人口论思想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先驱。”

——熊彼特

“《经济表》是人类继文字和货币发明后的第三大发明，在经济学说史上所占的地位不亚于血液循环的发现在生物学史上所占的地位。”

——米拉波特

弗朗斯瓦·魁奈 (francois Quesnay, 1694—1774 年) 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巴黎附近一个地主兼律师的家庭, 13 岁时丧父, 16 岁时外出谋生和学医, 后回乡作外科医生。一生研究过多种学科, 如化学、植物学、数学和哲学等 擅长医学 曾获有博士学位 发表过一些医学和生理学方面的著作。1749 年魁奈被任命为宫廷的御医, 1752 年因治愈王子的疾病被封为贵族。魁奈 60 岁左右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当时法国的舆论集中在经济问题上, 尤其是关心当时促使人民破产的谷物价格和赋税问题。1757 年, 魁奈写了两篇经济论文《农夫论》和《谷物论》, 发表在当时著名的《百科全书》上。魁奈的第三篇论文是《人类论》 在这篇论文中, 他提出了与重商主义者的论点相对立的意见。大约在同年 魁奈又写了一篇《赋税论》 主张改革税制 实行单一税。1758 年 魁奈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 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魁奈强烈地反对唯物主义。虽然他的哲学观点沉溺在封建时代的偏见中, 但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 却是开拓新途径的天才革新家。尽管他有许多思想是从他前辈那里吸取来的, 但他独创了深刻而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对魁奈的这一功绩, 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魁奈的著作主要有《百科全书》、《农民论》、《谷物论》、《人类论》、《租税论》、《利息论》等。



言 论

1

“要复兴我们的农业，只能以人口的稳定为前提。”

2

“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

3

“靠奢侈维持的工业与商业，在大城市里聚集了许多人和财富，但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使农村荒芜，并刮起了轻视农业之风……其结果必使国家衰亡。”

4

“人口增长完全决定于财富的增加，财富和人口只有在由财富本身造成的富足生活条件下才可能维持；反之，如果财富和人口的比例遭到破坏而人口显得较多的话，这种人口过多将促使国家愈加贫穷，工资将成比例地随着人口增加而下降，消费将成比例地随着工资的下降而下降。”

5

“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量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耕地种植者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多得多。”

6

“在一个受到美好统治的国家里，为了防止人满为患，除了在良好管理的保护下能够开拓殖民地作为其出路以外，没有其他出路。……在这个帝国的邻毗地区，有许多在以往某个时候曾被欧洲人占领过、现已被抛弃或部分荒芜的大岛屿。这些地方对于中国的过剩人口来说，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吗？确实，爱国主义或对祖国的热爱，在中国人中间是如此强烈，致使他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看来政府也没有引导他们走向那条道路。”

 学术思想

作为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纯产品学说是魁奈理论体系和经济纲领的核心和基石。魁奈断言：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这是贯穿于魁奈全部经济著作之中的基本理论思想。

魁奈认为，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补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之外的剩余产品就是纯产品或收入，这导致财富的增加。在这里魁奈所注意的只是使用价值，纯产品表现为剩余农产品。但在商品生产社会里，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不仅仅应具有使用价值，而更重要的是具有价值。实际上，魁奈的“纯产品”是不得不以价值的形式来表现的。重农主义者虽然坚持等价交换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正确的价值见解，这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一个严重缺陷。但是，魁奈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理，这就是：纯产品即剩余产品不是流通领域而是生产领域创造出来的。马克思对此高度评价说：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基础，对社会阶级结构提出了三个阶级划分的独到的见解：（一）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其中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这个阶级是社会全部经济运动的指导者。（二）土地所有者阶级，其中包括地主及其从属人员、国王、官吏、僧侣等。（三）不生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和工人。魁奈不是从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使用的情况来划分社会成员的不同阶级，这就使他的阶级划分理论不能科学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按照他的阶级划分理论，生产阶级不只包括农业劳动者，而且也包括农业资本家；在不生产的或不结果实的阶级内，不仅包括了工商业资本家，而且也包括工商业劳动者，这就掩盖了农业资本家、工商业资本家与农业雇佣劳动者、工商业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本质区别，掩盖了劳动者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然，处于 18 世纪的魁奈能作出阶级和阶级关系的研究，把阶级划分同生产联系起来，试图从社会经济关系中研究人们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理论贡献了，这对后人的经济理论研究有很大启发。

魁奈认为只有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生产，并把农业看作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他认定只有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资本，而工业资本则是非生产资本。至于商业资本，魁奈毫不掩饰地采取了仇视的态度，认为只有在贱买贵卖的欺骗行为中才能存在商业利润。魁奈把农业资本分为两个部分：（一）年预付：每年预付出去的部分，如种子、肥料和工人工资等；（二）原预付：几年预付一次的部分，如耕畜、农具、仓库、房屋等。魁奈的这种划分是从再生产角度出发的，所以这种划分只适用于生产资本，而不适用于流通资本。

《经济表》是魁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经济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表》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独创的天才的见解。第一，《经济表》的出发点是土地上每年生产出来的总产品，它是以一年收获的终结作为循环的开始。这表明

魁奈分析再生产的基础是正确的。第二，在《经济表》中，魁奈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第三，《经济表》对生产资本的划分及其补偿的创见。在《经济表》所表现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社会各阶级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的交换，再生产的消费和个人的消费，并且把生产的两大部门即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流通看作是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这种分析，对于科学地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是富有启发作用的。

魁奈还对人口问题提出见解。他认为，一国的人口是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财富的增加在先，人口增加在后，只有财富增加，人口才能增长，财富对人口增减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就形成了与重商主义者截然相反的观点。在论及人口的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时，魁奈强调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认为生产是为了消费，只有通过消费产品才能成为商品。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魁奈指出：第一，人口众多而稠密；第二，因人口多而造成大量居民的贫穷。基于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魁奈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人口的增殖比财富的增长快，而人口过多便会导致国家的贫穷。此命题对后来的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魁奈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心和重视，还表现在他设想为中国的“过剩”人口寻找出路。他提出用禁止早婚来抑制中国人口增长的办法，后来马尔萨斯人口论中称之为预防性的“道德的节制”与此观点很相似。

魁奈关于经济政策的总原则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提倡生产（主要是耕作）和贸易领域的自由放任或自由竞争。具体表现为：(1) 自由放任。他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健康与否就看它是否符合“自然秩序”的标准。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阐明这种客观的经济规律，使“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要实现这样一种自然秩序的状态必须依靠竞争和自由放任。(2) 维护私有制。他反复强调私有制是符合“自然秩序”

的，私有制的安全是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3）实行大农业经营他认为小农业经营想获得很大的利益是不可能的，应该把土地集中形成大农业经营。（4）整顿税收。他主张只向土地所有者阶级征收一种单一的地租税，废除其他赋税。也就是，只向土地所有者阶级得到的那部分纯产品征税。此外，实行单一租税还可以简化税制，大大降低征税成本。



主要著作

《经济表》

《经济表》是魁奈经济体系的全面总结，它不仅概括了魁奈的理论和政策观点，还是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问题进行分析的首次尝试。在《经济表》一文中，通过严密的数字分析及论证，揭示了社会“纯产品”在各个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规律，进而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说明农业是惟一创造价值的部门，为统治者进行经济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其目的是反对重商学说，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就研究对象而言，他和配第一样，把数字作为“语言”，通过总量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规律，“是把农业在一年中所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作为循环的出发点”，分析其在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情况。

魁奈的《经济表》以他的“纯产品”学说为基础。魁奈认为，土地是提供财富的惟一源泉，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增加财富，这种财富即为纯产品。他根据“纯产品”学说，把社会分为三个阶级：（1）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因为只有他们才生产“纯产品”；（2）土地所有者阶级，即占有“纯产品”的阶级，其中包括君主，官吏，教会人员等；（3）不生产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

因为他们不生产“纯产品”。魁奈的经济思想也有其自身局限性，他提出的“纯产品”学说把“纯产品”看成是土地的创造物，割裂了“纯产品”与工人劳动之间的关系，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劳动的事实，这是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思想。

(埃多安娜)

亚当·斯密

A d a m S m i t h (1723-1790年)

古 典 政 治 经 济 学 体 系 的 奠 立 者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马克思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年) 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 , 是工场手工业和产业革命前夕集大成的经济学家 , 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创建者 , 素有 “ 现代经济学之父 ” 和 “ 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 的称号。亚当·斯密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克科第。他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14 岁考入当时苏格兰的工业中心——格拉斯哥大学 , 学习数学和哲学。 17 岁时转入牛津大学。于 1748 年到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与文学。 1751 年返回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 , 次年担任道德哲学讲座。他的伦理学讲义在 1759 年作为《道德情操论》出版 , 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 1764 年他辞退了大学教授的职务 , 担任布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在此期间 , 他结识了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重农学派代表魁奈和杜尔阁等名流 , 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1767 年他辞去私人教师的职务 返回家乡克科第专心创作《国富论》。 1776 年斯密出版《国富论》。《国富论》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划时代的、不朽的名著 它的问世标志着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富论》以其严密的结构、深邃的结论、通俗生动的文字和精彩广博的例证引起了世界的轰动 , 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学 , 而且囊括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在该书里 , 斯密构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 概括了古典经济学在它的形成阶段的理论成就。 1778 年 , 斯密出任爱丁堡的海关专员 , 1787 年一度出任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 , 终身未娶。



言 论

1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2

“任何人都会向他人提议进行某种交易。每个提议都是这样的：把我想要得到的东西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们正是以这种方式相互从他人那里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更大的利益。”

3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 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 物物交换 互相交易。”

4

“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5

“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食物，并不是因为屠夫、酿酒师或者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针对的不是他们的人性，而是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也从来不对他们谈起我们的需要，而只是谈到他们的利益除了乞丐，没有人愿意以他人的恩赐为生 ”

6

“ 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的安乐，仅仅是他的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更大 ”

7

“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地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

8

“ 正是这种骗人的东西，激起人类的勤勉并且使其继续行动下去，正是这种东西，首先鼓励他们（即人类）种土地，建筑房屋，建立城市和国家，并且发明和改进科学与艺术，提高和装点人类生活，完全改变了地球的全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景色宜人而肥沃的平原，并使人迹不到和一片茫茫的海洋成为取得生计的新源泉，成为通达各国的康庄大道。 ”



学术思想

斯密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早有定论。作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和集大成者，斯密综合了许多前人的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创见形成了比较成熟完整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奠基人，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斯密常借人体和社会的类比来说明自然秩序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发挥着作用。他认为，人常有疾病，但人身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可以使身体恢复健康。同人的身体一样，社会内部也有一种力量，保证和调节社会的运转。对于这种社会内在的调节力量，斯密常常用“自然”这个字眼来表述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他说：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斯密把自然规律和自然秩序作为第一位的东西，并认为，在社会领域，虽然自然秩序高于人的理性，但自然秩序又必须通过个体经济人的理性才能够得到实现。由自然秩序出发，整个社会有一种自然并且合理的分工秩序。因而，每个个体的人都在这样一个整体的自然秩序里面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只要每一个个体都尽可能充分地发挥了其积极性以追求自身财富的最大化，整个自然秩序也必然就随之水涨船高达到整体最优。这就是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

斯密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分工与交换学说。他认为，分工是提高生产力、发展和增进国民财富的主要途径和主要因

素。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成就、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是从人的交换本性产生的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是分工优越性之所在；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是分工的缺点之所在。斯密只看到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却忽视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分工的发展。

斯密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这是斯密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从劳动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这是很大的进步。这使他更加便利地对生产劳动部门与非生产劳动部门进行划分，也为劳动价值论的创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斯密还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区分了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并认为二者是不一致的。他认为，使用价值是特定物品的效用，交换价值却是指由于占有某物而具有的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物品交换价值的大小与其使用价值无关。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而是由劳动决定的。衡量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是劳动，不论哪个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斯密的价值论也充满着矛盾，他把劳动价值理论与其他价值理论混杂在一起，导致了价值的二元论。这是因为受资产阶级立场和眼光本身所限制的，在政治经济学形成初期也在所难免的。斯密自相矛盾的理论往往成为其后学者相互争论的起点，也成为其后各种学术流派最早的思想来源之一。斯密价值论中正确的价值规定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把它提到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可逾越的高度，并最终为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理论来源，而其各种庸俗成分则为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和流派承袭、发挥、演变为各种庸俗的、充满辩护性的价值理论。

斯密的货币理论，代表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斯密明确提出，货币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渐渐地

从“许多种类货物”中分离出来作为“共同衡量的标准”或“共同的价值标准”。他不仅肯定了货币的商品性质，而且从劳动价值论出发坚持货币的商品性质，这是其在货币理论取得成就的关键。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无法揭示价值的货币形式同商品的矛盾之间的联系，因而无法揭示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真正原因。斯密认为：金银价值对其他货币的比例，取决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对一定数量他种货物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比例。他还区分了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与价值标准的职能，认为前者是“价值的自然标准”后者是“数量的自然标准”。此外，在信用货币理论方面，斯密也颇有建树。他研究了信用货币的基础、信用货币的形式及作用。马克思说：斯密关于信用货币的观点是独创的而且深刻 的。

作为近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和经济自由主义的鼻祖，斯密的经济思想一方面强调对社会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另一方面强调对社会经济运动过程的分析，这两个方面都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和自然的，但也有一个蒙昧时期存在于人类社会成熟之前，私有制的产生使人类进入永恒社会，从此以后就只有生产的发展而没有制度的更替。斯密经济思想的论断曾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他之后到 20 世纪 30 年代大危机前的一百多年间，经济自由主义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宝座且被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奉为教条 甚至今天，一些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还为之津津乐道。特别在凯恩斯主义失灵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更出现了一股向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复归”的思潮。



主要著作

《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因而可以说是《国富论》的姐妹篇。《国富论》说的是经济人；《道德情操论》说的是道德人。《道德情操论》从道德的高度，阐述了以同情说为基础的道德评价论、德性论，其中包含道德准则和道德评价的共同标准及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强调。斯密认为，同情是人的本性，关心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的牵挂，这就是同情。斯密实质上是说 同情 利他 和利己同样是人的天性。因此 斯密认为，只有当全社会的成员都具有同情心，以此作为行为的准则时 社会才会有和谐、安定和进步。由此可见，《道德情操论》提出的问题是：以自利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必须用以利他为基础的道德情感来协调。人们之间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通过人的这两种天性来达到“利益的天然一致”。

《国富论》

《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光辉著作，是 18 世纪经济思想的顶峰。全书共为五篇。第一篇分析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问题。在这篇中，斯密从分工出发，研究交换、货币和交换价值，并对财富的分配情况即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行了分析。第二篇涉及“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在这篇中 斯密从资财中区分出资本这个范畴，分析了资本的性质，区分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考察了资本的各种形态，即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问题。在这篇里还对资本积累的情况进行

研究，并分析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第三篇论述了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问题。在这篇中，斯密研究了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探讨了中世纪欧洲农业的衰落和对社会繁荣的影响问题，分析了促进和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第四篇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这篇中，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认真分析了重农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贸易统制的理论阻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强调经济上自由放任。第五篇研究了君主或国家的收入问题。在这篇中，斯密论述了国家的财政对国民财富的影响。他把财政支出分为国防、司法、政府本身开支和教育等几个方面，主张实行廉价政府，减少政府开支，同时对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行公平征税，以增加国民财富。

在这本书中，斯密比以前一切经济学家更深刻得多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联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指出：“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孙夫才)

李 嘉 图

David Ricardo (1772-1823年)

英 国 古 典 经 济 学 体 系 的 完 成 者

“李嘉图的一生是短暂的，并且充满了追随他的人，而他所受到的正规教育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最贫乏的教育，这样，他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家的成就必须归之于天才。”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李嘉图(1772—1823 年) 是英国金融界的知名人士 , 社会活动家 , 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 , 也是古典学派的最后一名代表。他出身于伦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 在 14 岁以前只受过初等教育 ,14 岁以后随父亲在交易所参与实际工作 , 但是他与一名异教徒的婚姻导致了与父亲关系的决裂 , 被赶出了家门。此后 , 李嘉图仍然在交易所从事投机活动 , 由于他熟悉有关金融方面的业务 善于把握时机 善于经营 , 26 岁时已经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富有人物。此后 , 他开始进行科学的研究 对数学、物理、化学和地质学都非常感兴趣。不久 , 又对政治经济学发生了浓厚兴趣 , 钻研了《国富论》 并结识了亚当 · 斯密 , 在经济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810—1820 年 是李嘉图最富有成就的时期 先后出版了《黄金的价格》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等许多重要著作。《赋税原理》为他的代表作 逐渐为人们认可 成为畅销书 曾多次再版。 1819 年李嘉图成为议会议员 , 积极参加政治活动 , 要求实行选举改革 , 主张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 反对宗教专制。 1823 年 9 月李嘉图因脑病逝世。



言 论

1

“假如，苏格兰生产燕麦和酒的费用都比葡萄牙低，但是它生产燕麦比生产酒更有优越性，那么根据一定的费用比例和一定的交换比例，苏格兰单生产燕麦，葡萄牙单生产酒将是有利的。”

2

“社会中国民收入的分配好比分吃一个大小基本不变的馅饼。工人只从其中分得一小份，其余全归资本家所占有，然而资本家又不得不与土地所有者分享，而且后者所占的份额还在不断地增加”

3

“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稀少时就昂贵，丰裕时就便宜。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

4

“商品价值，即用来交换的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而不取决于支付这一劳动的报酬大小。”

5

“每一种商品价值的涨落都和它的生产的难易成比例，换

句话说，就是和它在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例。 ”

6

“ 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的公平而自由的竞争所决定，而绝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治。 ”

7

“ 劳动的自然价值是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 ”

8

“ 马尔萨斯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个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 ”

9

“ 我们通货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纸币的发行过多，由于给了银行一种危险的权力，让它可以随意减低每一有钱者的财产价值，并通过提高粮食和每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受领国家年金的人以及所有因收入固定而不能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其任何部分负担的人都受到损害。 ”



学术思想

李嘉图是 19 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重要和最突出的代表者，他把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发展到了最高峰。他的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全社会产品在

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法则。他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各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对立的基础上的。但是，他坚持认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从属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对立。其目的是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为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势力的斗争提供理论武器。

李嘉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是不明智的，主张给予经济以更大的自由、更大的民主，国家的职责只在于保证和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他指出，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实现经济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保证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并且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他指出，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追求的虽然是个人利益（利润），但是资本家获得利润又是为了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有利于发展生产和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要求，因此，资本家个人利益同社会经济发展、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

李嘉图赞同亚当·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并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同时又对斯密的价值定义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所分析的商品，不是人们劳动无法增加的罕见的商品，如图画、古钱之类，而是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他指出，前一种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买者的财富和嗜好，而后一种商品，由于供给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它不取决于供求情况而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减，即取决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变化。他强调：除非生产中所用的劳动量有增减，否则商品的价值决不会改变。李嘉图还论述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在价值形成中的不同作用，说明了复杂程度不等的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是不相等的，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概念。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贡献评价道：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

的表述和发挥。

李嘉图从工资学说出发把工资同雇佣工人的收入相联系，研究了工资数量的基础和工资变动的规律。李嘉图把利润看作剩余价值的惟一的基本形式，他把工资与利润相对应，把商品的全部价值划分为工资和利润两个部分。他认为，利润的变化取决于工资的变化，二者的变化方向是相反的。并以此揭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他认为工资的涨落只影响利润的大小，而不影响商品的价值。但是当他在探讨工资涨落对利润的影响时，却发现这个论断只适用于一种情况，即各个部门的资本都用在劳动上且各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是相同的；如果资本有机构成、耐久性、周转速度不同，在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条件下，工资的变动也会影响商品的价值。对此，李嘉图解释为工资的涨落对于价值的影响是微小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是一种偶然。

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发展了地租理论，研究了地租的性质、产生、变动等规律。他认为，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原有的不可摧毁的生产力而付给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产品，地租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就是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沃程度以及位置的差别性。他以从优到劣的土地耕种顺序和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来说明地租的产生。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少地多的最初发展阶段，没有人会为使用土地而支付地租，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人们不得不去耕种质量和位置比较差的土地，并因此而花费较大的劳动量，这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必然由耕种劣等地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与劣等地相比，较好的土地可以收获较多的产品，其产品价格在补偿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外还有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由地主所占有。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成为当时实行自由贸易，要求废除“谷物法”的有力武器。因为他的地租理论中有一个观点：人口和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会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这一方面使得地租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使得工人工资提高，从而导致利润的减

少。这就说明了地租和利润的冲突，指出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提出独创性的国际贸易学说，分析论证了自由贸易对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后人称之为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指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本国生产条件最好的产品的成本不一定比进口别国同类产品的成本绝对地低，只要本国的产品与其他国家产品相比较成本相对低就可以进行国际交换，这样贸易的结果，双方都可以得到较多的利益。因此，根据比较成本学说，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发展工业的比较成本最便宜，就应当发展工业，而其他农业国家只能发展农业，为英国等工业国家提供食物、原料和工业品销售市场。比较成本学说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同时也反映了英国对外扩张的需要。

李嘉图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资产阶级的成熟，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退居次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李嘉图的学说就不能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了，他的学说也就被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和两个阶级对立的学说所替代。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李嘉图最成功的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其重要性和影响可与斯密的《国富论》并列。本书首先研究了全社会产品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法则，为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残势力提供理论武器，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其次，本书宣扬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说明资本家是为了发展生产和

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满足社会需要，所以资本家个人利益同生产发展，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合理的、永恒的。

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在《原理》这部世界名著中完成的，它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发展到了最高峰。该书共 32 章，前 6 章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别为：论价值，论地租，论矿山地租，论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论工资和利润，其余部分是对原理的实际运用，解释和补充。全书主要研究分配法则，重点主要放在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上。只是时代与斯密不同，李嘉图是从分配角度讲怎样分配最有利于资本积累。该书思想上的一贯性，见解的深刻独到，使其成为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最高成就的标志。马克思对李嘉图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李嘉图的学说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

(刘荣)

马 尔 萨 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年)

英 国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创 始 人

“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 年) 是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最有名的理论是其人口论。马尔萨斯出生于英国萨立州的一个土地贵族家庭，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1798 年，32 岁的马尔萨斯在萨立州的奥尔堡当了牧师，同年他匿名出版了《人口原理》，从而博得统治阶级的青睐 他也因此而出名。1805 年 东印度公司在伦敦附近成立了东印度学院，马尔萨斯被聘任为历史和经济学教授。在这期间 他先后发表了《论谷物法的影响》(1814 年 和《地租的性质与发展的研究》(1815 年) 在这两本书中，马尔萨斯的一些经济观点已经形成，到 1819 年 他又写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 这是他政治经济学观点的集中表述，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写了《价值的尺度》(1823 年) 和《政治经济学定义》，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



言 论

1

“以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不能超过以算术级数增长的生活资料增加的限度，而达到此目的方法就是限制人口的增长。”

2

“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假定有 10 亿罢，人类将以 1, 2, 4, 8, 16, 32, 64, 128, 256, 512 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以 1, 2, 3, 4, 5, 6, 7, 8, 9, 10 那样的增加率增加。”

3

“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是无限地较为巨大。人口，在无妨碍时，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加……美国，比欧洲近世任何一国，都有更丰富的生活资料……那里，我们就发现人口每 25 年增加一倍……土地的生产，即令没有任何限制，得永续增加，至少比任何有限量为大，人口增加力也依然占着优势。”

4

“首先，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其次，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维持现状。这两个法规，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本性的固定法则。”

5

“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

或灾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虐待，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通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

6

“一个人出生到业已满员的世界，如果他不能在父母那里得到完全有理由要求得到的衣食，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什么食物，事实上他是世界上多余的人，在生活的盛大筵席上没有他的座位。大自然命令他滚开，并且毫不迟疑地执行自己的判决。”

7

“在人口的增长已经达到食物的最大限度时，一切预防的积极的抑制自然而然会以加强的力量发生其作用。……直到人口降低到食物水平之下。这时比较丰足的状态又回来，于是再度导致人口的增长。不过，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的进一步的发展又会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抑制。”

8

“在有限的地域里，土地产出的增长率必定是同人口增长率有大不相同的性质的。……假如有食物供应，人口将会以不竭的精力继续增长，而且前一个时期的增長将为后一个时期的更大的增長提供力量，如此推演下去无有穷尽。但是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实物的增長却遵循着另一种变动的趋势，当全部良田逐渐地被耕种之后，食物的每年的增加額必然要依靠已占有的土地的改良。从一切土壤性质来说，每年的这个食物的增加額，不但不会递增，而且必然会逐步递减，因此，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经常的趋势。”



学术思想

马尔萨斯是欧洲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是其人口论。他的人口思想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和学者们争论的话题。凯恩斯曾经对于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把近代有系统的经济思想的开端归之于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 18 世纪末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他提出人具有食欲和性欲这两个本性，并且给出了“两个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而且几乎会恒久持续下去。从这两个公理出发，马尔萨斯提出物质资料是按数学级数增长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两个级数”。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是不平衡的，前者要大于后者，所以人口的增长总比物质资料的增长要快。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绝对的人口过剩。

“两个级数”论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主要论据，也是人口论的中心内容。以此为基础，马尔萨斯还进一步提出两个“阻止”人口增长的手段或力量，即“两个抑制”。“两个抑制”包括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积极抑制指通过贫困、罪恶、饥饿、瘟疫、灾荒、战争等来阻止人口的增长。消极抑制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来阻止人口的增加。前者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手段，一般来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是一种人为的、自觉的、主观的手段。

马尔萨斯根据其人口自然法则，断言工人的工资水平完全取决于工人的人口数量。他认为，生活资料的增长总是有限的，当工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数量，劳动市场供过于求的时候，工资就要下降。工资下降引起工人生活贫困，促使工人减少生殖，停止人口的增加。同时，由于工资降低，工

人数量众多以及工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收入必须比过去加倍工作，这样又促使资本家发展生产。直接生活资料生产与人口数量恢复平衡，于是工资又提高。而工资提高又会促使人口数量增加，重复上述过程。马尔萨斯的这种理论完全背离了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态的本质，完全曲解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运动规律。

马尔萨斯坚决反对平等制度，他认为平等制度不能激励人们努力工作，不平等是克服人类好逸恶劳天性的惟一手段；平等制度还鼓励青年男女过早结合，推动人口增长，不平等制度使人们基于自身利益考虑，自动抑制人口繁殖，限制早婚，以摆脱抚养子女的道德责任。马尔萨斯还认为，在公有财产和平等制度下，人口自然限制将不起作用，而必须以国家法律制度来代替，法律制度下的人口限制办法加在每个人身上的道德责任及其措施比自然限制办法更加不近人情，所以，马尔萨斯反对由政府出面救济贫困 反对提高劳动者的工资。

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理论体系的两个矛盾——工人出卖的是劳动，无法从价值规律说明利润的来源；混同价值和生产价格，无法从价值规律说明资本构成和周转速度不同的资本为何能带来同样利润——否定李嘉图把这种矛盾说成是例外的说法，建立了自己的价值论。他还认真分析了价值尺度问题。指出，只有在仅使用劳动就能生产商品的场合，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才是价值尺度。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商品不仅使用劳动，还使用资本，使用资本就要求得到利润，利润就成为价值的一个因素。以此为基础，马尔萨斯又说明了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交换，资本能够支配比自身价值更大的劳动。这样，马尔萨斯就从发展斯密的价值理论走向了让渡价值论，得出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

马尔萨斯在供求原理的基础上，用有效需求理论来反对李嘉图等人的资本积累理论和销售理论。他认为只有增加供给的生产力与刺激需求的手段相结合，才能保证财富的持续增长，

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危机。他认为，促进财富的增长有三个重大的因素，即财富的积累、土地的肥力和节约劳动的新发明。但是，这三个因素均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即都是使供给增加，而与需求无关它们对财富的增长不能提供充分的刺激，必须有需求的相应增长，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上述三个促进财富增长的因素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就会导致生产过剩，反而影响促进财富增长的因素发挥作用。因此，创造出与不断的供给相适应的充足的有效需求，才是财富增长的关键。

马尔萨斯指出，仅靠参与商品生产的资本家和工人不能提供充足的有效需求，因为商品价值由劳动决定，利润是由交换中产生的，这样，他就退到重商主义让渡利润的观点上了。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些“不生产的消费者”，因此资本家利润的实现成为了可能。由此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完全是为土地贵族阶级辩护的。马克思揭露了马尔萨斯作为当时土地贵族阶级代表的阶级意图：马尔萨斯愿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基础。



主要著作

《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用人口问题作为反对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革的工具，把人口问题曲解为是人作为生物所具有的情欲的必然结果，是由永恒的人口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失业和贫困的真正原因。在著作中，马尔萨斯分析了“道德抑制”和“积极抑制”在控制人口中的作用。

认为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低下，文化落后，“积极抑制”起着主要作用。而在近代社会，生产力有很大提高，理论作用加强，“道德抑制”逐渐起着主要作用。认为只有抑制人口增长方可可能改善贫民状况，要想取消对人口的抑制，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出版，引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重视，人口学说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科学。虽然现代西方的人口理论有很大发展，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仍然是承继马尔萨斯的体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

本书是马尔萨斯重要的代表著作之一，是为反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而撰写的，它包括一篇导论和两卷。第一卷共有六章。第一章“财富和生产性劳动的定义”，第二章“价值的性质、原因和尺度”第三章“地租”第四章“劳动工资”第五章“资本的利润”第六章“财富和价值的区别”。第二卷只有“财富的增长”一章，主要阐明他的市场理论和实现论，说明只有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土地贵族等，才能提供足够的“有效需求”，避免产生商品过剩危机。在书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一套以供求论为基干、生产费用论为补充、购得劳动论为特色的价值理论，竭力反对李嘉图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分配理论，否认地租与利润、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并在供求原理的基础上，用有效需求理论来反对李嘉图等的资本积累理论和销售理论。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论及的工资维持基金说和有效需求不足危机说，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影响很大。“工资维持基金”论被发展成为“工资基金”说，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被凯恩斯继承和发展，形成消费需求不足理论。

（吴琼）

西 尼 尔

William Senior(1790—1864年)

主 观 价 值 论 的 先 驱 者

“我开始强烈地感到，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斯密经由马尔萨斯到西尼尔的这一支是正确的一支。”

——杰文斯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年)是19世纪中期忠实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经济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的家庭里。幼时在伊顿公学读书。1811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最初从事律师行业，1825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教授，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学、贵金属、人口、货币、工资等问题的文章和讲演。1830年他离开牛津大学积极参与政府的各种委员会的活动。1832—1834年任职于一个研究谷物法的经营管理的委员会。1836年在平衡法院担任大法官职务并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大纲》。1837年参观兰开夏的纺织厂，并对关于工厂立法的情况进行讲演。1847—1852年，他又重新回到牛津大学当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关于财富生产的讲义、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初级讲义。1857年成为关于普通教育的皇家委员会的成员。1863年担任国民促进委员会科学委员会教育组主席。1864年因病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结论》、《人口论二讲》以及《论工厂法对于棉纱制造业影响的书信》等。



言论

1

“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利润是节欲的报酬。”

2

“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只是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即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欲，即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

3

“所谓生产成本，我们的意思说的是生产所必要的劳动与节制的总和。”

4

“决定国家的财富的，并不是土壤或气候的状况，也不是生产的有形手段的现有积累，而是这种无形资本的量及其普及程度。据说爱尔兰在气候、土壤和环境各方面都胜过我们，至少不比我们差。它的贫困主要是由于缺乏有形资本；但是如果将爱尔兰本地 700 万居民换成英格兰北部的同胞，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很快就可以形成。……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和智力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和智力上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它还处于缺乏教育的状态，其人民的愚昧和强暴使该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安全保障，使资本无法累积，无法运用。……据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理由说

知识就是财富。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和非洲北部沿海一带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足的地区，而今却要算是最困难的地区，这只是由于掌握着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没有足够的无形资源以保持有形资源。”

5

“不幸的是，政府大都认为它们的任务不仅在于提供安全，而且在于提供财富，不仅使其国民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下从事生产和享乐，而且在于教导他们应当生产些什么，应当怎样享乐，对他们作出指示，应当怎样处理他们自己的事体，并强迫他们遵守这些指示。”

6

“当国家的财富和人口有了增长时，对社会有利的是，使增加的人口专一致力于条件越来越有利的制造业，而不是从事条件越来越不利的农业。他们的生产效率即越来越高，一般说来，就可以用劳动和节制的某一定量的产品，来购得生产效率比较落后的其他国家的数额越来越多的产品。”

7

“流行的学说认为，人口增长具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或者，换句话说，无论现存的生产资料怎样，人口都有一种完全赶上甚至超过它的趋势，只有其所造成的罪恶和公库才会对其有所遏制。我承认人口具有这样的增长力，我承认，在不良制度的影响下，这种增长力会发生作用，使生活资料数量同人口数量的比例比以前要小；痛苦和罪恶的后果会依情况的不同，以大小不同的强度和范围出现。我所要否认的是，在良好的制度下，还会存在这种趋势。我认为情形正好相反。”

8

“ 我们用节制这个词所要表示的是这样一种要素 , 这跟劳动和自然要素不同 , 对资本的存在说来它的威胁是必要的 , 它对利润的关系就和劳动对工资的关系一样 ”

9

“ 在节制的原则下 , 放弃我们力所能及的享乐 , 或者是放弃切近的效果而追求遥远的效果 , 是人类意志上最艰苦的努力之一 ”



学术思想

西尼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转变时期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他是 19 世纪 30 年代最露骨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家。他的主张是把经济学变为一门 “ 抽象的演绎的科学 ” 和 “ 准确的科学 ” 。

西尼尔认为过去经济学的范围太广泛 , 不仅涉及一般立法和行政的领域 , 而且还包括了哲学、道德等方面的问题。他建议把立法、行政、哲学、道德等方面的东西完全从政治经济学中排除掉 , 使政治经济学成为只是研究 “ 财富的性质、生产、交换及分配的规律 ” 的科学。

西尼尔认为 , 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不过是从人们观察或意识中得到的一般的、主要的、不变的基本命题 , 必要的理论可以从这些命题中引申推理出来 , 而且这些基本命题是 “ 那些一说出来 , 便为人人所承认的真理 ” 。实际上 , 西尼尔所追求的不过是在 “ 超历史 ” 和 “ 超阶级 ” 的所谓纯科学的旗号下 , 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新经济学。

西尼尔对资本及利润的本质和功能也提出了新的解释。他

吸纳了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但认为应当把其中的“资本”称为“节欲”，是资本家对自己消费中享乐和满足的牺牲，这是为将来利益而放弃的眼前的享受。他说：资本是协助继续生产的那部分财富，是节欲的结果，而节欲是一个人的行为，他或者节省他所控制的财富，或者有意识地选择将来的产品而放弃目前的享用。他认为，劳动是工人放弃安乐和休息，是一种牺牲；资本则是资本家放弃目前的享用，也是一种牺牲，为了强调资本家的牺牲，应该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资本”。

西尼尔通过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来反对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价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成本就是工资和利润。即生产所必要的劳动和节制的总和。而物品的效用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快乐或避免痛苦的能力。任何一种物品的供应越多，对于能获得这种物品的人来说，它的效用就会全部或几乎全部失掉。但在进一步论述价值问题时，西尼尔却不是以效用而是以生产成本来说明商品的价值，他断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成本。

在西尼尔看来，价值虽然由三个因素构成，但供给有限是构成价值的最重要因素，效用（即需求）则主要地取决于这个因素。供给本身则受人类劳动、节欲和自然力这三种生产手段的制约。从那些人人都能支配的自然力取得协助，而由劳动和节欲生产出来的商品，其供给则受劳动和节欲的制约。劳动和节欲也就是限制商品供给的生产成本。他说：所谓生产成本，我们的意思说的是生产所必要的劳动和节制的总和。商品的价值就是由这种生产成本决定的。实质上，西尼尔的这些理论不过是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进一步发挥和引申。与萨伊不同的是，西尼尔是运用主观方法来解释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范畴。他说，劳动是工人对个人安逸的牺牲，工人节欲获得“工资”，而资本则是资本家所做的牺牲，资本家节欲获得利润。他说：资本家在获得生产资料和流通资料时，要牺牲个人的消费，更确切地说，要牺牲这种消费所给予他的享乐和满足。所以，资本是一项财富，是用于财富的生产或财富分配中人类作出努力的

结果

西尼尔认为，商品的价值既然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牺牲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也就应当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共同分配，获取报酬。工资是对工人牺牲的报酬，利润是对资本家的牺牲（即“节欲”）的报酬。西尼尔据此来否定工资和利润的矛盾，抹杀了资本和劳动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他说：工资可以定义为劳动的报酬，利润可以定义为节制的报酬。但是牺牲是主观的感觉，无法加以精确地计算。如果说劳动还能以劳动用时间来计算的话，那么节欲就根本无法衡量了。这样看来，价值的确定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尼尔采取了用价格来代替价值的手法，认为价值只是商品相互交换的关系，它是由商品交换过程中经过供需双方的自由竞争而决定的；竞争使得供需双方都不能做过分的要求，而是供求双方满足于这些商品的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费用的价格，所以，竞争价格会接近于生产费用，即竞争价格会接近于价值。

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论是对他的“节欲”学说的补充。“节欲”学说只论证利润是对于资本家的合理报酬，而“最后一小时”论则论证劳动日必须足够长，利润才能保证。但他的这两个学说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根据“节欲”论，利润是对于资本家实行“节欲”的报酬，与工人的劳动无关；而根据“最后一小时”论，则又不得不承认利润的大小依赖于工人工作日的长短。这就清楚地表明，西尼尔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和辩护性，在这些庸俗经济学家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替资本家的经济利益进行辩护。

◆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大纲》

《政治经济学大纲》是西尼尔的代表作。该书分为“绪论”、“财富的性质”、“政治经济学的四个基本命题”和“财富的生产”四个部分，分别论述财富的性质、生产和分配。西尼尔在书中提出了以“节欲论”为特色的一套理论。他认为生产成本是生产所必要的劳动和节欲的总和。生产成本分为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消费者的生产成本，前者为卖方继续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劳动和节欲的量，后者则为买方如不购买而自己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劳动和节欲的量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卖方的生产成本和买方的生产成本趋于相等。

马克思在提到西尼尔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资本一词时指出：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但由于该书非常切合资产阶级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的需要，所以不仅在当时受到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的普遍赞赏，而且对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演进也有较为深广的影响，其中有些思想观点迄今仍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沿用。

(王浩琳)

穆 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年)

古 典 经 济 学 的 集 大 成 者

“穆勒不是在未来学派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当他了解该学派的时候，重新建立理论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旧学派的学说已经根深蒂固地扎进他的思想中了。在他的头脑中给新概念留下的位置太少了，因为它已被旧概念占满了。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诚实和富有生气的天性，他总是同情改进的。所以，如果他的几乎全部个人智慧都已经消耗在以前的事业上，用在掌握和发展以前的概念上，那么他会愉快地用其余力来掌握新概念。”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年) 是 19 世纪下半期英国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奠定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穆勒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经济学世家 是詹姆斯·穆勒的长子。约翰·穆勒自幼好学 ,10 岁的时候就已经通晓世界历史和希腊、罗马文学 ,11 岁时阅读了他父亲的著作《英属印度史》,13 岁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其父亲的指导和严格教育下 , 先读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 后又学习了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后来 , 当约翰·穆勒回忆起这段生活时他认为 , 因为他经常参加他的父辈们的学术活动 , 认识了他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大卫·李嘉图。李嘉图友好的态度善良和谦虚 , 很受青年人的喜欢。在约翰·穆勒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以后 , 李嘉图就和他一起讨论这门科学的问题。1820 年 约翰·穆勒应边沁的邀请到法国进行访问 , 在巴黎期间结识了萨伊和圣西门。回到英国后 , 在继续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 , 也研究了法学和边沁的著作。1823—1858 年在东印度公司任职 ,1865—1868 年 , 他当选为国会议员。后来在一次选举中遭到失败 , 随即移居法国的阿维尼翁 , 直至逝世。穆勒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原理》、《逻辑体系》、《论自由》、《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等。



言 论

1

“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2

“我倾向于认为，整个来说，静止状态要比我们当前的状态好得多。一些人认为，人类生活的正常状态就是生存竞争；认为相互倾轧和相互竞争，是激动人心的社会生活，是人类的最佳命运，而决不是产业进步诸阶段的可恶象征。坦白地说，我并不欣赏这种生活理想……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最良好的状态终究是，没有一个贫穷，没有人想比别人更富有，因而谁都不必担心别人抢先而自己落在后面。”

3

“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停滞腐朽，还不如任其用于追求财富。正因为人类的心智是粗俗的，因此他们自然需要粗俗的刺激，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妨让他们去追求粗俗之物。”

4

“分配规律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制度，因为某一社会中财富分配的方式取决于通行于该社会的法令或习惯。但是，虽说政府或国家有权决定应该有什么样的制度，可他们却不能任意确定这些制度起作用的方式，它们对财富分配拥有的权力依赖于哪些条件，社会所接受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如何影响分配的，这些同任何自然规律一样是科学的研究的主题。”

5

“自由放任是一般原则……一般应实行自由放任原则，除非某种巨大利益要求违背这一原则，否则，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会带来弊害。”

6

“一般来说，生活中的事物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该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那些这样做的人或其中的某些人，很可能要比政府更清楚采用什么手段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即使政府能够最全面地掌握个人的某一时期内积累的有关某一职业的全部知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也要比政府对结果更具有强烈得多、更直接得多的利害关系，因而如果听从他们选择，而不加以控制的话，则手段会更有可能得到改进和完善。”

7

“工人的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



学术思想

约翰·穆勒是 19 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之一。其经济学说的总特点是调和论和折衷主义。他综合了当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他的经济学说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阶段的完成，因而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生产规律与分配规律的学说在约翰·穆勒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具有不同的性

质。生产规律具有自然规律的性质，不随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而财富的分配规律则是属于社会制度的问题，取决于社会和法律的习惯，因而是暂时的和可变的。穆勒认为，经济规律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如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经济规律也应随之改变。他不想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基础即财产私有制与自由竞争原则。主张对其略作些修改，如对财产的继承加以限制等。穆勒将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割裂开来，希望通过调整分配方式来调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为他的改良主义政策纲领提供理论基础。

穆勒的价值论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供求论和生产费用论的混合物。他虽然用供求关系说明价值，但是生产费用是他的价值学说的基础。他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价值问题仍然是根本的问题，几乎每一种理论都以某种价值理论为前提，所以，价值理论上极小的谬误都会以相应的谬误传染给一切其他的结论。穆勒首先规定了使用价值、价格、价值（交换价值）的定义。在他看来，一个商品的价值是该商品购买其他商品的一般力量，价格则是表示商品与货币相联系的价值。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一般商品的价值是围绕着生产费用这个中心而变化的。他说，生产费用是由劳动和资本构成的。资本是资本家节制的结果。另一个因素是劳动，它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投入的劳动和生产资料转移的过去的劳动。西方经济学家把从生产中探求价值决定的理论统称为生产费用论。穆勒的生产费用论，实际上是以总结的形式，背离了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

穆勒的分配理论没有什么创见，只是综合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并加以发挥。在工资问题上，他认为短期的工资决定于供需关系，即取决于雇佣劳动者维持自己生活所需的资本的数量，即工资基金和要求就业的劳动者人数的比例。而劳动的价格不是由工资基金的数量决定，而是劳动的价格决定工资基金的数量。在地租问题上，他认为，地主对土地具有垄断权，

农民要耕种土地，理所当然要付地租。并且他也同意前人关于级差地租的阐述。穆勒还提出了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技术成果必然会用到农业上，从而使农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产品价格下降。在利润问题上，穆勒沿袭了西尼尔的节制论，并加以补充。他将利润分为三个部分：利息、保险费和管理工资。其中利息是对资本节制的报酬，保险费是对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报酬，管理工资是对资本家管理企业、组织领导生产所付出的劳动和技能的代价。

穆勒在经济研究中区分了经济学的动力学和经济学的静力学，开创了资产阶级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先例。他把用动态分析方法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遵循的法则和长期趋势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学的动力学”或“运动的学说”。而把用静态分析方法考察生产、分配和交换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学的静力学”或“平衡的学说”，这种方法论述的是“静止的不变的社会之经济法则”。

在对经济制度的看法上，穆勒受到圣西门、西斯蒙第等人的影响，通过对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进行对比，揭露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分配不均和弊端。他指出，经济学家的重要任务是研制革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的改良处方。他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应当主要研究以私有制和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的生存和进步条件，并且人类发展现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不是推翻私有制而是改良它，并使社会上每个成员从中得到益处。

穆勒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进行了调和折中，他一方面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原则，另一方面也强调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由放任原则不能自然地导致利他行为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人类应该是互相帮助的，穷人更需要帮助，而最需要帮助的穷人提出的给予帮助的要求，是最有力的要求。自由放任原则不能给穷人提供帮助，最为充足的理由是由社会组织来救济急需救济的人，但最有力的救济

是政府制定和实施济贫法。另一方面，个人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但其结果却远远超出了个人利益的范围，涉及整个国家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对于这种利益，只有用整体的力量才能予以维护和促进。

穆勒的经济学说体系是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经济学的综合和折中。这种综合不但包含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流派，而且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也表现出了理解和同情，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改良主义的态度。穆勒本人也坦然说道：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年出版、后来多次再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穆勒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原理》是 19 世纪下半期西方国家一本无可争议的经济学的圣经直到 19 世纪末，这本书一直是英、美等讲英语国家的大学初级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教科书。

该书之所以具有这样重要的历史地位，并不在于他的学说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独创性，虽然不能说其中没有任何独到之见；而是在于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综合是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为基础的。同时也继承了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等人的某些理论和见解。他把这些观点以折中和综合的办法构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体系。他在坚持资本主义的根本要求的同时，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要求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容忍、同情和理解，因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持改良主义的态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理论界具有深远的影响，能做到这一点的科

学著作甚少。穆勒的伟大并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某些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

(张瑶)

萨伊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年)

法 国 庸 俗 经 济 学 的 创 始 人

“萨伊先生不但是正确理解和应用斯密的原理的第一个欧洲大陆作家或第一批这种作家中的一个……而且成功地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组织得更合逻辑，更能增益人的智慧。”

——李嘉图

让·巴蒂斯特·萨伊 (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 年) 是法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萨伊定律”在现代也很有影响。他出生于法国里昂市的一个大商人家庭，早年经商，后来去英国学习。他在英国目睹了产业革命的发展情况，其间研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回国后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公司经理就是后来担任财政部长的格拉维尔。萨伊是大资产阶级政权的拥护者，反对雅各宾派。在 1794 到 1799 年期间，他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的主编，写了许多经济论文，因此被委任到政府的财政委员会工作，但由于他反对拿破仑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久就被解职。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后来波旁王朝复辟，政府给了他许多支持，派他去英国考察先进的工业经验。1830 年，他担任了法兰西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1832 年逝世于巴黎。萨伊在经济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化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被作为教材盛行一时，在当时成为经济学权威著作。



言 论

1

“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

2

“我们认真地阅读《国民财富的性质和问题的研究》（这部书很值得我们注意地阅读），就可以明白，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在它发表以前并不存在。”

3

“物质不是人力所能创造，物质的量也不会忽增忽减。……人力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改变已经存在的物质形态，所改成的新形态，或提供此以前不具有的效用，或只扩大原有的效用。”

4

“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这是因为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物品的价值就是财富所构成的。”

5

“他（斯密）把生产价值的能力仅仅归之于人类的劳动。更正确的分析告诉我们，价值是劳动（或不如说人类的勤劳）的作用、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要素的作用和资本的作用联合产生的结果。他忽视了这一原理，所以对于机器在财富生产中所发

生的影响就不能提出正确的理论。 ”

6

“ 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有的东西能维持人的生命，有的东西可制为衣服，有的东西可给人抵御狂风烈日如房屋等，有的东西能满足人们的嗜好和虚荣。后两者也是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大抵是装饰品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这是千真万确的，没用的东西，谁也不肯给予价值 ”

“ 一个人通过劳动创造某种效用，从而把价值授予某些东西。但除非别人掌握有购买这价值的手段，便不会有赏鉴，有人出价购买这价值。上述手段由什么东西组成呢？由其他价值组成，即由同样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果实的其他产品组成。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 ”



学术思想

萨伊把斯密的理论条理化和系统化，创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庸俗理论体系，因而被称为“科学王子”和斯密的“伟大继承者”。

萨伊把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政治学是研究社会秩序所根据的原则；政治经济学则是研究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这就是他的“三分法”理论。由于萨伊强调经济学的“纯粹”科学性质，所以，在他的著作中，抹去了具有时代特征和社会特点的方面，只留下对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方面，力图使经济学成为像化学、物理学和天文学那样

的“实验科学”和纯粹的精确的科学。这种提法在经济思想史上是首次出现的。萨伊的经济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按照以上思想、以“三分法”为思路构建起来的。

萨伊提出了供给自身会创造需求的理论，即著名的萨伊定律。他说：市场上的买卖都是以产品购买产品的，人人都以自己的产品价值购买别人的产品价值，“这个事实使我们得出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很离奇的结论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一个厂商生产产品就是给自己生产购买手段。因此，“一种货物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们相等的其他货物开辟了销路”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任何交易实质上都是产品与产品的交易，货币只是媒介而已每个人都是先把自己的产品出卖变成货币价值，再用货币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这样买者就是卖者，卖者就是买者有买必有卖，有卖必有买，总供给与总需求和谐一致不会出现矛盾。如果某一种货物出现过剩，那一定是可用来购买它的别种货物生产过少。“正由于某些货物生产过少，别的货物才形成过剩”。解决办法自然是增加这种过少货物的生产，即增加购买过剩货物所需要的购买手段的生产。

萨伊认为生产不创造物质，只创造效用所谓的效用是指物品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力量（使用价值），它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是生产的三个要素，它们在生产中共同创造了效用，从而共同创造了价值。这三种要素的所有者即工人、资本家和地主就分别应该得工资、利息和地租作为自己的报酬因此，他的分配理论可以概括为下列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这个公式为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所接受马克思把这种分配理论讽刺地称为“三位一体公式”。

萨伊把劳动分为三类，一是科学家的劳动，二是企业家的劳动，三是雇佣工人的劳动。他认为，产业需要科学家、企业家和工人，中心人物是企业家。他们劳动的生产型服务的报酬形成各自的工资，或称为“利润”。萨伊认为，利息是资本的

生产性服务的报酬，是企业家交给资本家资本的租金（利息），利息率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以及贷款者的信用等级。萨伊认为，地租是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是农业资本家交给地主的土地的租金，当农产品供不应求以至其价值超过了资本的通常利息而形成超过额时出现地租。

萨伊认为，生产与消费从一方面看是截然不同的，从另一方面看又是直接同一的。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又决定生产。他无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特点，甚至无视货币交换的特点和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实质上就是物物交换。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不是由于生产过剩，而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因为正是一些部门的生产不足才造成另一些部门的产品卖不出去。萨伊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否认，是“三位一体公式”的必然结论。萨伊销售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是重视发展生产与提倡经济自由，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不会发生全面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当然，萨伊定律也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从生产和消费的一般关系来看，该规律反映了生产决定消费的思想。但是，萨伊以“三位一体公式”对斯密的学说做了全面的歪曲和修改，否定了斯密对剩余价值各特殊形式的规定，而把剩余价值的本质说成各种收入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为了进一步掩盖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萨伊又提出了他的销售论，用以否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萨伊认为，销售理论是他最大的贡献。由于销售理论是研究产品能否实现其价值的问题，所以也称为实现论。萨伊销售理论的根本命题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因为产品是由产品购买的。萨伊从销售理论推论出四个基本结论：第一，一切社会生产越多，产品越多样化，则产品销售越快，生产者的利润也就越多；第二，个人利益能促进社会的普遍利益；第三，购买和进口外国货物决不会损害本国的生产；第四，鼓励生产是聪明的政策，鼓励消费则是拙劣的政策。

总的来说，萨伊的经济理论体系基本上脱胎于斯密的《国富论》。由于萨伊强调经济学的纯粹科学性质，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努力去掉具有时代特征和社会特点的方面，而留下来对任何社会都会适用的方面。他提倡经济自由，鼓吹阶级和谐，重视生产和供给，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否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些观点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概论》

《政治经济学概论》是萨伊最主要的著作，出版于 1803 年。该书以通俗形式解释了斯密的经济学说，首创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三分法，即把政治经济学体系划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互相独立的部分。该书曾被作为教材盛行一时，在当时成为经济学权威著作。著名的“萨伊定律”即出自本书。所谓“萨伊定律”，简而言之，就是“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萨伊对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反驳了那种把销路疲滞归因于缺乏货币的说法，认为货币只是交换手段，是媒介，交换实质上是物物交换，因此货币多少没什么影响。

由萨伊定律出发，书中还提出四个推论：(1) 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众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2) 每一个人都和社会的共同繁荣有着利害关系。这一点在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城市与乡村、国与国的关系中都体现出来。(3) 购买和输入外国货物不会损害国内或本国产业和生产。(4) 鼓励消费是拙劣的政策，激励生产是贤明的政策。萨伊定律对后来经济学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占据着资产

阶级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地位。虽然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已经推翻了这个“定律”，但直到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以后，这个“定律”才被凯恩斯的理论所取代。

(吴琼)

西 斯 蒙 第

S i s m o n d i (1773—1842年)

经 济 浪 漫 主 义 理 论 的 创 始 人

“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么，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马克思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年)是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出生于瑞士法语区日内瓦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他曾到巴黎读大学，后因其父破产而中途辍学，到法国里昂一家银行当职员。1792年法国革命爆发时逃回日内瓦，瑞士革命爆发后被捕。出狱后迁居英国，后又迁居意大利5年，在那里他置办农庄，经营农业，同时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00年西斯蒙第重回日内瓦，一度从事政治活动，以后专门从事经济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838年西斯蒙第被选入法国社会政治学院不久，他接受了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由于胃癌原因，西斯蒙第于1842年病逝。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以他的主要著作《论商业财富》(1803年)为代表，是英国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后期以《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年)为代表，转变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主张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西斯蒙第的著作有《托斯卡那的农业》、《论商业财富》、《意大利共和史》、《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法兰西人史》(生前完成29卷)、《自由人民之宪政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等。



言 论

1

“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组成社会的人类谋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们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

2

“只有消费的增加才能觉得再生产的扩大，而消费则只能根据消费者的收入来加以调节。”

“必须消灭的不是贫苦阶级，而是短工阶级；应该使他们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

4

“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增加一份财富，就应增加一份收入，增加一份收入，就应增加一份消费，随后是应该增加一份再生产的劳动，和增加一定的人口；最后，这种新的劳动反过来又增加财富。但是，假使措施不当，以致这些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加快了速度，不能同其他环节相配合，就会打乱整个系统，于是，预期使穷人获得怎样的幸福，反而给它们造成了同样深重的灾难。”

5

“一切财富积累的历史永远出不了这样的范围：即创造财富的劳动、积累财富的节约、消耗财富的消费。大凡不是通过

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无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对人完全无利，不能满足人的愿望，也不能间接或直接为人所使用的东西，不论是通过怎样的劳动产生的，也同样绝非财富。最后，完全不能积累不能保存以备日后消费的东西，即使也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也是为人的享受被消费的，也绝非财富。”

6

“自从我写了《论商业财富》以后，已经十五星霜。在这期间，我很少阅读政治经济学著作，但我并没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径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说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确的。从新的观点来看，这门科学中以前种种隐晦之处便昭然若揭，我的原理为我解答了我完全不曾预料到的许多困难问题。”



学术思想

西斯蒙第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同时又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列宁把他的经济学说称为经济浪漫主义。他的学说代表了处在产业革命和经济危机下受到灭亡威胁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充分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既要保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又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特点。

西斯蒙第经济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从最初的信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以《论商业财富》的出版为标志，这时他是亚当·斯密学说的追随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是西斯

蒙第在英国两次爆发经济危机之后转而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也是他试图以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在研究方法上，西斯蒙继承了古典学派以来的把经济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来对待的方法。更加注重对社会进行考察，依社会状况来评价经济理论和范畴。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属于政治学的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我们为人类谋福利的理论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认为，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创造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和需要，而不是为财富而创造财富，“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财富才算增加”。财富的增加并不是目的，只是人类得到物质福利的手段。因此，在研究财富的时候，不能单纯研究财富本身的生产，而必须研究和人口密切相关的财富。

西斯蒙第从孤立的个人出发，认为人的需要即消费总是先于生产和决定生产的，个人总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愿望而进行生产，消费的增长要求生产随之增长。因此，西斯蒙第说：“个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就个人来说成立的道理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成立的，于是他的上述理论就顺理成章地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转而运用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经济。他说当不能直接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满足消费时，就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达到消费的目的。但是，即使在交换经济中，生产依然取决于消费，财富还是为了满足人的消费，只是有了交换之后，消费决定生产表现为社会需求先于供给。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消费直接依存于他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而消费决定着生产，于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应服从于消费的原则就进一步转化为生产应该适合社会收入的原则。因此他又把收入、分配列为首要的地位，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心。

西斯蒙第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他对经济学最主要的贡献。他指出，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收入不足就意味着消费不足，所以，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

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并不是偶然的，它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生产者之间受自由竞争的支配，工业应用机器进行生产，企业不断地集中，这一切都造成了生产的无限扩张。反之，资本主义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财产集中到少数所有者的手中，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生产者收入不足，从而使国内市场越来越狭窄，使生产和收入之间的比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产品的实现会受到严重的障碍，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以，人们所受的各种灾难是社会制度不良的必然结果。西斯蒙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最大限度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和抨击其矛盾，对人民的穷困表达无限同情。

西斯蒙第是第一个与经济自由主义决裂的经济学家。他主张国家干预，以保证分配和消费的正常进行。他指出：当财富逐渐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许政府的职责就是延缓这种运动，调节这种运动。西斯蒙第把资本主义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归结于人们受错误思想支配而走错了道路，特别归结于执政者遵循错误的政策和学说的结果。认为要改正这种错误，一定要借助于政府和执政者的力量，因此他主张和支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倡导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

西斯蒙第的理想社会，是由小生产者组成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不公平的分配是造成社会收入和消费萎缩的原因，是资本主义一切灾难的原因。因此，不必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要改变资本主义分配就可以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只要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把社会经济的重心放在小生产之上，资本主义的矛盾以及由它所产生的经济危机就都可以消除。他把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和城市手工业理想化，主张把宗法制和行会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要求根据这种原则和规范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他们不是力谋恢复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从而恢复旧的所

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而是力谋重新把现代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硬塞进已被这些资料突破而且必然要突破的那种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西斯蒙第的思想是值得重视的，不是因为他是所谓古典经济学在法国的完成者，而是因为他最终成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古典派的批判者。他的批判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是向前进到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而是倒退回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这就是西斯蒙第思想的经济浪漫主义实质。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是西斯蒙第的主要代表作。该书放弃了他以前的观点，提出了和斯密、李嘉图完全相反的看法与结论。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把“当初特别推崇的一切……都推翻了”。这本书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界定、价值学说、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以及社会改革设想，该书几乎囊括了西斯蒙第的主要观点。全书共分为七篇，前两篇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起源，财富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之后五篇又对领主财富、商业财富、货币、赋税、人口分别作了论述。在书的最后，又用三篇论文对消费和生产的平衡加以说明，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驳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的探讨；第二篇论文是论消费与生产的平衡；第三篇论文是关于萨伊先生的《消费与生产的平衡》一文的几点意见。在著作中，他试图以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改造政治经济学。该书奠定了西斯蒙第在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研究》

《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是西斯蒙第晚期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是作为他的多卷本《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二、三卷问世的，第一卷是《自由人民之宪制的研究》（1836年）。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主要研究领土财富与农民的生活条件，第二卷主要研究商业财富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书中除了阐明一些新的主要经济理论以外，对劳动人民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对当时社会的弊端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但西斯蒙第是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为小生产者的利益而主张实行改革的，反映了小生产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态度。而且，《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反复论述他在《新原理》中已经提出的基本原理，因而在总体上没有超越《新原理》的高度和深度。

（赵一）

巴 师 夏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年)

经 济 和 谐 论 的 倡 导 者

“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经济记者。”

——熊彼特

“巴师夏在把前人的经济学向通俗化发展方面是个天才。”

——埃奇沃思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 (Frederic Bastiat, 1801—1850 年) 是 19 世纪 30—40 年代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既是当时自由贸易派的旗帜 又是乐观主义的“经济利益和谐论”的鼓吹者。巴师夏出生于法国南部酿酒区的一个工商业者家庭，1825 年他继承祖父遗产成为一位酿酒业资本家。法国的酿酒业、制丝业、奢侈品生产同世界市场有密切的联系，它们十分强大，并不害怕国外的竞争对手。因此，巴师夏既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同时也是符合于他那个阶层利益的自由贸易思想的宣传者。1830 年革命后不久，他被选为缪格区的法官，后来又被任命为本区的顾问。七月王朝后期，巴师夏从外省迁居巴黎 开始从事经济写作。他认为 应当争取更多的、更完全的经济自由。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权，自由产生和谐 强制则产生祸害。巴师夏的著作很多 除了若干小册子外，他的主要著作有 1847 年发表的《经济论辩》，1850 年发表的《经济和谐》。



言 论

1

“当我们谈及和谐时，绝不认为现实世界的自然秩序已经尽善尽美，没有谬误和邪恶……我们只能说，社会大趋势是和谐，因为任何错误都会导致失望，任何邪恶都会受到惩罚，不和谐终将——消失。”

2

“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服务，并且在有报酬的条件下，把我们的才能或运用这些才能的结果交给别人支配。这就是社会。”

3

“只要交换仍保持自由和不受拘束，现实的社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而美丽的组织——一个的确跟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有很大不同的奇妙组织，因为，它通过一个令人叹服的机构，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

4

“价值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

5

“比例于资本的增加，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资本家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也就会增加，但是，相对量却减少；相反地，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却都会增加。”

6

“如果人们坚持认为效用性是价值基础，我可以同意，不过这里说的效用性不是物体和现象中由上帝施与或凭借技艺的威力才有的效用性，而是寓于人作出的，经比较和相互交换了的服务中的效用性。”



学术思想

巴师夏是 19 世纪上半期法国和欧洲大陆最负盛名的经济自由主义旗手，还是乐观主义“经济利益和谐论”的鼓吹者。

巴师夏认为，在经济完全自由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交换”是“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此前，斯密也曾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交换的联合体，但其重点却放在劳动的分工上。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与斯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完全理解成一种商品流通，并借此把资本主义社会描绘成为一个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王国。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人类最后的和永恒的社会，因为它拥有自然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所谓自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自然愿望和利益而工作的；所谓和谐，则是因为每个人的利益和别人的利益相适应。

巴师夏认为这种自然、和谐的社会秩序受自然秩序的支配，这些自然秩序又是由人性所决定。斯密提出了利己和利他的两种人性，并认为在经济领域中人的活动受利己主义支配，在道德和情感领域人又是利他主义者。巴师夏则试图把利己和利他两种人性调和起来，认为二者并不矛盾而且互为补充。他说：在劳动和交换的问题中，个人为自己打算的原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发动力，但令人引为惊异的是世界的主宰者利用这一原则，在社会制度的胎胞中实现了博爱的公理——个人为

一切人打算。巴师夏的社会秩序观，实际上已经超过斯密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概念而意味着一个“神的秩序”，因为他说：上帝赋予每个人以一种向善的不可抵抗的劳动和从不失误的识别力。

巴师夏把其“经济和谐”论贯穿到一切领域。他认为“经济和谐”在价值、分配、私有财产制度、竞争等方面都发生作用。巴师夏认为，“经济和谐”的出发点是交换，没有交换就没有社会。他说：人们在交换中，能够互相帮助、互相替代对方工作，提供相互的服务，所以交换不外是两种服务的交换，交换可以免除相应的努力。“服务”这个概念是巴师夏从萨伊那里照搬而来的。萨伊把效用的创造归结为“服务”，而巴师夏则以“节约的劳动”为“服务”。认为服务即通过交换所能免除的努力和紧张，资本主义下的服务是平等互利的，因此一定是等价和公平合理的。巴师夏从交换引出价值，他认为价值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交换比例，而萨伊则直接以生产要素所提供的服务综合起来决定价值。巴师夏认为在交换中，甲方给予乙方的服务是乙方的节约劳动；乙方给予甲方的服务是甲方的节约劳动；所以，利己也是利他。在经济自由的条件下，交换成立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甲乙双方服务的交换总是等价的。所以，等价交换是一种公道的交换，整个社会的利益在神的威力下会“和谐”起来。

巴师夏认为，作为服务的尺度——价值就是服务提供者所做的劳动和服务接受者所节约的劳动。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这两种劳动会趋于相等。这是因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迫人去做不利的买卖，而买卖双方的利益告诉人们：交换总是以等价为基础的，“交换”不仅仅是显示出和衡量价值，“交换”还给价值以存在。等价交换是一种公道的交换，这也就表明了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和谐的”。

巴师夏以他的“服务价值论”反对古典的劳动价值论。在他看来，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在于把劳动理解为生产物质财富的

过程。巴师夏观念中的价值是与物质的事物相脱离的，他认为商品的生产不是物质的劳动生产过程，而只是服务的提供。价值只是一个比例，其中没有物质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是互相提供服务。于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概念、人与人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以及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的交换等等，就都被等价相互提供“服务”一词完全抹杀了。价值与物质、效用及财富的生产过程完全分离开了。

巴师夏否认古典经济学的地租是对劳动生产物的一种扣除的观点。试图证明地租只是土地所有者“服务”的代价。他认为每一个商品都有两层效用：第一层效用是人力创造的，因其必须有代价，这也就构成了价值；第二层效用是自然无偿赠与的，不要求代价，因此并不表现为价值，土地在生产上所提供的效用，属第二层效用，是无偿的。因此地租不是像李嘉图所说的“不可毁灭的地力的代价”，而是地主，作为社会和自然的媒介，在开发、改良土地时提供的“服务”所应得的报酬，从而企图达到掩盖地租是剩余收入的本质的目的。

巴师夏同其他庸俗经济学家一样，把利润归结为利息。他把利润划分为企业的收入和利息。企业主的收入，是对企业主的劳动即努力和紧张的报酬。对利息的解释，他采用了西尼尔的“节欲”论，但是他用“延缓”代替了“节欲”这个名词。他说，资本家垫支资本就是推迟享受、转让服务，这一过程“延缓”了自己的消费或享受，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种损失或牺牲，而这种损失或牺牲自然应得到报酬，这就是利息。

巴师夏从虚无缥缈的所谓的“鲁滨逊经济”来论证利息。他说，漂流在荒岛上的鲁滨逊也有资本，因为鲁滨逊在荒岛上不仅生产消费品，同时也生产劳动工具，从而延缓了自己的个人消费，可是同时却提高了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据此，他认为资本有两个特征：一、它的生产必须以作为“延缓”个人消费的牺牲为前提；二、它的作用是促进工作效率或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他就歪曲了利息的本质，抹煞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

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不过，巴师夏认为鲁滨逊不可能创造大量的资本，这是因为在孤立人的经济中，人的需要是超过人的力量的。大量的资本只有在社会里才能创造出来由于交换的存在，一部分“延缓”自己的消费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可以被另一部分人所享用，并大大地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多因此，以交换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为“和谐”和“公正”的乐土。

总之，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对抗的地方，巴师夏都要去证明是自然和谐的，并将其贯穿到全部经济理论领域去。然而这种和谐是以现实中的贫富差距以及阶级对抗为代价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与反对保护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相结合的



主要著作

《经济和谐》

1850年，巴师夏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经济和谐》。该书一经出版，他很快名噪一时，从而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巴师夏首先从所谓自由和强制的关系出发提出问题。指出，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特权，而强制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所要求建立的社会的特征。自由产生和谐，强制则产生祸害。

该书力图证明资本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是和谐的，认为来自上天的伟大规律并不在促使社会走向祸害，而是在走向和谐他提出，如果这个结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则一切分歧都将随之消失。妄言资本主义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而这种“和谐的社会组织”则是他从交换中“发现的”，因此交换就成为他“经济和谐”所借以建立起来的基础在利润问题上，他把利润归结为利息，根据浮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的现象，

把利润划分为企业主的收入和利息，关于企业主的收入，他也认为是对企业主的劳动即努力和紧张的报酬。关于利息，他采用了西尼尔的节欲论，但是他用“延缓”代替了“节欲”这个名词。

巴师夏无法回避当时法国社会的矛盾和不协调，但他认为这种不和谐是由于缺乏自由所造成的。所以把自由的私人经济活动从政府的干预下解放出来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和谐的规律才能够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由于这一点，巴师夏又被推崇为欧洲大陆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斗士。

（王浩琳）

李 斯 特

Friedrich List (1789-1846年)

德 国 历 史 学 派 的 先 驱 者

“恰恰在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其影响顶峰并为大陆上的许多著作家所宣扬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向这一学说发动了在卡尔·马克思之前最猛烈的抨击。”

——豪斯赫尔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derich List, 1789—1846 年) 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历史学派的先驱者。出生于施瓦本王国首都路特林根城的一个制革匠家庭。他没有正式进学校读书，1806 年通过自学参加文官考试，进入符腾堡公国的政府机构任书记员，后在图宾根担任会计、检察官等中等级别的财政官员，并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法学。

李斯特于 1820 年当选为符腾堡议会议员，次年因起草了一份批评政府的文件，被判处监禁，后被迫经法国逃往美国，在美国继续宣扬自己的政策主张。1827 年李斯特在美国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系统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1830 年李斯特取得美国国籍，1832 年以美国派驻莱比锡和巴顿领事的身份回到德国。由于他继续倡导和积极参与建立统一的保护关税制度而遭到封建势力的迫害，其间又几次离开德国。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政治幻想的破灭以及生活的窘迫，致使他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于 1846 年 11 月 30 日雪夜在奥地利自杀身亡，终年 57 岁。

李斯特的经济著作包括：《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农地制度、小农经营及国外移民》、《德国政治经济的国家统一》等。



言 论

1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2

“关于政治经济学我们可以读到的最好的书本就是现实生活”

3

“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进，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工业独立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内发展，使国家获得了力量，可以顺利经营国外贸易，可以扩张航运事业，由此文化可以提高，国内制度可以改进，对外力量可以加强。”

4

“缺少了自由制度以后，公民个人方面无论怎样地勤奋、俭约、富于创造力和智慧，也不能有所弥补。历史还教导我们，个人生产力大部分是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中得来的。”

5

“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大国，决不能只求眼前物质利益享受；文化的力量是比单纯的物质财富更加重要、更加有益的资产……只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才能取得并

保持这些资产；一个国家如果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强大、文明的各国中有资格占有一个地位，那么遇到任何牺牲时就不可退缩，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守住这些资产。”

6

“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双方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不幸在工业上、商业上还远远落后于别国，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与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使它具备条件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

7

“只有以促进和保护国内工业力量为目的时，才有理由采取保护措施。有些国家有着广阔完整的疆域，人口繁庶，天然资源丰富，在农业上有很大成就，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有高度发展，因此有资格与第一流农工商国家、最大的海陆军强国分庭抗礼；只有在这样情况下，才有理由实行保护制度。”



学术思想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也是德国保护关税政策的首创者，他的经济思想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曾发生过重大影响。

国民生产力理论是李斯特经济学的核心部分。他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对生产力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是完全不同的，财富是交换价值，财富的原因则是生产力。他敏锐地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和已经增加的财

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对一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例如，国家是不能仅仅靠着收租过日子的，国家状况主要决定于生产力的总和。

李斯特把生产力分成四种类型：（1）人的生产力，包括精神的生产力和肉体的生产力；（2）自然的生产力；（3）社会的生产力；（4）物的生产力。人的生产力与自然的生产力是不可分离的，否则无法发挥作用。这二者发挥作用时又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秩序条件下，即在第三种生产力，也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的、市民的、政治的状态和制度下”进行；而物的生产力主要指农业、工业和商业资本的生产力。李斯特生产力理论中最强调物的生产力，他把工业生产力和发展水平当作决定着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决定整个国民经济，甚至政治独立和文化发达的基础。但他又认为不能将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仅仅局限在其物质资本上，生产力的更大的组成部分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据此他提出了精神资本的概念。他特别重视教育，认为教育是使一国精神资本得以延续的主要手段。他指出：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上。

李斯特把英法流行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称为“世界主义经济学”，认为这种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决定了它只有在世界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都一样时才有意义。可是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因而并不存在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各国经济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发展经济的特殊道路，自由贸易原则不是有利于一切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政治经济学应是一种“国家经济学”。

李斯特指出，国家经济学是从某一国家所处的具体形势和特有的国际关系出发，研究某一特定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繁荣富强的科学。国家是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有一个中介体，各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自由贸易，那么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强国的优势之下。英

国、法国等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自由贸易是以假定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生存在持久和平的局势之下为前提的。但实际上，人类从原始阶段开始，便是有各种形式的联合，虽然有趋于全世界联合的倾向，但当前的世界仍存在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因而，如果任何一个在工业上、商业上远远落后的国家，那么，它即使具有发展这些事业的精神和物质手段，也必须首先加强它自己的力量，然后才能具备与比较先进各国进行自由竞争的条件。因此，与世界主义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发达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达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李斯特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他认为，个人主要依靠国家以获得文化、生产力、安全和繁荣，同样人类的文明只有在各国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李斯特把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他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前三个阶段不存在实行保护政策的必要性，而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第四阶段国家有必要实行保护政策，德国正处在此阶段，他认为，只有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待各国的经济条件和经济政策，经济才能迅速发展。

李斯特经济政策的核心是保护关税。他认为，在农业时期宜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在国家经济处于由农工业时期向农工商业时期转变的阶段则应该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当时德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因而他主张德国必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但是，李斯特主张的是一种相对保护关税制度，并不是绝对保护关税制度。他说，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本国产品为原料与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方面的发展程度愈高，通过国外贸易在改

进国内社会状况方面所得到的利益将愈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家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所受到的损害也愈大。这就是说，一个国家由没有先进工业转变为有工业，需要保护关税；等到本国工业发展得同先进工业国家一样了，这时就又可以同它们自由贸易了，本国也就从农工业时期进入了农工商业时期。因此，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保护关税，这种政策损失的仅仅是交换价值，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

李斯特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概念范畴、体系结构上看，还是从政策主张上看，都与亚当·斯密所建立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李斯特建立的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对以后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从历史的、民族的特点出发去建立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强调经济发展的民族性，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使他成为了历史学派的先驱者。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184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是李斯特的代表作。在本书序言中，作者写道：“如果作者是英国人，我几乎不会怀疑亚当·斯密理论的基本原理，之所以使作者在最近的许多匿名论文中，最后终于在一篇长文中，用我本人的名字对斯密理论展开批判，是由于祖国的实情。同时，今天使作者有勇气将这部著作问世，主要也是由于德国的利害关系。”他反对一些德国经济学家把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输入德国作为指导思想。

在该书中，他发挥了关于国家体系经济学的学说，论证了实行关税保护以发展德国工业资本的必要。全书共分四编：第

一编是对西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并从中归纳出历史的教训；第二编是阐述其理论观点，也是全书的精华所在；第三编是介绍他以前各派的经济理论；第四编是具体的政策主张。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英法的政治经济学，反对所谓“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国家经济学；反对价值论，主张生产力论；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制度。该经济思想对德国的经济发展曾发生过重大影响。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

《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发表于 1827 年，本书对当时传到美国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提出反对意见。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昔日的斯密和萨伊理论的忠实信徒，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原先的信仰。他提出，要用美国体系向斯密体系宣战，要根据美国体系解释政治经济学原理，他特别尖锐地提出，“根据我的研究成果，我发现政治经济学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个人经济学；（2）国家经济学；（3）人类经济学。亚当·斯密探讨的是个人经济学和人类经济学。……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富论》一书的标题本身所包含的要探讨的问题。”为了建立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详细阐述了“政治经济学并非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原理，由此创立了美国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所谓“美国体系”的核心就是主张实施保护关税政策。正是这种“美国体系”的实施，才使得美国的产业免遭灭顶之灾，才有了以后美国的强大。

（赵一）

罗 雪 尔

Wilhelm Roscher (1817-1894 年)

历 史 学 派 的 奠 基 人

“罗雪尔的目标是尽力对现今的知识赋予历史的哲学：要解开历史的秘密，发现历史的意义，并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 年), 德国经济学家 , 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高级法官家庭 , 早年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学。 1840 年任哥廷根大学历史学和国家科学的讲师。 1841 年开始任政治经济学讲师 , 兼讲政治理论史。 1843 年发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被人们称为“ 历史学派的宣言 ” 。罗雪尔把法学中的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 , 提出所谓 “ 国民经济学的生理学方法 ” , 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1844 年他升为教授 开始从事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 1848 年起在莱比锡大学执教政治经济学 长达 46 年之久。

罗雪尔以惊人的毅力为创建政治经济学和方法论的整体体系而奋斗。其主要著作《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1843 年) , 第一次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 , 为历史学派奠定了基础。《国民经济学体系》 (共 5 卷 ,1854—1894 年) 汇集了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此外 他还出版了《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 (1851—1852 年) , 《德国国民经济学说史》 (1874 年) 等。罗雪尔的经济学说主要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寻找一套理论基础。



言 论

1

“文化越高，劳动越受重视。”

2

“国民经济同国家、法律、语言等一样，是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国民性、文化阶段等等体现于国民经济之中，国民和国民经济同时成立、成长、繁荣、衰落。”

3

“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术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支配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要求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些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

4

“历史的方法对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决不轻易地一律予以颂扬或一律予以否定，因为对所有国民和一切文化阶段完全有益或完全有害的这种制度差不多是绝无仅有的。幼儿的纤带，老人的拐杖，对普通人是没有用处的。而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出：为何以及如何逐渐发生从合理的变为不合理的、从幸福的变为有害的……”



学术思想

作为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试图建立起一个探讨国民经济发展及其规律的理论体系，成为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早对经济发展过程系统地进行宏观的、动态的和长期的分析的学者之一。

罗雪尔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把萨维尼在法学研究中应用的历史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为历史学派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历史方法论具有以下特征：（1）国民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和说明一切经济生活的现在和过去的事。 （2）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只有与法律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经济生活做出完整的说明。 （3）国民经济学不以研究现在的经济状况和单个的国民为满足，而必须结合过去的情况和国民整体进行研究，以获得启示和教训。 （4）历史的方法不轻易颂扬一种经济制度，也不轻易否定一种经济制度，因为没有哪一种经济制度对所有国民和一切文化阶段是完全有益的或者完全有害的。

罗雪尔虽然强调历史研究，注重历史资料的搜集，但是他并不否认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相反，他认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指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童年、青年、成年和老年。因而，社会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具有上升的和下降的不同的趋势。因此，他说：如果我们对所谓国民的繁荣期作出正确的规定，那么在我们的判断上就找到一个支点。就是说，凡属于这个时期以前的一切制度，我们都认为还是不完备的东西；对这个时期以后的一切制度，则认为已是走下坡路的东西。

罗雪尔认为，国民经济学除了单纯地描述人的经济本性和他的经济欲望之外，只能具体地考察适合于满足这些欲望的各种制度的规律和本质及其所达到的或大或小的成功。他对经济学的普遍规律持否定态度，认为古典学派惟一的错误是主张它们有普遍的适用性。他认为：一种经济理想不能适合每一个国家人民的不同种类的欲望，正如一件上衣不能适合一切人的身材一样因此，他注重经验性规律，只注重资料的收集和描述，而否认理论概括和抽象分析的必要性。

罗雪尔指出，国民经济在其发展的所有阶段都要受到自然、劳动和资本这三种经济因素的支配，但是，这三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生产部门是很不同的。他根据不同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所占优势地位的不同，把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在较低的文化阶段，自然要素占支配地位，自然界几乎自发地供应稀少人口以食物。那些不占有土地的人可能沦为土地占有者的奴隶。（2）到了中等文化阶段，劳动的地位逐渐增强。劳动有利于城市、市场及行会的产生和发展，而这些特权又使劳动资本化了，于是，在地主和奴隶之间形成了一个中间阶层。（3）发展到高级文化阶段，资本开始占优势地位，在这一时期，每一件事务上都有资本的味道。正是资本主义第一次使人们的经济活动能够独立存在，使法律从地主、教会和家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这一时期有适当舒适和坚实文化的中间阶级的数目可能缩小了，巨大的财富却面临着最贫困的苦难。在这种状况下，他主张国家应采取所谓“人工治疗”进行干预，这包括：（1）如果自然的痊愈力太弱时，就加强它；（2）如果自然的冲击力太强时，就缓和它；（3）如果它的方向不对时，就纠正它。罗雪尔主张，只有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国民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从 19 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一百年的时期内，当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于研究既定资源下的静态配置的时候，罗雪尔却独树一帜，奏响了一曲具有德国风格的发展的乐

章。可见，罗雪尔创立的国民经济学成了从德国历史学派先驱者李斯特过渡到这个学派最完备形态的新历史学派之间的桥梁，从而使德国经济学构成为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这一链条中的重要的一环。

◆ 主要著作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

本书被认为是“历史学派的宣言”。书中概述了历史方法的特点和要求，提出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从经济方面说明各国民众的发展目标以及选择此目标的原因和获得的成就，认为这样的努力只有和法律史、国家史以及文化史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做到。

该书强调研究经济关系的历史和研究经济的现状是同等重要的，由于近代各个国民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需要对个别的国民加以比较才能把握经济发展本质。同时要辩证地看待一种经济发展制度，因为没有哪一种经济制度对所有国民和一切文化阶段是完全有益或有害的。作者指出：“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已获得的成果留给后代。”

该书出版后，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在书中把历史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提出所谓“国民经济学的生理学方法”，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书中所确立的历史方法，不但影响了德国新旧历史学派，并且对后来的美国制度学派也有很大的影响。

(哈娜)

施 穆 勒

Gustav Von Sohmoller (1838-1917年)

新 历 史 主 义 学 派 的 领 袖

“施穆勒是‘讲坛社会主义者’的领袖人物。他今天所得到的声誉比他应得到的小。”

——舍福尔德

古斯塔夫·施穆勒 (Gustav von Sohmoller, 1838—1917 年) 是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 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 , 就学于图宾根大学 毕业之后 , 长期在哈莱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直到 1912 年退休。 1884 年他被任命为普鲁士枢密院顾问。 1887 年 被选为普鲁士学士院院士 , 1897 年代表柏林大学出任普鲁士上院议员 , 1907 年被封为贵族 鼓吹阶级调和 提倡社会改良 他提出的社会改良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间阶层 , 如自耕农、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等。他认为 维护“ 旧中间阶层 ” 免于没落是要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稳定的必要条件。后来 他把‘ 旧中间阶层 ’ 限定为白领工人、职员、经理、经营管理人员 熟练工人、公务员等。他在这方面的主张主要是依靠政府来实行社会改良。他于 1873 年创立社会政策协会 其主张被称为“ 讲坛社会主义 ”。施穆勒对经济学有突出的贡献 , 主要著作有《关于法和国民经济的根本问题》、《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十七、十八世纪普鲁士国家的状况、行政及经济史的研究》、《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施穆勒年鉴》、《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和方法》等。



言 论

1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

2

“国民经济这一概念不是别的，而是包括着一个领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所有并立的同时又是上下统属的一切经济单元的整体。”

3

“只有当人们是属于同一种族，每每还是属于同一语言，被共同的情感和理想、习俗和法律所维系，同时又拥有一个统一的民族的经济制度并具备一个中央的财政制度，以及是维持着一个统一的交通体系和活泼的交易关系，只有这样，然后才有国民经济之可言。”

4

“就知识和现实而论，历史科学提供了使学者从一个十足的乞丐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的经验材料和资料。而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材料——如同所有完美的观察和描述一样——足以证明和验证理论结论，表明某些真理有效性的限度，尤其是有助于归纳性地获得新的真理。这特别适用于政治经济学中更为复杂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惟有以历史考察为依据才有可能取得进展。”

5

“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得最大量的财货。财货的供应越丰富，我们的生存就越有保障，为着将来的储备就越充足，也就越有可能跳出直接的财货生产的圈子而进入间接的、从技术和社会的角度上看来都是更错综复杂的财货生产。”

6

“首先要弄清一国的幅员、地理形势、土地和气候，以及先要弄清它的资源和自然交通条件，但是尤关重要的是去弄清它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如何采取措施来增加从中的收益；要去弄清它的人口有多少、人口密度如何、资本手段为数多少，尤其要去弄清它的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他们所受的技术训练、他们的习惯和需求状况、他们的家庭、田庄、农村和城市的组织、他们的市场、贸易和货币制度，以及他们的财政和他们的国家经济的制度对于个体经济进步具有如何的影响。”

7

“单纯的赤裸裸的赢利心，无疑是邪恶的，在经济上是有害的，因为一切更高的经济生活……假如缺少同情的心理和道德的规范，那就很难于维持存在了。”

8

“再也没有比老一代英国经济学家（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谬误更糟糕的谬误了。这种谬误是：某些简单的、自然的、法律的、经济的制度从来就有并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下去；文明和财富的一切进步不过是某种个人的进步或技术的进步罢了；一切都不过是一个增加生产或消费的问题，这个问题注定并且能够在同一个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这种植根于经济制

度具有稳定性的信念，是老一代经济学家们相信个人及其个人生活的能力是万能的这一天真而又自以为是的信念的产物。”



学术思想

以施穆勒为领袖的德国新历史学派在德国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从 19 世纪 70 年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统治下德国政治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德国新历史学派的经济思想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先驱。

施穆勒特别强调充分运用统计资料和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统计学方法。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过一百次蒸馏的旧条款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历史统计法”以此来区别于旧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

他强调说：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们能认识的只能是“经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不过是经常重演的现象系列，并不反映因果关系。他认为，对某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每个局部的个别的经济制度和现象进行专题考察是国民经济学惟一的科学方法。通过收集资料，并加以分类、排比和归纳，可以得出“经济法则”。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埋头收集、整理大量具体的经济材料以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发展史实，进行考察和统计，将他们系统化、数量化，最终从这些经济史实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法则”。这就是新历史学派的“历史统计方法”。

施穆勒并不是单纯地推崇归纳法而反对演绎法。他主张以归纳方法为主，演绎方法为辅。他反对凭着主观假设、理想和目的进行推论。施穆勒认为，要开辟政治经济学的崭新时代，必须以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当前的各种资料的研究为基点，然

后运用历史归纳方法进行分析整理，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并且，这些资料所能说明的不是一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般生产过程，而应当能反映各个不同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民族经济的特殊情况。根据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着重分析并论述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德国）的各种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经济生活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

施穆勒认为，国民的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有着必然的统一和联系。心理因素和伦理道德因素在整个经济生活的运行中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重要地位。在他看来，所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分工、交换等都是心理和道德的范畴，心理和伦理道德制约着一切经济现象。经济问题也只有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才能得到说明，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和人们的伦理道德欲望，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分工、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活动，既是技术范畴，又是道德范畴。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道义关系比经济关系更基本更重要，而国家正是这种道义关系结合的具体体现，经济现象既体现自然的技术的关系，又体现伦理的心理的关系，经济组织不过是由这种经济现象和伦理关系所规定的生活秩序。

据此，施穆勒认为，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阶级斗争，只要通过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去教育劳动人民，并通过国家的恩赐措施就可以实现。施穆勒从这种观念出发，从社会集团和地域范围角度对经济发展过程的阶段进行划分。他提出人类历史到当时已经历了种族或马克公社经济、村落经济、庄园经济、城市经济、领域经济、国民经济六个阶段。¹⁵至 18 世纪属于由城市经济阶段向国民经济阶段过渡的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更多地采取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其目的在于建设近代国家。

施穆勒强调国民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国家，国家是国民从事经济活动的神经中枢。他认为，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中国家经济在国民经济的作用和大小会有区别，但是，国家经

济的存在却是无可置疑的，一个超然于国家之外、完全脱离国家的一切影响的自然的国民经济只是一种幻想。他还认为，对于家庭、城市、社团，国家都应当以货币制度、农业和工业立法、交通和贸易政策、钱币税收制度等国家权力进行管辖。据此，新历史学派反对英、法经济学家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应当对经济进行干预，实行保护和统制政策。他特别重视国家的职能，批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主张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应当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主张国家制定各种政策措施以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比如：制定工厂立法、劳动保障、工厂监督、孤寡救济等法令；实行矿产、铁路、河流、森林、银行等的国有化。

作为新历史学派的旗手，施穆勒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主张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是两个阶级在理想、精神和世界观方面的对立，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实行自由放任原则来解决，应当而且只能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和道德教育来解决。因此他主张通过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政策，调整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发展公营和国营企业，缓和劳资矛盾，实现所谓的为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而奋斗的“社会王国”。他把这种改良主义的政策自诩为“特种社会主义”，而资产阶级自由派则嘲讽这种政策为“讲坛社会主义”。其实，这种“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相通之处，它绝对不是工人阶级所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



主要著作

《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

《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是施穆勒的代表作。本书可以说

是新历史学派经济理论的集大成，在德国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施穆勒也因此书获得崇高声望。全书共分二册，分别出版于 1900 年与 1904 年，该书由序论及其他四卷构成。序论介绍了经济科学的性质和定义、心理和道德的基础、经济学的文献及其研究方法。第一卷分析土地、人民与技术；第二卷分析国家经济中的社会组织；第三卷分析商品流通的社会构成及国民所得的分配；第四卷分析国民经济生活的发展。

施穆勒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依赖历史和统计这两个工具，建立一种经验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他认为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的基础。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要求认清国民经济的整个图景，要求根据时间和空间以及根据尺度和历史次序来揭露和解释国民经济的现象；为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把感性的认识置于理性的比较和检验之下，需要把感性认识到的东西加以验证，以及把正确观察到的东西根据它们的同一性和不同性整理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把整理出来的结果就着它的典型的规律性和普遍的因果关系加以充分地把握。严格的科学的主要任务因此就是这样：第一是正确地观察；第二是善于树立界说分类；第三是找出典型的范例并从因果的关系加以说明。

施穆勒所倡导的“历史统计方法”，就是对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史实进行数量化、系统化后归纳出的“经验法则”。在是否存在客观经济规律这一问题上，施穆勒持否定态度，他否定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有普遍适用的客观经济规律。指出：企图找出国民经济中力量作用的一个最终的统一的法则，那到底是没有的。此外，他还特别重视社会有机体及经济社会的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反对古典经济学把利己心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惟一基础。

（张翠莹）

马 克 思

Karl Marx (1818-1883年)

资 产 阶 级 的 第 一 掘 墓 人

“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细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得不出的结论。”

——列宁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 年)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者 , 无产阶级革命家 ,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 1818 年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一个犹太家庭。曾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 , 主修法律 , 并于 1841 年获得耶拿大学的博士学位。 1842 年 10 月至 1843 年 3 月 他曾任《莱茵报》主编。 1844 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作 , 1847 年出版《哲学的贫困》年底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1848 年 2 月 他和恩格斯接受同盟委托 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共产党宣言》。《宣言》的发表 , 标志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 , 他在巴黎筹建新的中央委员会 , 并当选为同盟主席。 1848 年欧洲革命期间 , 创办《新莱茵报》。革命失败后 流亡伦敦。从 1857 年 8 月到 1858 年 5 月 马克思写成篇幅巨大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一篇《导言》。在这部手稿中 探讨了后来《资本论》中考察的主要问题。 1864 年 9 月第一国际成立后 , 他负责起草了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历届代表大会的重要文件 , 是第一国际的实际领袖和灵魂。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期间 写了《法兰西内战》 系统地总结了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 , 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马克思于 1883 年 3 月 14 日病逝于英国伦敦。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两大发现 ,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 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



言 论

1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

“如果我们选择了使我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的职业，那么我们就应该屈服在它的重负之下，因为这是为一切人而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体会到的就不是无谓的、有限的、利己主义的快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的人。”

3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4

“人类要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必须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充分发展生产力，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入‘像人一样地生活’的理想状态，达到人类最终目的。”

5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

义，作为完成了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6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7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8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9

“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

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10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学术思想

马克思公开而鲜明地宣告他所建立的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从一开始就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作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学说，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思想史上伟大的革命，是对以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否定。它吸收人类思想历史上已达到的一切先进和进步的东西，加以批判地改造，并统一为更高的综合。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他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政治经济学，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其中每一形态都比前一形态高级。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作为说明历史的基础，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做出经典式的说明，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前进和上升的运动，要

经历一个由旧形态到新形态的演化过程。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这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论述其他主要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理解马克思其他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在这一经典理论中，马克思首先明确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学说，并且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它依照人们已经熟知的三步推理，最终得出了只有凝结在商品体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才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正是这种劳动构成商品价值的实体，这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其次，马克思首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区分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而说明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和起源。最后，马克思建立了价值形式学说，以此为基础解释了货币的本质和起源，揭开了劳动价值和货币之谜，打破了对商品的盲目崇拜。

马克思系统论证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发现并且揭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特点，解决了剩余价值的本质与起源问题，撩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面纱。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他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这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实质。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在创建这一学说过程中，马克思确立了剩余价值这个独立范畴；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提出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一新的划分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和矛盾提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一新的理解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剩余价值的实现、转化和分割。具体而言，通过剩余价值揭露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系统研究了剩余价值的起源与本质、生产如何分配等基本

理论。他将劳动时间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论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统一。剩余价值学说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综合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并且发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潜在法则，即阶级斗争的法则。

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另一重大贡献。马克思在这里着重阐明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资本，分析资本积累的进程和历史趋势。他的分析表明，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这种积累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变革的必要，也为实现这种变革提供了可能。他认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条件是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另一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而资本积累的后果是一方面生产力的再生产和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社会总资本再流通领域的形态变换、循环和周转，在总体上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无法避免。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运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理论，从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且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高瞻远瞩，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避免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无法克服的，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一切总根源。无产阶级必须行动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获得解放。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打破资产阶级的枷锁，获得全人类无产者的共同解放。

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之后，马克思又进一步勾画了未来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的美好的社会形态，人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获得了充分的自由和独立，阶级已经消亡，在这个无阶级的社会中，无产者所梦寐以求的经济充裕变为一种现实——剥削消失。收入按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马克思认为，社会进步最终能够使物质极大地丰富起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类历史进入这个阶段时，人们便获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充分自由。马克思勾勒出了一个富饶、自由平等的伟大美好社会的壮观情景，为世代的人们所向往并孜孜追求。



主要著作

《资本论》

《资本论》被认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这部伟大的科学巨著，以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资本论》共分为三卷，主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以及经济运动的规律，第一卷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核心问题是剖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二卷阐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核心问题是剖析了剩余价值的实现；第三卷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和剩余价值理论，核心问题是剖析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历史以及剩余价值的分配。

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达到了自我发展的高度水平。它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商品分析起，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说明资

本主义对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对历史进步的巨大贡献的同时，也科学地揭示出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发展会越来越尖锐化，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进而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

作为一部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资本论》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使之成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它还包含着马克思在历史、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领域闪烁着天才火花的思想，它在各方面都蕴含着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的宝藏。

(胡萍)

凡 勃 伦

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年)

美 国 制 度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凡勃伦给世界带来了一种令人困惑的影响——他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访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静地剖析时下司空见惯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炼成的奇妙产物一样。在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没有其他一个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摆脱环境的微妙钳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领域里，我们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一样锲而不舍的人。”

——威斯雷·米歇尔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年)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者。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农村中一个挪威移民家庭。就学于霍布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1884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受教于美国边际效用论的代表人物克拉克，1890—1906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后因反资本主义学说被迫离职，1909任教于斯坦福大学，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者面目出现，不断发表论著，受到了广大青年经济学者的欢迎。凡勃伦博览群书，研究涉猎很广 对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生物学、自然史、考古学等都有研究。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阐述了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观点。这本书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其他著作包括《企业论》、《德意志帝国和工业革命》、《美国的高级学术研究》、《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工程师和价格体系》、《不在所有权和近代企业》等。



言 论

1

“人们的行为举止是非理性的，人们遵循习俗与习惯，而不是力求效用最大化。”

2

“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群在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方面的一般思想习惯；而在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上由种种有效的秩序整体所构成的生活规划，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广义地把它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而就其一般特征来说，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又可以最终被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类型。”

3

“如果任何社群的结构是由所谓的经济制序所构成，就可以被视作为一个工业或经济机构。这些制序就是这一社群在与之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的接触中继续其生活进程的习惯方式。”

4

“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同别的生物的生活一样，是生存的竞争，因此是一种淘汰适应的过程；而社会结构的演进，却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性格的一些已有的与正在取得的进步，可以概括地认为是出于最能适应的一些思想习惯的自然淘汰，是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而这种环境是随社会的发展、随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断变化而逐渐变化的。”

5

“对实际知识的现代信念可能有充足的根据，也可能没有。人们给了它这么高的地位，或许是对偶像的崇拜，或许是对人的最高、最基本利益的损害。含糊地怀疑这种科学崇拜不完全健康是远远不够的。对这类实际知识的绝对追求，必然在总体上造成人的退化和不安，这既反映在它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影响方面，也体现在实际知识取得巨大进步之后的物质后果上。”

6

“在文化发展进程中，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文明或社会都是时时响应强制性的召唤，根据它（或他）们的天生本能修改其制度方案而得以成长的，不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崩溃就是衰退；本能倾向不同，文明或人民对生或死的选择也就不同，而且选择多半是盲目的。”

7

“企业的动机是金钱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实质上是买和卖，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结果是财富的积累。谁要是目的并不在于增加财产，他就不会参加企业，更不会在独立的基础上经营企业。”

8

“在这样依据收益力的资本估值中，资本估价的核心不是工厂的成本 而是所谓公司的商誉。”

9

“商业的艺术是讨价还价、厚颜无耻、善于推销、制造信仰的艺术，其目标在于以整个共同体为代价使商人获利。有形绩效或普通产品都不是商业的目的。商人的交易所能提供的任

何实质性的用途都跟他的目的完全无关，除非它能间接地影响他的客户而对自己有利。”



学术思想

凡勃伦是美国制度学派的奠基者。制度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有共同点，他们都强调心理因素的重要性。但奥地利学派强调个人心理分析，而制度学派强调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的影响。为此，一些学者也称制度学派为“社会心理学派”。

凡勃伦将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人类经济生活借以实现的各种制度，而制度是由思想和习惯形成的，思想和习惯又是人类本能产生的。他说，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群在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方面的流行思想习惯；而在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上由种种有效的制度整体所构成的生活规划，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广义地把它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而就其一般特征来说，这种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又可以最终被归结为一种流行的类型。

凡勃伦的这种思想显然受到本能心理学派的影响。本能心理学强调本能在人类行为动机中的作用，认为人类的意志活动包括崇高的道德行为都仅仅来自本能的冲动，而本能是生来就有的。受此学派的影响，凡勃伦将“本能主义”心理学作为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凡勃伦认为，传统经济学以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为哲学基础，将人看成是被动的，他们只受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动机和感觉的支配。对此，凡勃伦评价说，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以此为前提的关于自然规律的学说、自由放任的理论等对现实问题也是缺乏解释力的。他将本能引进经济学的研究，用本能来解释思想和工艺技术的演进以至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由思想习惯形成，思想习惯又从

人类本能产生。他的制度分析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心理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凡勃伦说：任何社群的结构如果是由所谓的经济秩序所构成，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工业或经济机构。这些秩序就是这一社群在与之生活在其中的环境的接触中继续其生活进程的习惯方法。他将私有财产、价格、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谋利行为等都说成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也即制度。他认为：随着习惯的进一步改变，那些难以评估且构成过时的法律和习俗系统的关系、惯例、要求权和特惠权，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检视，并根据同一套新的有效性原则而被修改和调整。一些商业新秩序的出现，即是许多如此微小变化的汇聚或正在汇聚的结果，是环境的改变而不是理性设计所带来的结果，甚至这里也许根本不存在主要行为者对结果的任何预见。

凡勃伦运用制度分析方法来寻找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根源。他认为，人具有改进工艺制作的本能和渴求获取利益的本能。社会有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技术制度和满足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私有财产制度。相应地，资本主义存在两个阶级：一个是从事物质生产的阶级，由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等组成，构成技术管理员阶级；另一个是从事商务活动的阶级，由懂事、经理和商业推销员等组成，构成企业家阶级，又称为有闲阶级。前者具有勤勉、守纪律、求实的习惯，是工艺制作本能的反映；后者是人类私有权观念的获取本能的反映，是爱慕虚荣本能的表现。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两种制度表现为现代工业体系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对矛盾正是凡勃伦整个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凡勃伦指出，在产业革命之后，机器操作在生产过程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它可以在物质生产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企业资本家来说，从事生产的目的决不是为创造产物质财富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是为赚取更多的利润。由于企业

家占有财产，企业经营统治着机器操作，生产要由他们领导，所以机器操作虽然具有增进人类福利的可能，但却不能实现功能。他认为，这种矛盾对立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危机的根源在于企业经营而不在于机器操作，更具体地说，在于价格的剧烈波动，而价格问题又是企业家的病态心理引起的——当预期售价大于成本时就投产，造成生产规模扩大，市场繁荣，同时信贷的发展推动了这一过程——一旦发现其售价远远低于实际价格而不能获取利润时，企业就会破产并形成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就会出现。

尽管凡勃伦批判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但他并不主张消灭“有闲阶级”，也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旧制度同新环境（人口，技能，知识的变化）会发生矛盾，成为保守因素和惰性力量，环境变了，人的本能也会发生变化，社会心理也会变化，成为推动新制度形成的因素。而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因而旧制度是可以改良的，这里不会有突变和飞跃，革命是没有必要的。他认为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的矛盾是在社会进化中产生的，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化而得到克服。企业经营的统治只是本能习惯等心理范畴的表现，与资本主义剥削并无必然联系。

作为早期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凡勃伦注重从制度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反对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主张进行“制度”改革，形成了以后所有制度经济学家遵循的“凡勃伦传统”。



主要著作

《有闲阶级论》

1899 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是凡勃伦的成名作，这本书一问世，立即造成轰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人手一册的风行之作。当时一位社会学家告诉凡勃伦，这部大作引起了东海岸的震惊。这本书引起广泛的影响与作者的独特视角及行文风格有关系，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一本书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语，对社会作如此冷静的剖析。

在这部制度学派的经典著作中，凡勃伦对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做了详尽的阐述，他通过对有闲阶级的分析，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并提出改良主张。凡勃伦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两种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制度表现形式不同。他认为在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制度的表现形式是“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也就是运用技术进行机器生产和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主制度。他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企业主制度靠有利的价格获取利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因此，凡勃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和谐的、完善的，而是有矛盾、有缺陷的。而社会结构的发展，实际上是制度方面的一个自然的淘汰过程，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杨丽）

门 格 尔

Carl Menger (1840—1921年)

奥 地 利 经 济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门格尔是一个很少失误的细心思想家，鉴于他缺少适当的数学工具，他的天才就更突出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 熊比特

“门格尔将斯密对经济进步集中于分工的讨论引向对（分散的）知识的更广泛的讨论，在斯密与哈耶克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 史蒂芬

卡尔·门格尔 (Carl Menger, 1840—1921 年) 是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奠定了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门格尔出生于奥地利的新桑地克。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门格尔继承父亲的衣钵，先是在维也纳大学，后转学到布拉格大学研修法律和政治科学。1867 获得克拉科夫大学法学博士，后来在奥地利内阁新闻局任职，1871 年底他写成并发表了其成名作《国民经济学原理》，1873 年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法律系的讲师，后来被晋升为专职教授。1876—1878 年 任奥地利皇太子的私人教师 陪同皇太子鲁道夫周游欧洲。1879 年返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主持经济学讲座直到他于 1903 年退休。1883 年发表《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论研究》，挑起了同施穆勒的方法论论战。1884 年发表《德国历史主义的错误》。他还写过《资本理论》、《货币》两篇论文。他曾经担任过奥地利议会上议院成员以及通货改革委员会委员。退休后，从事研究和写作，身后留下了 25000 多卷藏书。



言 论

1

“我们的福利既然依存于我们欲望的满足，则当我们支配着直接满足我们欲望所必需的财货时，我们的福利自然就得到了保证。”

2

“任何一种特殊欲望的满足，达到一定程度，都会具有相对来说最高的意义，进一步的满足的意义就会逐渐减少，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那个特殊欲望的更多的满足变得毫无意义了。”

3

“一般说来，垄断财货的价格愈高，不能享受垄断财货的个人和人口阶层就愈多，从而这些人口阶层的生活也愈贫苦，而垄断者所销售的垄断财货数量也越少。”

4

“习惯法已被证明常常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利益，相反，立法正是通过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经常改变习惯法的……习惯法‘更高智慧’的理论因而不仅与经验不符，而且与此同时，它的根源在于感觉的模糊，在于理解的错误。它把下列真实际述夸张到了扭曲的程度，即积极的立法有时并没有领会习惯法中不经意的智慧，而且在从提供公共利益的意义上试图改变后者时，又频频造成相反的结果……如果习惯法的规则和制度频频证明自己非常适合于维护公共利益，那么理解这一优势

就是科学的任务……但是科学从来不可能不去检验那些‘有组织地’产生的制度的适宜性，这是正在考虑的问题的基本点。科学必须根据科学洞察的尺度及现有的实践经验改变和完善那些制度，当严格的调查要求这么做的时候，每一个时代都会听从这样的‘召唤’。”



学术思想

门格尔被誉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对经济学领域有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建立的主观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以及只有从已知为真实的假设结论中才能推导出经济学知识的主张，成为构成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两大思想支柱。

门格尔对经济学的第一大理论贡献是价值论。门格尔非常注重定义，而且这些定义也成为他的权威理论的组成部分，并且被吸收到西方经济学的入门教科书中。他的研究起点是商品。他将商品定义为可以用来满足人类需要的因果关系的有用的东西。他说：商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人类的欲望和自由支配满足欲望的资料，是人类经济的出发点和目标。他认为，商品的满足需要的品质和需要本身并不必然是真实的，甚至可能是想像中的。价值是由我们的主观因素（效用或需求），而不是客观因素（生产成本或供给成本）决定，这就是他所提倡的主观价值论。

他认为，既然价值源于人类需求的满足，因此，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也源自于人们的自身需求。人类的需求也就成为了经济交易活动的驱动力，商品的价格水平也就取决于此。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不必然是真实的，而且可以是想像的。因此，人类的需求会大于现实生活中商品能够满足的需求，人们会在最有效的方式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将在所有的可供选择的商品中做出理性选择。主观价值论是门格尔整个经济理论的

核心，它既是门格尔对财货论和经济财货论的发展，同时又为价格论和其他理论提供了依据。

门格尔进一步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这是奥地利学派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和核心。在门格尔看来，需要及满足可以评定。首先是最重要的需要，其次是较少重要性的需要，直至达到最后的饱和。人们首先应当满足对他们有最大重要性的那些需要，然后是较小重要性的需要，直到一切需要的满足具有相等的重要性。由此出发，门格尔得到一种主观价值论：由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有限，他们将首先购买那些能满足较重要需求的商品。生产性的活动是主观满足的行为基础，贸易行为也是一种生产力，人们进行交易的前提是感到获取的商品能赋予人们的效用比自己放弃的商品的效用多。因此，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人们对这些满足的重要程度的认识，从而推翻了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所认为的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力的数量或其他必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

门格尔还认识到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等）也具有价值，并且提出，生产资料的价值是由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决定的。他把物品划分为若干等级，用以说明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成的过程是价值从消费品转移到生产资料的过程。

门格尔的价格论同他的价值论一样，都是彻底的主观主义理论，而且是价值论的延伸和运用。门格尔首先说明了经济交换的基础和界限，对于这个基础，由于它一贯本着主观主义的立场，将交换的界限定在交换双方各自对自己财货的评价不再低于对对方财货评价的那一时点上，这一思想成为其价格论形成的前提。

在门格尔看来，价格论的任务不在于寻求客观意义上的等价物，而在于说明经济人在企图尽可能地满足其欲望的努力上，如何以一定数量的财货相互交换，以此来说明主观意义等价物的形成。他进一步认为，当交换双方各自对自己财货的评价不再低于对对方的财货的评价时，双方各自对财货的评级达

到均衡，价格也就形成了。

门格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他反对德国历史学派所谓的历史方法，主张采用抽象的演绎法。他认为，既然价值源自于个体的感知，因此经济学必须从研究个体开始，个人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一种缩影。因此，找到个人经济的规律，也就找到了社会经济的规律。并且，从个人的心理动机出发，把研究的出发点定在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即消费。

门格尔认为，人类意志决定着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人类欲望和自由支配满足欲望的资料，是人类经济的出发点和目标，经济活动就是避免痛苦和追求享乐。实际上，他仍然秉持边沁的苦乐主义，即社会经济的一般规律应当从个人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欲望中找寻，客观经济规律不过是个人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因此政治经济学完全属于心理学范畴，是实用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价值、价格、利息、工资等都已成为个人的心理感受，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也就是个人追求欲望满足的实现过程。生产只是满足欲望的一种手段。在门格尔看来，消费就是个人的一种消费欲望，是纯生理意义上的欲望的满足。因此，人与物的关系，即个人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物品）的关系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他把一切经济范畴变成了超越时空、适用一切时代的永恒心理现象，把客观经济规律变成了心理状态的外在表现，以此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



主要著作

《国民经济学原理》

《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阐述了门格尔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经济学原理的基本原则，在该书中门格尔提出了边际

效用论的基本观点，奠定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基础。门格尔把个人心理的分析作为经济研究的起点，他说，人类意志决定着人类经济活动的结果，人类欲望和自由支配满足欲望的资料是人类经济的出发点和目标。这样，经济活动就被说成是追求享乐和避免痛苦，政治经济学就成为研究快乐与痛苦关系的学科，成为心理学的一部分，因此，人们的心理状态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起点。

该著作详细论述了经济学方法论。门格尔认为，经济史和经济理论都能对经济现象进行认识，但经济史只能作为经济学的补充学科，而决不能代替理论经济学，只有理论经济学才能突破直接经验的特定局限，建立一种永久的、普遍的经济原理。这样，经济学研究就必须采用严密的“抽象演绎法”。这种方法是使人类经济的复杂现象还原成为可以进行单纯而确实地观察的各种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加以适合于其性质的衡量，然后再根据这个衡量标准，以再从这些要素中探出复杂的经济现象是如何合乎规律地产生着。简言之，就是运用抽象法找出经济现象的运动规律，从而解释经济现象。不过，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方法始终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

(周光辉)

帕累托

Vilfredo F.D. Pareto (1848-1923年)

别具一格的经济思想家

“人们很难把帕累托归入哪一流派，他不奉承任何‘主义’。没有任何信仰或政党能够将帕累托揽入自己门下，虽然从他驾驭的广泛的知识领域里，许多信仰和政党可以从中窃取一些段落为己所有……极端放任主义的崇拜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采摘许多章节来支持他们的意见，可是他对自由主义的‘财阀政治的民主’或‘财阀政治的蛊惑宣传’的轻蔑是最为彻底的。社会主义应当感谢他，因为我们看到他对社会主义学说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并对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的反社会主义措施提出了抗议。然而他不仅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而且属于那些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由于轻蔑而带有讽刺的反社会主义者。”

——熊比特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F.D.Pareto, 1848—1923 年) 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 , 其父因参与马志尼的密谋而被迫逃亡巴黎 , 直至 1854 年左右政局有所变化才返回意大利。帕累托大学时代攻读工程学和数学 , 1869 年获工程博士学位 , 毕业之后在意大利铁路和重工业公司任总裁多年。业余时间广泛阅读了哲学、文艺、宗教领域的文献 , 在他的一生中接触经济学较晚 , 他在 1891 年以前并不熟悉瓦尔拉斯的著作 , 后来因投身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运动 , 在 1876—1892 年间曾经发表多篇经济学论文 , 凭借丰富的工业管理和政治活动的实践经验和扎实的数学与工程学的理论基础 , 他的经济论文获得了很好的声誉。由此在经济学领域也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后来在经济学家潘塔里阿尼的影响之下 , 从事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 因此也受到了瓦尔拉斯的赏识。他于 1893 年继瓦尔拉斯之后任洛桑大学教授 , 将瓦尔拉斯在洛桑建立的数学和一般均衡经济学的传统继承并发扬光大 , 为建立洛桑学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因为健康原因辞去教授职位 , 退休后隐居于日内瓦湖畔的一个乡村 , 但仍积极从事学术研究 , 1923 年去世。帕累托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教程》等。



言 论

1

“把最大满足状态定义为这样一种状态：从这种状态不可能有一点微小的变动，否则，每个人的满足（除了维持不变者外）全都会增加或减少。”

2

“一个集体的各成员，处在一定条件下便会享受最大限度欲望满足；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种稍微离开这一状态就使他们所享受的满足增加或减少的方式。这就是说，任何偏离这一状态的微小变动，必然造成一些人乐意接受，而另一些人难以接受的后果，即一些人享受的满足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却减少了。”

3

“我们看到，社会状态的变迁一般来说是很缓慢的。社会整个来说常常表现出对试图改变它的内部和外部势力的十分强有力地反抗。来自社会的偶然运动，被社会所引起的相反方向的运动所中和，这些运动最后以失去势头而告终，所以，社会可以在一种均衡或静态均衡的状态中加以观察。准确地说，这里的问题不是静态均衡而是动态均衡，整个社会被卷入缓慢改变着它的一般运动之中，人们称这种运动是进化。”

4

“人们可以通过搜集消费者的偏好相对物价的变动而变化的资料 来记录和研究市场行为。”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某种经济情势下，通过某种运动而远离这种情势，继续无限制地运动以增加所欲望的所有物品的数量，那么我们就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能够拥有满足欲望的一切，这显然是一种均衡状态。”

6

“纯粹的经济学表明，关税保护必然导致财富的消失。实用经济学已证明了这个推论。但二者都无法告诉我们，英国的自由贸易在同一时间与美国、德国的关税保护并存。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英国依靠自由贸易，而德国正相反依靠关税，但二者都得到了发展。”



学术思想

帕累托有“数理经济学之父”之称。现代的新福利经济学是沿着帕累托的社会福利体系理论发展起来的。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新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帕累托的经济理论虽然为洛桑学派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他的许多理论观点与瓦尔拉斯的思想也有很大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他在边际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例如：(1) 他采用比基数效用论更适用的序数效用论；(2) 在他的理论中，最适度条件被归结为生产和交换的均衡，而不论分配关系如何；(3) 他认为，在私有制下可以通过改良主义措施向“最适度”迈进，只要存在完全的自由竞争，就可达到“均衡”和最适度状态。

帕累托补充并且发展了瓦尔拉斯的稀缺价值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他以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为基础避开关效用无法测

量的难题，并且将数学方法运用到更广的范围，进一步论述了一般经济均衡理论。此前，瓦尔拉斯等人曾提倡基数效用论，认为边际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可以用基数 1, 2, 3……来表示边际效用的绝对值，并且可以在个人之间进行比较。帕累托最初也是坚持这一观点，但他后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某种物品的边际效用，不可能说出它的绝对值，并在个人之间进行比较，事实上这用效用将无法衡量，但效用可以用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表示或者比较两种或两组物品效用的大小，或者它们效用等级的高低，或者它们之间不存在差别。序数效用论的特点，就是不表示效用的绝对值，而仅表示消费者对各种物品组合的偏好程度。这样就既显示了效用的大小，又避免了效用计量的难题。

帕累托以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了无差异曲线。帕累托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消费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商品时，他可以增加对第一种商品的消费而减少对第二种商品的消费，或者减少对第一种商品的消费而增加对第二种商品的消费，但他所得到的总效用是不变的。进而，许多商品的组合相对于消费者的选择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在坐标图中，他把不同的组合点连接起来得到一条曲线，把这条曲线定义为无差异曲线。

帕累托认为，经济生活中的规律，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所遇到的“障碍”之间的均衡，而这两者的均衡贯穿于生产、交换和分配等各个领域，存在于包括自由竞争在内的各种不同经济条件之中。帕累托比瓦尔拉斯更充分地发挥了社会和经济是各种力量相互依赖和均衡的结果这一观点。他指出：社会状态的变迁一般来说是很缓慢的。社会整个来说常常表现出对试图改变它的内部和外部势力的十分强有力的反抗。来自社会的偶然运动，被社会所引起的相反方向的运动所中和，这些运动最后以失去势头而告终，所以，社会可以在一种均衡或静态均衡的状态中加以观察。准确地说，这里的

问题不是静态均衡而是动态均衡，整个社会被卷入缓慢改变着它的一般运动之中，人们称这种运动是进化。

在序数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状态”，即社会最大满足的条件。他主要是关于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他认为，一个集体的各个成员在一定条件下便会享受到最大限度的欲望满足，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种稍微离开这一状态就使他们所享受的满足增加或减少的状态。帕累托指出：假定我们稍微离开了某种状态，集体中的每个人的福利增加了，那么，很明显，这个新的状态对每个人是更有利的；相反，如果每个人的福利减少了，这个新状态就较少有利了。其中一部分人的福利可能维持原样，这不会改变上述结论。帕累托认为，能使每个成员的满足达到最大化的途径依赖于两个根本问题的解决：一是分配问题，即社会所拥有或所生产的物品在它的成员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二是生产问题，即怎样生产经济物品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帕累托虽然对数理经济学有突出贡献而闻名于世，在他晚年时却开始批评与否定数理经济学。他舍弃了将经济学形式化的倾向，试图将政治和社会学变量与他对经济体系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由于帕累托在边际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在使经济学更加数学化方面的开创性努力，帕累托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一位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讲义》

《政治经济学讲义》是帕累托的早期作品。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边际效用理论、生产理论和福利经济学等许多新的见

解，其中一些后来被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定理。这在经济学家中是少见的他说：“一个集体的各成员，处在一定条件下便会享受最大限度欲望满足；这种条件是，不可能发现任何一种稍微离开这一状态就使他们所享受的满足增加或减少的方式。这就是说，任何偏离这一状态的微小变动，必然造成一些人乐意接受，而另一些人难以接受的后果，即一些人享受的满足增加了，另一些人的却减少了。”此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原理的基本概括

帕累托承认主观效用无法用数量测定。指出，人们一直把享乐、使用价值、经济效用和满足欲望的能力当作是一种数量，但是没有对此作出证明即使证明了这一点，也不能测定这个数量。帕累托主张以“满足欲望的能力”来代替“经济效用”，以“基本满足欲望的能力”来代替“边际效用”。以无差异曲线方法和先后次序来比较“满足欲望的能力”。该说法备受经济学界重视。

帕累托在著作中表明的最基本的观点，即“帕累托最适度原理”，对福利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现代的新福利经济学是沿着帕累托的社会福利体系理论发展起来的。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福利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沈晓英)

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年)

边 际 效 用 学 派 的 创 立 者

“在英国，他从未得到他所应得到的东西。特别是他的创造性从未按其所应得的得到人们的承认。因为毫无疑问，他是古往今来真正最有创造性的经济学家之一。”

——熊彼特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 年) 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既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立者之一，也是数理经济学派的一个代表。杰文斯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之中，后来由于父亲的产业破产，他没能完成大学学业，18 岁时曾短期辍学去澳大利亚，在色德勒造币厂当化验员，他十几岁时就成为了设在悉尼造币厂的分析专家。从 1858 年起 对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及社会问题发生浓厚兴趣，1859 年回到伦敦，学习逻辑学和经济学。1863 年在欧文学院工作 不久 他成为逻辑学、心灵和道德哲学的教授。他对经济学和统计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研究太阳黑子的活动来解释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周期性。1870 年 弗里明·詹金的《供给与需求规律的图示方法》一文，促使他于 1871 年 10 月发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6 年离开曼彻斯特，在伦敦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880 年脱离一切教学工作，倾尽所有时间致力于研究和写作，被选为伦敦统计协会（皇家统计协会前身 副主席。1882 年 在一次落水事故中死去 —— 还不到 47 岁。杰文斯的著作主要有《煤的问题》、《商业危机和太阳的爆发》、《商业循环》、《国家与劳动的关系》、《通货与金融的研究》、《逻辑要义》、《科学理论》等。



言 论

1

“不是劳动使物品有价值，而是物品有价值使得人们值得为它们而劳动。”

2

“从两人和两种商品的情况所得出的交换原理，对任何数量的当事人和商品也是适用的，它不仅适用于国内的一般贸易，而且适用于人群和国家之间的贸易即国际贸易。”

3

“我从一些数学原理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先前已经得出的全部主要规律，我只是把他们搞成一系列精确和有联系的定义、公理和理论，就像许多几何学问题一样。最重要的公理之一是，随着一个人所消费的任一商品（例如进餐）数量的增加，各自所用的最后一部分商品的效用或福利在程度上是减少的。进餐的开头和结束之间享乐的减少可以作为一个例证。我认为，一般来说，效用的比例是商品数量的某种连续的函数。事实上，政治经济学家们在更复杂的形式上，以供给与需求规律名义已经提出了这个效用规律不过一旦以简单的形式对它加以适当表述，它便揭示出了问题的全部……”

4

“表现最后效用程度的函数的变动，是所有经济问题中最关键之点。作为一个普遍法则，可以表述如下：效用程度随商品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商品数量增加，效用程度最终会减少。”

5

“读者还将发现，在一个简单例证中，决不存在这样一种企图，去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和另一个人心中的感情量。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进行这种比较。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可能比另一个人心中的感受性大 1000 倍，不管我们是否知道。但是假定这种感受性相似比率在一切方向上都不同，我们将永不可能发现这种最深奥的差别。每个人的心对别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感情不可能有公分母。”

6

“快乐与痛苦无疑是经济计算的最终目的，以最小的努力满足最大欲望，以最小厌恶的代价获取最大欲望的快乐，使快乐增至最大限度，就是经济学的任务。”

7

“在哲学及科学领域内，权威历来是真理的敌人。专制的宁静，通常是谬误的胜利。在科学的共和国内，叛变与无政府的现象最终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8

“在我看来挖掘黄金本身对于全世界几乎总是一桩白费劳动的买卖——正像一国政府发行通货过度以致使它贬值一样，是危害人民的坏事。”

9

“我试图把经济学看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这样处理经济学说同静态力学非常类似，而交换规律财富的性质用无穷小量快乐和痛苦的考虑来加以说明，正像静力学的学说是基于无穷小能量的均等一样。”

10

“我想人们有些担心政治经济学的权威著作家的影响太大。我反对容许对任何人的崇拜来阻碍研究，不管这个人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还是亚当·斯密或亚里士多德。”



学术思想

杰文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边际效用学说，重新解释了交换理论和分配理论，由此成为了“边际革命”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具有坚实的数学功底，他倡导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开创了经济学的数理学派，并且把经济理论与统计资料相结合，为计量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杰文斯所处的时代，传统古典经济学在当时学术领域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具有牢不可破的气势，许多学者都是传统古典经济学的忠实维持者与拥护者。而杰文斯却完全自觉地向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发起了挑战，他宣称要遵循一条与古典经济学派传统截然不同的路线，要重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经济学。他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以及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在他看来，古典的经济理论除了人口理论和地租理论之外，其他理论已经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特别是其中的工资基金的学说更是迂腐至极。杰文斯对古典经济学所发出的挑战和提出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主观主义原则为基础改写了经济学的一系列理论和原则，包括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价值理论和价格理论、资本学说、劳动学说、分配理论等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他在坚持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演绎法的同时，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用数学的原理（主要是运用微积分）来表述和说明经济学原理，以此来创立“自利和效用的力学”。

杰文斯分析的起点是效用理论，在此之前，他曾提出过“苦乐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快乐和痛苦无疑是经济学计算的最终对象，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欲望达到最高度；以最少量的不欲之物而获得最大量的欲取之物”，换句话说，“使快乐最大化，是经济学的问题”。在苦乐论的基础上，杰文斯以主观心理分析为出发点，以效用论为基础，以数学分析为工具，提出了自己的主观效用理论。他认为效用需要是由一个人的幸福或快乐的增加量来计算的。杰文斯用人的欲望及满足作为起点来论述其主观效用价值论。他用个人欲望满足的心理感觉来解释商品、效用、价值等概念。例如，他认为商品是能够提供快乐或避免痛苦的物品、资产、价值等；认为效用是快乐的产物，不是物品生来具有的内在的属性，仅表示物品与个人福利之间的关系。人的直接意向是一物在当时是否有用的惟一标准。效用是主观心理现象，主观效用是商品价值的基础。价值的有无、多少完全取决于效用，是一物满足人的欲望的程度或估计，是主观的东西，不是商品的内在客观属性。

在价值量的决定上，杰文斯是以“最后效用程度”作为主观价值的衡量标准。商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他指出某种商品在一定数量之前是绝对必要的，更多的数量有不同程度的效用，但超过了一定数量之后，效用就逐渐降低为零，甚至变成负数。他进一步区分了总效用和后来学者所定义的“边际效用”，认为总效用是一个人从物品的消费所获得的总的幸福量，即全部现有产品各单位的实际效用的总和，最后效用程度（即边际效用）是“对于现有的存量而言的最后增加的效用的程度，或者说有可能的很小或者无限小的进一步的增量”，就是说，随着占有量的增加，欲望随之降低，效用也跟着减少了。他还以水为例来进行说明：“我们只能说在一定数量之内，水是不可缺少的，其增量会有不同的效用程度；但超过一定量后，效用会逐渐减少到零甚至成为负数。”

在效用论的基础上，杰文斯进一步阐述了交换理论，交换

理论是杰文斯全部经济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在这里给自己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确立交换法则及其适用的条件，进而解释他的法则同流行的价值原理——供求论和劳动论的一致或对立的关系。他认为，交换在效用最大化和劳动的节省上是一个如此重要的过程，以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只研究这一过程。效用来自商品，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合的数量为需要它的人所占有，而交换比其他任何方式都能更多地得到效用。他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方程式：一个交换者以一种商品换取另一种商品时，他总是比较这两种商品的最后效用以决定他到底愿意放弃多少他自己的商品以换取多少对方的商品。交换者总是要求交换的结果达到最大的效用，因而达到这个结果的条件就是当这两种商品的增量的交换比例恰好使这两个商品的效用对于交换双方都相等。杰文斯的理论以交换为核心，把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都归结为买卖行为，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交换最终结果总是趋于均衡的，在该均衡点上，买卖双方都能达到效用的最大化。进而，从全社会来说，一切通过交换的产品分配都将产生最大的利益。

在对主观价值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的基础上，杰文斯提出了自己的劳动理论，他给劳动下的定义是：劳动是我们所忍受的痛苦的奴隶，其目的在于防止更大的痛苦，或获得净剩余的快乐。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杰文斯更加强调劳动同痛苦的联系，并以加在劳动上的痛苦量作为劳动的尺度。他指出：诚然，劳动可能既在当时快意又对将来有益；但它的快意是有限的，大多数人都为欲望所驱使而从事更久和更重的工作。杰文斯最终把劳动归结为给人带来痛苦的一种活动，他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强调劳动和效用在根本性质上是相同的量，都是人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因此，必须把劳动本身的感受和劳动生产物的效用结合起来一并加以考虑。这种把劳动解释为带来痛苦的“反效用”，并以人在劳动中所感受的苦乐感的均衡点来说明劳动日的最佳长度的思想，对后来边际学派的发展产生了明显影响。



主要著作

《政治经济学原理》

《政治经济学原理》是杰文斯的代表作。本书考察了在既定的所有权结构下，经济人如何通过生产、交换、消费以获得最大的满足。他以快乐痛苦理论为哲学或伦理学基础，以边际分析为工具，以人的需求为理论起点，以生产与分配为归宿，构建了其经济学理论体系。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宗旨是以最小的痛苦换得最大的幸福。商品及其效用能给人带来满足，也会给人带来痛苦。在一般情形下，边际效用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经济学上称之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以，当一种商品具有多种用途时，要使效用最大化，必须使配置到每一种用途上的商品量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

杰文斯还利用边际法则分析了劳动、地租、资本、工资、利润等。他指出，劳动对劳动者而言，会引起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负效用，劳动时间越长，负效用越大；另一方面，劳动得到的产品能给劳动者带来快乐。当劳动者从劳动产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等于劳动引起的边际负效用时，劳动者就会终止劳动，这时，他得到的总效用最大。他认为劳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很经济地在各块土地上分配其劳动量，劳动产品增量与劳动增量的比率将相等。杰文斯还把资本定义为维持各种有用工作的劳动者所必需的诸种商品的总称。指出，利息率取决于边际产品与边际资本的比率，自由资本的利息率有在一切职业上互相一致的趋势。《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奠定了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学派和数理学派中的地位。

(左岫仙)

威 克 塞 尔

Knut Wicksell (1851-1962年)

瑞 典 学 派 的 奠 基 人

“作为一个货币理论家，他在死后赢得的国际威望甚至比马歇尔和瓦尔拉还要大。”

——熊彼特

“只是由于这位伟大的瑞典经济学家，才使得直到这一世纪末叶仍然隔离的两股思潮，终于确定地融而为一。”

——哈耶克

“没有掌握威克塞尔的《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一卷的全部理论的人，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经济学学生应受的训练。”

——熊彼特

纳特·威克塞尔(1851—1926年)是瑞典经济学派的第一代杰出的代表和理论奠基人。威克塞尔出生于斯德哥尔摩,17岁进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数学,1876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880年因发表关于饮酒原因分析的演说,被一些人指责其缺乏经济学知识。由此,他改学经济学并于1895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威克塞尔曾留学英、奥、德、法等国,深受李嘉图、庞巴维克、瓦尔拉斯的影响。回国后长期任教于隆德大学,1900年任副教授,1903年升教授,1916年退休。威克塞尔以其著名的《价值、资本与地租》(1893年)和《利息与价格》(1898年)两部书,首次将宏观动态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其中《价值、资本与地租》一书比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晚三年,所以从时间上看威克塞尔与马歇尔是大致在同一时期分别各自建立其理论体系的。在1901—1905年期间威克塞尔又将《价值、资本与地租》和《利息与价格》这两部原以德文写作的书合并修订为两卷本,以《国民经济学讲义》为书名用瑞典文出版。正是这本书中提出的积累过程原理,为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言 论

1

“过去提出来的惟一特殊的货币价值理论，同时也许是惟一可称为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理论是货币数量学说。”

2

“如果不使用货币，一切借贷以实物资本形态进行，在这样情况下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率……称之为资本自然利率。”

3

“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异，决定物价水平甚至经济的规模。”

4

“货币的使用……或滥用……可在实际上积极地影响着实物交换和资本交易。滥用货币（如政府纸币）可破坏大量的实物资本并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生活陷入绝望的混乱。但另一方面，通过货币的合理作用，在实际上又可能积极地促进实物资本的累积和一般生产的增加。”

5

“有些人以为利率的一次单独的，但是持久的变动其影响只能限于眼前的冲击。事实是经仔细考虑后，情况往往显得完全不同。可以假定，低利率的维持如其他情况无变化，其影响不但是恒久的，而且是累积的。”

6

“(经济学)已愈来愈成为相互依存着的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的学说。”

7

“只要价格没有变动，银行的利率也不变动，如果价格上涨，利率即应提高；如果价格下跌，利率即应降低；以后利率保持在新的水平上，除非价格发生进一步的变动，要求利率向这一方或那一方作进一步的变动。”

8

“一般说来，不加限制的自由总比错误的限制和强制制度可取。只要一国的政府建立在民主主义的原则上，那就存在着这种措施只在其有利于大多数人时才被采取的确定（虽然不是常常可靠的）保证。而当商业和工业政策掌握在拥有特权的少数人手中时，那就很可能推定其将走上相反的方向。”



学术思想

威克塞尔对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货币和利息理论方面。他在对旧的货币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积累过程学说。该学说使得处于分离状态的传统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从而为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威克塞尔认为，现实经济已不再是物物交换经济，如果不分析货币的性质和作用，就不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在经济分析过程中就会犯错误。而按照旧的货币数量论，货币的价值或其购买力的变动与其货币数量的变动成反比。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数量的增加或减少，将使其对其他商品

的购买力同比例地降低或提高，从而使物价相应地上涨或下跌。对于这种提法，威克塞尔认为该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货币数量论没有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价值和物价的影响，单纯认为货币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成反比例变化是把事物太简单化了。他说：因为货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必常与一定时期内与货币交易的货品和劳务的总价值相一致。这不只是一个理论，而且是一个公理。第二，货币数量论没有考虑到信用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第三，货币数量论是一种静态经济分析，没有考虑到货币数量对物价的影响的时滞。第四，货币数量论没有考虑人口、技术等对商品供求量变化和价格的影响。第五，货币数量论没有考虑到利息率的变动对商品价格的影响，因而无法认识到货币数量变动和经济变动的相互影响。由此，威克塞尔以利息率作为纽带，将货币数量的变动和经济周期的变动联系起来。

威克塞尔首次将利息率区分为自然利息率与货币利息率。这个区分在经济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所谓货币利息率，是指借贷资本的利息以货币形式所表现的利息率，即在货币经济中，企业家向资本家借入的资本和偿付的利息都以货币形式表现，二者的比例即是货币利息率。自然利息率是威克塞尔积累过程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没有货币参加的实物经济中，借贷资本的储蓄与需求相一致时的利息率。自然利息率的高低决定于资本的供求状况。为了说明自然利率的产生，威克塞尔假定了一个没有货币参与的经济生产，企业家在向资本家借入和归还资本时均以实物进行，偿付的利息也以实物计算。这个利息与所借资本的比就是自然利息率。

威克塞尔又指出价格水平的变化是由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两者共同决定的。其他如货币供给的变化、人口以及技术的变动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物价，但根本上还是通过这两种利率间接起作用。当货币利息率与自然利息率相等时，企业家能够获得正常利润，故不会产生对资本的需求，也不会扩大生产规

模，从而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物价稳定。当货币利息率低于自然利息率时，其价格水平将上涨，而且是积累性地上涨。反之，当货币利息率高于自然利息率时，其价格水平将下降，而且是积累性地下降。

从威克塞尔所描述的价格变动的积累过程可以看出，威克塞尔的价格积累过程原理从本质上可以划归为货币均衡理论的范畴内，因为它也是强调以货币和利率二者的相互联系建立起经济均衡体系。但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认为社会经济经常处于均衡状态，或者说把均衡态视为一种必然的趋势；相反，他认为经济经常处于扩张或收缩的积累变动过程之中。这是威克塞尔货币均衡理论与其他一般均衡论的重大区别。

威克塞尔还详尽分析了两种利率差异的产生以及利率与价格的相互变动关系，以便为政府制订稳定物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他认为，物价稳定是经济正常发展的前提，物价的波动则会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由于物价波动的根源是两种利率的差异，所以制订政策的关键应是调整两种利率的差异使其趋于一致。由于自然利率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以及工资和租金水平，所以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中央银行根据经济情况和信贷能力随时调整货币利率，从而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他说：只要价格没有变动，银行的利率也不变动。如果价格上涨，利率即应提高；如果价格下跌，利率即应降低；以后利率即保持在新的水平上，除非价格发生进一步变动，要求利率向这一方或那一方作进一步的变动。

威克塞尔的积累理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威克塞尔是以两种利率差异变动作为桥梁，将货币数量变动与经济周期变动联系起来，这为后来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经济理论开辟了一条重要的新思路。其次，威克塞尔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宏观经济均衡体系。他根据积累过程理论，把两种利息率的差异作为影响价格和经济波动的关键因素，认为只有在两种利率一致的情况下，资本的供给和需求

才会一致，否则便会诱发经济波动。由此，威克塞尔建立的积累过程学说是一个宏观经济均衡体系。他是宏观经济均衡体系的最早创始人。最后，威克塞尔首次将利息率区分为货币利息率和自然利息率，这不仅为自己的积累过程原理提供了一个颇具开创性的理论基础，而且还对后来货币学派的自然利率概念有重要的启示。可见，威克塞尔不仅仅是瑞典学派第一代经济学家中的杰出代表，其理论的深远意义更在于它对整个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先导性探索。他的经济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凯恩斯革命”的序曲。



主要著作

《利息与价格》

《利息与价格》是威克塞尔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威克塞尔提出了著名的积累过程学说。该学说使得处于分离状态的传统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从而为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威克塞尔在书中对自然利率做出独特的概念规定，并以此为中介阐述货币流通量的变化是如何通过对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影响，进而决定物价水平。他指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经常背离，只有二者保持一致时，商品价格才不会波动，经济才会处于均衡状态。为了实现经济的均衡，银行必须根据经济情况和信贷能力随时调整货币利率，使之与自然利率相一致，实现货币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本书所阐明的货币经济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均衡状态，所以只有依靠宏观的货币政策的调节才能趋向均衡，这就否定了资本主义经济会自动走向均衡的传统教义。虽然它对

货币价格变动和经济不稳定的原因的分析存在一些缺陷，但它能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角度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状态，这与那些主张资本主义经济和谐论的传统观点相比，确实是一大进步。它打破了经济能自动趋向均衡的传统观念，提出以调节货币利率来稳定经济的宏观货币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学由自由放任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石雨)

克 拉 克

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 年)

美 国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对经济理论稍感兴趣的所有美国经济学家和许多外国经济学家，当然都受到克拉克的很大影响，并且从他那里得到教益。”

——熊彼特

约翰·贝茨·克拉克 John Bates Clark, 1847—1938

年)出生于工商业者家庭,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边际生产力学说”的创始人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美国“理论学派”的创始人。他于1872年毕业于美国安默尔斯大学,随后留学德国汉堡大学,成为旧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卡尔·克尼思的学生。回到美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卡尔顿、斯密斯、安默尔斯、哥伦比亚等大学经济学教授。他还一度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克拉克的理论是在美国传统的阶级调和论和边际主义基础上提出的。克拉克不仅创造了所谓“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还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他所创立的美国理论学派与制度学派一起构成了美国那一时期经济学的两大流派。他建立了一整套经济理论体系,来为资本主义合理性进行辩护,这就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克拉克的一些理论原理和方法,现在仍然保留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中。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是1899年发表的《财富的分配》,该著作也成为他的成名代表作。此外还有1886年发表的《财富的哲学》和1907年发表的《经济学理论要义》等著作。



言 论

1

“农业是其他技术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但是，在土地不得不荒废下来的时候，无论是从事水上工作或非水上工作的人的其他技艺也都将处于垂危的境地。”

2

“社会收入分配由自然法则所支配，若该法则的运作没有摩擦，那么分配给每个生产代理者的财富的数额就是该代理者所创造的财富。然而工资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由谈判来调整，通过谈判而形成的回报率往往等于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工业产品部分……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受到阻碍，（经济体系）将把每个人生产的特定产品分配给个人。”

3

“一个状态不可能如此之好，以至于缺乏进步也不会使它枯萎；它也不可能如此之坏，以至于进步的事实也不会拯救它……对经济制度的决定性检验是运动的速度和方向。”

4

“如果一种消费品一个一个单位连续不断地供应，它的效用就会愈来愈少，同样，生产者的工具或各种形式的资本，如果是由一个人使用，那么数量越多，生产能力愈低，最后一个工具对人所能增加的效用，比先前那些工具来得少。”

5

“对劳动者来说，有必要防止饥饿或者沦落到被救济的境地；对于收入尚丰的工匠，还似乎有必要为后代作好准备，以使他们和自己处于同一阶层；对于由于企业成功而超出工匠阶层之上的资本家来说，似乎有必要使后代超出他使全家已经超出的那个阶层；并且，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所有更加富裕的阶层。一个人维持生活地位的韧性要超过他增加当前消费的欲望，而他保证后代的某种生活地位的雄心又远远超过他增加自己当前消费的欲望。”



学术思想

克拉克是边际效用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代表，是 19 世纪末几个独立发现边际效用和边际生产力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继承并修正了西欧流行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同时吸收了生产三要素论、资本生产力论和报酬递减论等理论，提出了其独特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并利用该理论证明当时的收入分配是公正与公平的。

克拉克把经济学按照一种新的方法分成三类进行研究，并把这种分类方法作为其整个分配理论的前提。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应当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般经济学，是研究一般经济现象和经济的普遍规律的。一般经济现象就是存在于任何社会中的经济现象，例如，人要生活就要生产财富，要生产财富就离不开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应当介绍财富的生产分配与消费的普遍规律，主要包括消费品级差效用规律、资本级差效用规律和劳动级差效用规律。

第二部分是静态经济学，它研究的是静态经济规律。研究

静态社会下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是在社会组织不变、企业性质不变和消费倾向不变等情况下的生产和交换规律。他并且认为静态社会是一种抽象的假想，但只有在这些因素不变的静态中才能发现自然的、正常的规律，也才能看到经济规律的作用和结果。

第三部分是动态经济学，它研究的是动态经济规律。研究动态社会下财富生产和分配所发生的变化，也即在社会组织和活动方式不断变化，如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采用、新的动力和新的原料不断用于生产，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等条件下，静态社会经济规律会发生什么变化，发挥怎样的作用。动态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解释静态社会的均衡状态如何受到破坏、静态正常规律的作用如何被阻止和改变，说明如何从一种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状态。

克拉克把静态经济和动态经济合起来，称为由交换引起的社会经济，以区别于一般经济；把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合起来称为交换经济学。克拉克认为，一般经济学是社会经济规律的前提，社会经济规律是一般经济规律的应用，他还指出，一般经济规律包括：(1)一个人的经济生活，归根到底是一种以自然物质为手段，来间接地为自己服务的过程，这种手段便是财富在任何经济制度下，人类总是以物质为媒介来为自己服务的。(2)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是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规律。(3)各个生产要素的生产力递减规律，是一个普遍规律。

克拉克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创造了收入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它论证了“分配的自然规律”，极尽为剥削辩护之能事，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喝彩。边际生产力论是资产阶级宣扬阶级利益调和论的一个重要论据。在该理论中，他扩大了边际概念的应用，把它作为直接说明各生产要素分配份额大小的原则，并建立起一个以边际效用为基础，以分配为中心的经济理论体系。根据边际生产力理论，由于资本或机器设备对商品生

产的贡献，利润被证明是合理的利润是对资本的报酬，不是掠夺性的再者，即使工人们没有获得在工作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只要他们获取了他们的边际产品，那么对他们的报酬就是公平的。

关于工资的决定，克拉克认为，各种生产要素都具有生产力，都创造价值，因而都应当从生产成果中取得相应的报酬。工资是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他的论证是：静态条件下假定资本数量不变，而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这样每个单位工人平均摊到的工具或设备就会逐渐减少，技术供给情况逐渐恶化，则每一个单位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必然递减，这就是劳动生产力递减规律。最后增加的那个单位的劳动的生产率最低，这就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最后增加的单位工人就是边际工人，最后一个工人的劳动就是边际劳动。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决定工人工资的自然标准，是因为克拉克假定他们的素质是一样的，可以相互替代，如果有的工人需要更高的工资，雇主可以解雇他，用边际工人替代他，所以边际工人的工资就决定了全部工人的工资标准。克拉克这里所说的工资，除了雇佣劳动报酬以外，还包括企业家的平均利润，他把平均利润视作企业家组织管理企业经营活动的劳动报酬，把企业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称为利润。

关于利息的决定，克拉克认为，利息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在工人人数不变，资本数量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则单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断减少，新增资本所提供的产品数量也会递减，这就是资本的生产力递减规律。最后增加的单位资本叫做边际资本，它所增加的产量最小，生产力最低，叫做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即边际资本的增产量决定利息率的标准。而且，它不仅决定边际资本的利息，也决定全部资本的利息标准。

在克拉克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欧洲是经济学思想的中心，但由克拉克率领的一支美国经济学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创立的美国理论学派与制度学派一起构成了美国那一时期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克拉克本人也成为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

◆ 主要著作

《财富的分配》

《财富的分配》论述了边际生产力的分配理论，在本书的绪论中，他提出该书的精髓：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表明社会收入会配由自然法则所支配，若该法则的运作没有摩擦，那么分配给每个生产代理者的财富的数额就是该代理者所创造的财富。然而工资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自由谈判来调整，通过谈判而形成的回报率往往等于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工业产品部分……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受到阻碍，（经济体系）将把每个人生产的特定产品分配给个人。

作者在著作中发展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同时吸收了生产三要素论、资本生产力论和报酬递减论等理论，提出用边际生产力来论述分配问题，认为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各自决定工资和利息的分配理论，并利用该理论证明现有的收入分配是公正与公平的。作者还明确区分了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动态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本书被誉为“以现代方式出现的第一部主要的美国著作”。

（马莉）

马 歇 尔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年)

剑 桥 学 派 的 创 始 人

“当我来到剑桥开始读经济学时，马歇尔的《原理》就是圣经。除此之外 我们知之甚少……马歇尔就是经济学。”

—— 罗宾逊夫人

“我们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在马歇尔学说中熏陶出来的，马歇尔的学说已深入人心。”

—— 凯恩斯

阿尔弗雷得·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年) 出生于英国西部克拉芬地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年轻时笃信宗教。幼年时喜爱数学。中学毕业后先是就读于牛津大学，1861 年进入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1865 年毕业后留校任研究员，辅导数学。在此期间，他深受达尔文《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影响。1868—1877 年，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道德哲学特别讲座的讲师，在此期间，他曾赴德国研究康德哲学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开始接触到德国历史学派罗雪尔的经济学。回国之后，又研究了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此他的学术兴趣转向了经济学。1887 年离开剑桥大学到布里斯托尔大学任院长兼经济学教授。1883—1884 年接替牛津大学逝世的著名经济史学家 A·汤恩比任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讲师，讲授经济史。1885 年返回剑桥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期间创立了剑桥经济学院，1908 年从剑桥大学退休，1924 年去世。马歇尔是近代西方影响最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他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所以他和他的门徒被称为“剑桥学派”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著作，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剑桥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马歇尔成为“新古典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



言 论

1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一切的人初入世界都应有过文明生活的公平机会，不受贫困的痛苦和过度机械的劳动的呆板影响，这真是不可能的吗……这个答案大部分有赖于经济学范围之内的事实和推论；给予经济研究以主要的和最大的关心，也就是这一点。”

2

“不能将追求金钱的经济动机全部看成受到利己心所驱使，因为金钱完全可能是用于高尚目的的一种手段。”

3

“正如我不能写出一本关于一只在逆水中每小时移动 3 英里的船，而又写出一本关于一只在静水中每小时移动 5 英里的船一样，我不能写出一本关于我的静态的书，而又写出关于我的动态的书。”

4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较为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使用‘均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这个事实以及本书（指《经济学原理》——引者）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

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但是，事实上本书始终是研究引起运动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5

“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医学上的发明——像古纳或巴士特的发明那样——能增进我们的健康和工作能力，以及像数学上或生物学上的科学的研究工作，即使也许要经过许多代以后才能显出增大物质福利的功效，它们对生产所给予的帮助，虽没有前者那样直接，但重要性是一样的。”

6

“德国经济学家往往注重国家财富中的非物质因素；在关于国家财富的有些问题上这样做是对的，但却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这样做。科学的知识，不管在哪里发现，的确不久就会变成整个文明世界的财产，并且可以被认为是世界的财富，而不光是一国的财富。机械上的发明和其他许多生产方法的改进都是这样……”

7

“优良的教育，即使对于普通工人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它提高他生活的风格；因此，它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即使它被看作是为了本身的目的，它也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组成的任何事情更为低劣。”



学术思想

马歇尔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理论体系以英国古典传统的经济理论为核心，吸收、综合各种资产阶级经济流派的学说并加以整理和精炼，在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独树一帜，对当代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理论部分，主要来源于他的学说。

马歇尔经济学说的理论体系，是以人的心理因素为基础的他的需求理论的出发点是人的欲望。他认为，需求是欲望的满足，而人的欲望是由效用来满足的。因此欲望和效用是相关的名词。他指出，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各种各样的，但每一个别的欲望又是有限度的。因此，当一个人要购买一件物品时，他刚刚被吸引购买的那一部分，可以称为他的边际购买量，他的边际购买量的效用，可称为此物的边际效用。而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都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的。马歇尔用边际需求价格来衡量边际效用。由于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边际需求价格也是递减的。他把个人需求扩大为社会需求，认为个人需求的综合就是社会需求，个人需求价格的综合就形成了社会需求价格。

马歇尔的供给理论就是他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用以满足需求的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中所耗费的代价、生产要素的供给及其变动的规律。他的供给理论是建立在庸俗的生产费用论的基础上的。马歇尔的生产理论包括生产要素和生产成本。关于生产要素，他提出了劳动、土地、资本、组织为生产的四要素。除了土地之外，其他要素都有各自的供给价格，这些供给价格都有各自的变动规律。关于生产成本，马歇尔以生产成本来说明商品供给价格的决定。他把生产成本分为实际生产成本、货币成本和边际成本。他认为生产一种商品，一般需要消耗各种

不同的劳动，并使用各种形态的资本，它们加在一起构成了生产的实际成本。但他认为劳动并不是客观的劳动消耗，而是主观的心理感觉，他把对这些劳动和牺牲所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称为货币的生产成本，货币的生产成本是衡量实际生产成本大小的尺度，是实际生产成本的价格。它直接决定产品的供给价格。

马歇尔经济学说的基础和核心是均衡价格论。其需求理论和供给理论，从均衡价格论的角度看，是为它作理论准备的。马歇尔运用均衡分析和供求分析方法，把需求和供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结合起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在他看来，当供求变动使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在市场上形成均衡时，消费者的需求量和生产者的供给量恰好达到相等，此时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恰好相等时，就会形成均衡价格。

马歇尔把时间因素也引入均衡价格的分析，他把市场价格分为暂时的市价、短期的正常价格和长期的正常价格。并且认为，时间长短不同，对于市场上供求双方的较量趋于均衡的情况也是不同的，它们对均衡价格的作用也就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马歇尔所说的这种均衡和均衡价格是静态的局部均衡。他假定货币购买力不变，把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也排除出去，使商品的价格决定只取决于与它自身直接相关的相反力量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经济因素会自动发生作用，达到均衡状态，这正是马歇尔经济理论的目的所在。

马歇尔的分配理论是他以前所有分配理论的集大成，也为现代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他的均衡价格理论在各生产要素的价值决定问题上的具体应用。他认为分配问题的实质是各种生产要素如何分派它们共同创造的国民收入。其中心思想是要说明分配份额的大小决定于各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马歇尔认为，各生产要素分配份额的大小决定于各要素自身的

价格各生产要素的需求价格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供给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均衡点就是生产要素的正常价格。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着分配额的数量。这样一来，他把均衡价格形成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分配问题，以此来说明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及其水平。

马歇尔是剑桥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他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性与开创性贡献是无可否认的，这似乎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角色。他的经济思想至今仍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他的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选择理论、消费者剩余理论、局部均衡理论、弹性理论，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由于其学说的巨大影响，在他周围聚拢了一批优秀经济学家，如庇古、罗伯逊、20世纪30年代前的凯恩斯等，形成了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剑桥学派，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著作

《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出版于1890年，这本书被认为是一部可以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相提并论的划时代的著作，从而牢固确立了马歇尔作为世界最主要经济学家之一的地位。

《经济学原理》全书分为六篇，每篇又分为若干章，始终是围绕均衡价格理论展开的。马歇尔首先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实质、经济规律做了分析，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财富及人类欲望关系的一门应用科学，认为其目的在于解救贫困和增进福利。然后展开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的阐

述。在他看来，需求与消费的问题在经济研究中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因此提出了“消费者需求的等级”、“欲望的弹性”等许多新的理论主张。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一篇中，马歇尔提出了生产四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论述了报酬递减倾向和报酬递增倾向及其相互关系。第五篇主要论述“需求、供给与价值的一般关系”。在本篇中马歇尔论述他的价值理论——均衡价格论，论述了需求和供给的均衡关系，分析了直接成本和总成本及边际成本的问题。第六篇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马歇尔在这里放弃了李嘉图以三大阶级为轴心的做法，而将四大生产要素当作主体，阐述了他们的价格决定问题，即研究了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的问题。在这六篇当中，第五篇是核心，涉及的领域是全书篇幅最大的。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继约翰·穆勒之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一次新的综合，兼容了各派学说的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重要经济范畴进行了新的探讨，建立了一个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微观经济学确立了基本框架。

(左岫仙)

熊 彼 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年)

卓 而 不 群 的 创 新 者

“现代正统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系统理论分析中，从不试图分析‘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这点可说已成定论。但有一个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在这方面离开传统标准的一个突出代表。”

——保罗·斯威齐

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年) 美籍奥地利人。1901—1906 年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从师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维塞尔和庞巴维克，与米塞斯 (L.Von Mises)、包尔、希尔弗丁同是庞巴维克研讨课中的活跃分子。在此期间，熊彼特受到良好的经济学的熏陶，后取得法学博士学位。1908 年他出版了《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内容》。1909 年任奥地利捷尔诺维茨大学教授。1912 年，他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1914 年，熊彼特又发表了《学说史和方法史的诸阶段》。1913—1914 年，他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从事有关社会阶级的教学，并被授予该校名誉文学科学博士学位。1918 年他出任德国‘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25 年应邀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由于受到国籍歧视，1932 年离德赴美，任教于哈佛大学。1939 年发表《经济周期》和 1942 年发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54 年发表的《经济分析史》堪称西方经济学界巨著。在美期间他担任了“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他是以非美国人的身分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第一位经济学家。1950 年 1 月 8 日去世。



言 论

1

“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革的形式与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而且也从来不可能静止不变。”

2

“尽管企业家自然可能是发明家，就像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职能的性质，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作为企业家的职能而要付诸实现的创新，也根本不一定必然是任何一种的发明。”

3

“资本主义开创了批判性思想的先河。这种思想在摧毁了许多种制度的道德权威后，最终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资产阶级惊奇地发现：理性主义态度并没有只是终止了君主与教皇的政治统治，而是继续反对财产私有制和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系。”

4

“资产阶级社会是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出来的：它的地基、梁和瞭望台完全是用经济学材料做成的。建筑物面向生活中的经济方面，奖励和惩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5

“我们所意指的发展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以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

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我们的发展理论，只不过是对这种现象和伴随它的过程的论述。”

6

“经济发展是从内部产生的这样一种变化，那就是，它这样来代替这种体系的均衡点，从而新的均衡点不能从旧的均衡点以许多无限小的步骤去达到。你不管把多大数量的驿路马车或邮车连续相加，也决不能从而获得一条铁路。”



学术思想

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早期先驱者，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并以此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在西方经济学界轰动一时。创新理论成为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它打破静态均衡，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力量就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的组合。熊彼特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以下五种情况：(1)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 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3)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 精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发明与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企业家活动的动力来源于对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的追逐除利润动机外，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指出，由于企业家实行“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企业的总收入就会超出总支出，这种余额或“剩余”，就是企业家的利润，是创新活动的合理报酬除了个人致富这个目的之外，企业家实行创新还有显示才能和渴求“成功的欲望”。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的这种欲望、“事业心”或“荣誉”是一种“战斗的冲动”，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即“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就是在追求最大利润和精神满足这两个目的的驱使下，不断进行“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熊彼特在导入“创新”机制过程中，深化了竞争的含义。他认为，竞争不再仅仅是传统经济学关注的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而是代表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以及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的新企业与旧企业之间的竞争，它给经济生活带来地震般的冲击，这种冲击摧毁了旧形式的生存基础，形成了经济生活内部质的突破，最终革新了经济结构，实现了发展。能彼特强调，这种“创造性地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熊彼特用他的创新理论分析了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成为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第一次提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长、中、短三种周期性规律性波动。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由于商业存货的变化而造成的。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熊彼特的周期理论，尤其是长波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熊彼特对长波理论的贡献首先表现为他对长波理论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他充分肯定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

波理论。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长、中、短三种周期，从而确立了长波理论在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地位。其次，熊彼特是第一个明确地用技术创新来解释长波起因的经济学家，对长波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西方经济形势恶化和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许多经济学家转而研究长波理论，他们在熊彼特理论的启示下，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强调不同要素的重要性，提出了各种长波理论，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长波学派。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其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首先表现在基本概念的定义上。熊彼特认为，经济增长就是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它主要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没有产生质的飞跃，像在自然数据中的变化一样。他认为，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也就是创新。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主要在于用不同的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去做新的事情，而不问这些资源的增加与否。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方式加以利用。同时，熊彼特强调，经济发展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在此问题上，熊彼特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现象，他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通过破坏储蓄动机，从而摧毁了自己的基础——未来发展所需要的资本。

熊彼特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在进行这项研究的过程中，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探讨了经济发展的模式和周期波动，预测了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提出了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其研究方法、理论和观点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主要著作

《经济发展理论》

本书是熊彼特的代表作之一，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及其动态发展的过程。熊彼特将社会经济活动区分为两种类型：经济循环和经济发展。所谓的经济循环，是指简单再生产模式而言，他把此种模式理解为静态的均衡理论。所谓的经济发展，实际是指现代的经济成长，他把此种模式理解为动态理论。如果说循环理论是其理论分析的起点，那么，可以说发展理论是从此起点推演出来的相对立的内容。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静止的是从一个均衡的力量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力量，它打破静态均衡状态，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力量就是创新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家实行对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新的组合。熊彼特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以下五种情况：(1) 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 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 开辟一个新的市场。(4) 竞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5) 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也是看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其经济周期理论。还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他进行这一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创新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惟一动力。并以此为其逻辑推论的起点，断定资本主义不可能永远延续下去。

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论、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理论》出版后曾被翻译成英、意、法、日和西班牙等多

种文字出版。但由于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一系列缺点，在此理论提出后的半个世纪中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也未被那时的任何重要经济学家所接受。

(刘伟)

庇 古

A · C · Pigouq (1877—1959年)

福 利 经 济 学 之 父

“这个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吻合——他就是庇古。”

——兰塞姆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是英国现代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于190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在其老师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培养下转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并最终成为“福利经济学之父”。1908—1943年，庇古接替马歇尔成为剑桥大学的教授，并担任过英国通货与外汇委员会委员、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委员、通货和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等职。

庇古一生发表的主要经济著作有十多本。1920年正式出版的《福利经济学》标志着福利经济学的正式产生，庇古自称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现代社会中影响经济福利的诸重要因素”，这一著作同《产业经济学》(1926)和《财政经济学》(1928)一起构成了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庇古又发表了《福利经济学的几个方面》和《全民福利国家的几个方面》继续阐述其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他的其他著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如1933年的《失业理论》成为后人研究失业问题的重要参考书。1937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中提出的基本观点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理论的合理性。



言 论

1

“经济学所致力的复杂的分析，并非纯粹的训练，它是改良人类生活的工具，笼罩在我们周围的悲剧与肮脏，富裕家庭的有害的奢侈，以及大多数家庭面临的惶恐不安。无视这些是最严重的中毒，借助于我们的学问所求得的知识，就有可能限制这种毒害。走出黑暗就是光明！求索光明，就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阴暗的科学’向要从事我们学问的训练的人提出的任务 而发现光明则是这种训练的报偿。”

2

“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享受的经济福利，都取决于他所消费的收入，而不是他所得到的收入，一个人的收入愈高，他的消费在他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就愈小，因此，如果他的总收入二十倍于较穷的人，他所消费的收入可能只是五倍于较穷的消费者。”

3

“即使两个集团所掌握的购买力数量不变，也就是对生产资源的支配能力不变，那么也有可能使穷人得到好处和使富人受到损失。这是指：如果穷人的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得到改进，而富人的主要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变坏了，那么就会发生这种情形了。”

4

“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命题，粗浅地说，即第一，对于

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于穷人会使满足增大。”



学术思想

庇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的福利经济学说是对其老师马歇尔经济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庇古以边际效用价值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一整套福利理论和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准则。

庇古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其包括两个原理：一是功利原理或幸福最大化原理。即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社会利益只能以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道德标准和立法依据。增进幸福的行为应该肯定，减少幸福的行为应予以否定。二是自立选择原理。每个人是否幸福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他是自身是否幸福的最好判断者。此外，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倾向，所以政府应该做的就是最低限度地行使权力，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不做任何干涉，经济上应该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

庇古认为，一个人的福利寓于他自己的满足之中，这种满足可以是由于对财物的占有而产生的，也可以是由于心理或意识等原因而产生的；一个人的全部福利则应该包括所有这些满足。与此同时庇古又认为，含义如此广泛的福利是难以研究和计算的，因此他把研究的主题局限于能够计量的那种福利，即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能够直接或间接同货币量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以货币计量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被称为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福利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对于一个人的实际收入的增加，会使满足增大；第二，转移富人的货币收入给穷人会使满足增大。按照这样的逻辑，庇古认为要增加经济福利，改善社会生活状况，最好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行适度的收入均等化；二是通过不断地优

化社会资源配置，发展生产，增加国民收入总量。

在国民收入量的增加方面，庇古认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源的配置，应该通过资源在生产中的配置使国民收入量达到最大限度。庇古认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是促进经济福利的主要因素。

一个社会要增加国民收入量，就必须增加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产品量；而要增加社会产品量，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能够达到最优状态，否则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量。

为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实行适度的收入均等化，庇古认为，应该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收入转移给穷人，并提出由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给穷人。政府向富人征收收入累进税和遗产税，相对减少富人的货币收入，同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设施，使穷人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收入但是庇古的收入均等论并非要消灭贫富差别，他认为，如果这种转移影响到资本家的投资和积累，那就会是有钱人被搞穷，穷人到头来反而吃了亏。可见，从富人手中转移的收入是指资本家用于消费的收入，而用于积累的部分应留在资本家手中。在他看来每个人享受到的经济福利取决于他用于消费的收入，而并非他所有的收入，收入转移应只限于消费的部分，财富的转移不能影响到资本家的投资和积累。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生产资源的自由转移，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是趋于相等的。因而两者是否相等是检验生产资源是否达到最优配置的标准，从而也是衡量国民收入是否最大化、社会福利是否最大化的标准。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相背离，其中，收益变动或成本变动是最主要的。在此，庇古提出了两对概念：“内部经济”和“内部不经济”，“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认为，由于内部和外部经济或内部和外部的不经济的作用，厂商收益会出现递增，不变，递减的情况，如果这些变化传导到消费者，那么，边际私人纯产值和

边际社会纯产值之间就会发生背离。因此，庇古认为单纯地依靠市场是不能克服二者的背离的。为此，就要政府对私人企业加以必要的干预，以改善资源的配置状况，会使社会福利得到有效的增加。

在政府干预问题上，庇古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或称为“税收／津贴”。这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由政府对造成外部不经济或外都损害的生产者征税，限制其生产；二是给产生外部经济的生产者补贴，鼓励其扩大生产这样，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作用下，生产者从各自利益出发，会将其产量调整到价格等于边际社会成本之点。庇古指出，政府实行的这些特殊鼓励和限制，是克服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背离的有效手段。政府干预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尽管如此，庇古仍认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仍然是私人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国家经济干预的措施要局限于征税和补贴，反对国家直接控制企业。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他把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财富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国民福利方面，使增进社会福利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他提出的社会福利的理论后来成为西方福利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的依据。为西方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主要著作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庇古最著名的代表作，初版于 1920 年。该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由于本书对福利经济学的阐述一直被视为“经典性”的，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

《福利经济学》共四篇第一篇标题为“福利与国民收入”；第二篇标题为“国民收入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第三篇标题为“国民收入与劳动”；第四篇标题为“国民收入的分配”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目的，就是研究在现代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中心问题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以及增加经济福利的政策。

《福利经济学》提出了“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并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角度出发，应用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边际社会净产值和边际私人净产值，最终形成了外部性理论。庇古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某厂商给其他厂商或整个社会造成不须付出代价的损失，那就是外部不经济，这时，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这种损害的，即所谓市场失灵，需要引入政府进行适当干预。既然在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相背离的情况下，依靠自由竞争是不可能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于是就应由政府采取适当的经济政策，消除这种背离。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益时，给企业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论失业问题》

《论失业问题》（1914 年出版）提出了“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的就业理论。庇古认为，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庇古所谓的“自愿失业”是指工人不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宁愿不工作；“摩擦性失业”是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

庇古将供给和需求理论用于分析就业状况，他认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要不要劳动，能不能就业，取决于对劳动者的需求方和劳动者的供给方。从劳动者的需求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在生产中能给企业家带来利益或者他带来的利益至少等于他的实际工资时，企业家才雇佣劳动；从劳动者的供给方说，只有当劳动者得到的实际工资能够补偿劳动者劳动的负效应时，他才肯从事劳动。

按照庇古的就业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如果在完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存在失业的话，那么只会存在所谓的“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杨丽）

张 伯 伦

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年)

垄 断 竞 争 的 创 始 人

“令人震惊的主观和客观的创新实例。”

——熊彼特

“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能够深入地影响同行的思想并进而影响整个时代的研究，但是《垄断竞争理论》的作者做到了这一点。”

——1965 年美国经济学会公告

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 (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 1899—1967 年)，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899 年 5 月 15 日生于美国华盛顿的拉康纳，1920 年毕业于美国依阿华大学，而后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任讲师，1922 年获该大学硕士学位，1922—1929 年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并于 1927 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29 年起任哈佛大学副教授，1934 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学教授。自 1937 年起任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并先后获得波士顿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和巴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50—1951 年间曾赴法国巴黎大学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讲学，并受聘为客座教授。从 1958 年起他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季刊》的主编。

张伯伦一生的著述活动基本都是在垄断竞争理论领域内进行的。他的主要论文和著作有：《双头垄断卖方很少时的价值》、《垄断竞争理论》、《垄断竞争与“不完全”竞争的区别》、《产品多样性与公共政策》、《垄断竞争程度的测量》、《垄断竞争的再考察》、《论“寡头垄断”的起源》、《走向更一般的价值理论》、《工会与公共政策》(合著)、《垄断竞争理论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



言 论

1

“一切产品事实上都有差异，至少是有轻微差异，而在经济活动中的广阔范围内，差异是相当重要的。”

2

“竞争者个人在经济本质上与垄断者并无二致。”

3

“该产品有任何程度的差别，即可以说该售卖者对它自己的产品拥有绝对的垄断，但却要或多或少地遭受到不完全代替品的竞争。这样则每个人都是垄断者，而同时是竞争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竞争的垄断者’，而称这种力量为‘垄断竞争’特别相宜。”

4

“一切要素皆不能避免在这种意义下的‘剥削’，雇主如要避免这种‘剥削’的非难，就不可能不走向破产。”

5

“在这方面，广告家的技巧同催眠家很类似。他必须能够掌握购买者的心理，如一旦能够掌握，则增加支出即会增加报酬。”

6

“由于购买者对商标的注意，或者是由于加强了品质或劳

务基础上的竞争（或广告上的竞争，这点留在以后再谈），使价格竞争因而逐渐地减弱了”

7

“ 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相比，其价格必然更高，其生产规模必然更小…… ”



学术思想

在西方经济学中，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被誉为西方经济学说的一场革命。他们发展了马歇尔经济体系中的纯粹竞争假定，使得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厂商理论得以确立；同时，这一理论被认为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在张伯伦提出垄断竞争理论以前，马歇尔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受市场操纵，对市场没有影响，各企业的行为都被假定为是一样的，而企业作为经济单位因此失去了其独立的个性，这样也就没有分析个别企业行为的企业理论。张伯伦否认了传统经济理论中把市场划分为完全竞争或完全垄断的假设，而是依照市场垄断的不同程度或市场竞争的不同程度，将市场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完全竞争市场：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人数很多，每个厂商提供的产品量在该种商品的总供给中只占很小比例，同一市场上所有厂商供应的某种产品都是同质的，一切生产要素在各行业之间都有完全自由的流动性，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具有全面而充足的知识。

完全垄断市场：完全垄断是使商品产销量完全由一个厂商所控制的市场情况，并且这种商品没有一种现成的替代品，所以它能够控制商品销售数量，从而能控制商品的价格，这种控

制从只能运用其对某种产品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得最大利润原则出发，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规律，在低价多销，高价少卖之间进行比较抉择，以确定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产量和价格。

垄断竞争市场：厂商数目较多，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竞争；存在产品差别，新厂商进入该行业比较容易，垄断竞争就是存在竞争和垄断因素相结合特点的市场结构。

寡头竞争市场：一个行业只有少数几个巨大厂商，厂商之间相互勾结，产量、政策后果等具有不确定性，价格比较稳定，不轻易变动。

在进行了这样的划分后，张伯伦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都是少见的，普遍存在的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即垄断竞争这种现象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生产者的产品，因其品质、商标、包装和销售条件（包括商店的位置、经营方式、服务态度）等方面的不同，会产生一定的差别，产品的这种差别使每个生产者对其产品拥有一定的垄断权。但这些有差别的产品又都或多或少地有替代品，会使生产者之间产生竞争。由此每个生产者既是垄断者又是竞争者，整个市场存在垄断竞争现象。

张伯伦界定了“产品差别”的内涵及其对市场竞争的影响。他认为，任何有差别的产品在有很多售卖者的情况下必然要受到它的代替品的不完全竞争对消费者而言，不同的产品差别可能是具体的，也可能是想像的，只有产品的任何品质特征引起购买者的认知差异，使购买者喜好这种产品，而不喜好那种产品，都可能构成产品差别的标准。具体地说，“产品差别”包括三个层次含义：商品的品质、包装等产品本身的差异；产品销售条件、服务态度的不同；消费者“想像”的心理差别，如品牌、广告等。

张伯伦认为企业在决定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时，一方面要考虑增加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即边际收益；另一方面要考虑增加产量所带来的成本，即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时。为了取得最大利润，企业会继续增加产量，一直到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达到均衡状态为止，此时企业会获得最大的超额利润。随着销售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而达到均衡状态。当销售量尚未达到均衡销售量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还有潜在利润未能实现，当销售量超过均衡销售量时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企业不但不会增加利润反而要增加亏损从而减少已经获得的利润因为在均衡状态下企业的总利润最大，所以企业纵有过剩的生产能力也不会加以利用

张伯伦指出，一个产业的兴起、发展和衰退必然面临着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问题。企业进入某一产业的难易程度是决定该企业成本—收益关系的基本因素伴随着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行为，集团企业和非集团企业也可能在某一点上到达均衡。张伯伦认为在一定的时期内让企业能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时，企业之间的竞争就会使各单个企业在短期内所享有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因为只要存在着超额利润，新的企业将会继续进入这一行业，从而减小企业的销售量，使超额利润逐渐消失，阻止新企业参加进来，而达到平衡状态，得出了垄断竞争价值论关于长期分析的结论。

此外，张伯伦还率先实现了经济理论研究从规范研究到实证分析的方法论的转变。他在课堂上曾组织学生进行模拟市场的实验，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给予标有成本的纸牌，一组给予标有价值的纸牌，然后让他们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并记录最后结果。这项实验虽然简单，却深深地影响了另一位经济学家史密斯，后者发展了张伯伦的思想，把实验经济学推进到一个引人瞩目的高度。

◆ 主要著作

《垄断竞争理论》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对西方经济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发展了马歇尔经济体系中的纯粹竞争假定，使得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厂商理论得以确立。同时，这理论也被认为更加接近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张伯伦以“价值理论的重新定位”作为其《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的副标题，充分表明他的理论是对传统的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挑战。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写：他的新理论不只是对已有的厂商理论的再考察或者仅仅是给人们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观念，是一个观察经济体系的全新的方式。这种新理论认为传统的将市场结构简单的划分为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两种形式是不符合现实经济形态的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常处于这两个极端情况中间的垄断竞争状态。所以他着重要分析的是垄断竞争市场经济的运行情况。为此他从对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出发，并以产品差别和厂商策略行为作为基础，构建《垄断竞争理论》理论框架。

(石雨)

凯 恩 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年)

宏 观 经 济 学 的 奠 基 人

“在剑桥乃至整个自由世界，经济学说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高超智慧所支配。”

——乔里·谢波德·特纳

“凯恩斯抛弃了传统的储蓄与投资的利息理论，取而代之的是储蓄与投资的产量理论，或国民收入理论，这样就实现了所谓的‘经济学革命’。”

——劳伦斯·克莱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 年) 是 20 世纪世界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1883 年出生于英国剑桥市一个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庭，1905 年毕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兴趣转向经济学领域。以后在该校任教，并创立政治经济学俱乐部。1908 年任皇家学院研究员。凯恩斯一生角色多姿多彩，除了科研、教学之外，还曾在印度事务部、印度通货与财政皇家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工作。1911 年起他长期担任皇家经济学会的《经济学杂志》主编，以后多次担任政府经济部门官员。1919 年，他又任财政部的巴黎和会代表。二次大战期间，他曾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2 年他被封为勋爵。1944 年他率英国代表团出席在布雷顿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筹划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银行”。凯恩斯不仅积极参与政治方面的活动 也经营私人企业。他是“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和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并从事金融投机事业。此外，他创建了剑桥艺术剧院。凯恩斯的遗产约为 50 万英镑，大致相当于今天的 1000 万美元，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之一。经济学的天才头脑加上勤奋的双手，一生的学术成就硕果累累 其中他的著作《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以及《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并称为凯恩斯经济思想发展的三步曲，由此登上了宏观经济学奠基人的宝座，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被人们盛誉为“经济学领域的哥白尼”



言 论

1

“在长期内 我们终将死去。”

2

“无论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的思想观点正确与否，他们都比我们普通人看问题深刻得多。实际上，世界几乎没什么规则可循。一些有识之士，深信他们自己不受任何空谈家的影响，然而他们却往往成为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忠实追随者。有权势的狂人们，听到一些流言蜚语，于是开始从几年前的学术文人那里汲取狂热的思想。”

3

“要想了解我的思想，你必须知道我相信自己正在写的这本经济学巨著将彻底改变——我想可能在起初不是如此，但是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整个世界考虑经济学问题的方式……我并不期望你或其他人现在就相信。但对我自己而言，我不光是期待它，并且在我的思想中深信不疑。”

4

“如果要断言货币是刺激经济体系活动的酒，就必须记住，在酒杯与嘴唇之间是有几次溢漏的。”

5

“我认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论与分配论，另一部分是货币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两分法

应当是：一面是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

6

“……古典主义理论的假定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情况，它所假定的情况只是所有可能的均衡状态中的有限的一点更有甚者，古典主义理论假设条件的特征正好是我们所居住的现实经济社会所不具备的。结果导致如果我们试图将之运用于实际经验，则它的教义就是误导性和灾难性的”

7

“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 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惟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学术思想

凯恩斯、斯密、马克思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史上的三位泰斗。凯恩斯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对策。比起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较真实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现实。他强调国家干预，建议通过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对缓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战后资本主义的一度繁荣和凯恩斯主义是分不开的，凯恩斯也被称为“战后繁荣之父”。他的学说统治了二战后 40—60 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成为西方各国的官方经济学。

在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时代的前夕，古典经济学派一直在经济学领域中居于领导地位，其基本思想就是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并且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政府在国民经济领域应当不作为，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整个社会经济形态应当是一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形态。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该书中他通过对经济危机、长期萧条和失业等独到的深刻剖析，对古典经济学派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学思想，从理论上进行扬弃的批判，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这就是政府应当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这些理论和思想无疑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的突破和划时代的进步。因此，他的这场经济学领域的重大变革被誉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中供给总能自动创造需求的结论，认为通过三个基本心理规律的共同作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其次，认为工资存在刚性，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描述的那样迅速变动，因此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最后，他认为大萧条的出现是由于市场无法自动调节导致的，所以，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凯恩斯从他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出发，得出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缺点：一是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二是收入分配不均。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它的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与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因此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人们的“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

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造成的。

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行政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加强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主张扩大消费支出。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喜欢挥霍性消费，它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程度定很高为了鼓励人们高消费，凯恩斯抨击了自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经济学所标榜的“节俭的美德”，认为高消费和高投资并存 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影响生产率就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由此，凯恩斯强调扩大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投资的控制。通过提高投资引诱，如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利率，增加就业和工资总额，增大消费的有效需求，基于这种信念，凯恩斯倡议温和的通货膨胀，以期达到通过投资增加进而使消费增加此外，通过政府的财政拨款举办公共工程，使部分失业工人重新就业，工资总额有所提高，并由倍数原理发挥作用，收入累计成倍增加，使消费需求效应成倍增长。凯恩斯指出，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入手。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加。

凯恩斯提出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如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保持贸易顺差的对外经济政策。其政策的着眼点是需求管理。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状态下，供给经常处于过剩状态，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为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以需求管理为主，要以扩大政府开支，扩张政府需求的办法弥补私人有效需求的不足，以便使总需求与总供给能够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他进而提出了一国政府应当实现的充分就业、价格稳定、

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凯恩斯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了归纳和整合，使经济学的发展不再受价格分析的限制，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凯恩斯经济政策的最本质之处是主张要依靠国家来调节经济，积极干预经济生活，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认为惟有这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他说，要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互相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 19 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惟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

毋庸置疑，20 世纪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能超过凯恩斯。凯恩斯学说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其经济理论一度垄断宏观经济学几十年之久，如今在各高校讲授的宏观经济学仍依赖凯恩斯创立的观点与分析方法。他的理论的合理部分，至今仍然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借鉴。凯恩斯创立了一个以决定国民经济的根本因素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并且使人们对于政府作用的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主要著作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通论》是西方经济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通论》中，凯恩斯指出：“本书着重在研究何种决定力量使得总产量与总就业量改变。”“本书分析之最终目的，乃在发现何者决定就业量”。基于这个目的，《通论》全书包括序言及六篇。第一篇为引论，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这一原理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基础。他着重指出：“消费倾向之分析、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定

义，以及利率论，乃是我们现有知识中之三大缺陷，必须弥补。”第二篇凯恩斯对几个重要定义进行了阐述。首先阐述了预期、就业和收入等定义。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储蓄和投资，表述了“储蓄等于投资”的公式。第三篇到第五篇凯恩斯分别研究了消费倾向、投资引诱和货币工资与物价等问题。该书系统分析了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方法，并在西方引发了一次经济思想的革命——“凯恩斯革命”。该书侧重于总量分析，补充了古典学派以及新古典学派的微观分析方法，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总体过程，从而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由于该书的巨大影响，凯恩斯不但被认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且被认为能与亚当·斯密相提并论。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把该书对世界的重要性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同齐观。《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完成了从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向自己创立的新经济理论的过渡，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胡萍)

丁 伯 根
Jan Tinbergen (1903—)
计 量 经 济 学 之 父

“丁伯根建立了一个涉及约 50 个方程的经济计量系统，并且借助统计分析测定反应系数和‘前导及滞后’。他的若干结论引起很大注意，而且仍然是辩论的题目。丁伯根教授在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先驱著作对以后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1969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简·丁伯根 (Jan Tinbergen) 是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1969年) 经济计量学之父。1903年4月12日出生于荷兰海牙 ,1926 年获得荷兰莱顿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 ,1929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29—1945 年 , 就职于荷兰中央统计局 , 负责经济周期研究小组工作 , 后期任荷兰中央统计局局长。 1955 年 回到学校专门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 开始着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 “ 经济计划 ” 问题。其间 先后担任荷兰经济学院发展计划讲座教授、莱顿大学发展计划教授 ,1973 年退休。丁伯根先后但任过阿拉伯、土耳其、委内瑞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顾问 , 以及欧洲经济与发展组织、欧洲煤钢联营、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顾问 ,1966—1974 年担任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主席。他还是 15 个大学 (主要是欧洲大学) 的名誉博士 , 荷兰皇家科学院和一些国外科学院的院士。丁伯根除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外 , 还曾被提名过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丁伯根的著作主要有《经济周期理论的统计检验》、《国际经济一体》、《经济政策 原理和设计》、《美国经济评论》、《计量经济学》、《发展计划》等。



言 论

1

“我们无知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要比知识的增长速度快得多，因为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提出更多的问题。”

2

“建造模型是为了一些不同目的，首先为了说明实际发展的目的，其次，为了找出影响实际发展方向的方式。另一方面说明政策的目标是短期或长期运动。”

3

“回到模型，我看了计划人员的一些最近的工作以后，有时想我应否重复歌德的《魔术学徒》中的名言：‘现在我不能赶走我唤来的鬼。’我们的后继者有时确实把模型建造做得过分了。”

4

“第一，编一个要考虑的变量目录；第二，编一份变量必须服从的方程或关系的清单；第三，检验方程是否成立，如果行的话，估计它们的系数。特别是由于第三的结果，我们可能必须修改第一和第二，使模型体现的理论得到满意的真实程度。然后模型可以用于各种目的，即，解决各种问题。模型的优点是，一方面它们迫使我们提出一个‘完全的’理论，我的意思是，这个理论计算了一切有关现象和关系；另一方面，面对观察也就是真实。”

5

“然而，我们不应忘记，科学知识和洞察力在发展政策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在长时间内都将仅仅是适中的。生活中相关的太多，而变化太大，以至于不可能离开对人类关系很强的直觉感而作出决策。”

6

“创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也就是承认社会有责任保证个人与集体满足和建立某些国际、国内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机会及获得这些机会的手段的分配要比现在更为公平。”



学术思想

丁伯根是使经济学变为定量化的、能用数学表达的一门科学的先驱者。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是创建或参与创建了现代动态经济学、经济计量学、经验宏观经济学、发展计划的理论部分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政策和理论。

丁伯根在 1936 年创建了一个荷兰经济模型，用于预测和规划荷兰的经济发展。之后为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设计了类似的经济周期模型。他创建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是计量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模型由 24 个联立方程式构成，其中的消费是一个可支配收入的函数，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是经济活动总水平的主要因素。丁伯根相信，联立方程是反映大量不同性质的经济活动水平相互依存关系的最好手段。他的模型还包括出口与进口，将货币流量分为价格和数量，并将其计入一些方程式中。此外，模型还显示了工资性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丁伯根在后期研究有关收入—储蓄—需求的宏观数量关系后，指出收入的持续增加对需求的刺激作用远远大于收入

的周期性增加对需求的刺激作用。同时他还分析了生产方面的生产规模、规模效益不变及其数据表现的问题，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丁伯根因创建了反映单个市场周期的“蛛网理论”而受到赞誉。该理论阐述了价格变化的反应有一年的滞后期，而需求的反应则是即时的，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农产品的价格及产量波动方向和通常供求理论所说的方向相反。丁伯根认为，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再生产规模既定而生产规模未完之前，无法中途改变规模以适应需求变化。因此，农产品的现期供给要受长期需求和价格的影响，而现期的需求和价格也只能影响下一期的产量和供给。

丁伯根着重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与发展问题，并在著作中论证了国际经济一体化是自主国家之间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他建议国际合作应该更加计划化，追逐短期利益只会导致严重的政治问题，同时主张减少进口限制、统一间接税、自由兑换货币等会使其他的政策手段更为分散化的措施。他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编制如下三类计划模型：一是以决定投资和储蓄总量的简单宏观模型为基础，通过单个部门模型分析来决定投资在各个部门或地区间的分配，并根据宏观政策来选择具体的投资项目；二是将各种单个模型结合起来，形成联立方程组，并以第一种模型为基础，融入政策和目标的有关内容；三是半投入一产出法，以微观的投资计划项目为基础制定宏观计划。

丁伯根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影子价格的概念。他把某一经济结构中的某种资源在最优决策下的边际价值称为该资源在这个经济结构中的影子价格。影子价格虽然被命名为一种价格，但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它是资源在最优决策下边际价值的反映，没有最优决策，就没有影子价格，所以影子价格也称最优计划价格。影子价格只反映一种资源与总体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反映资源本身的价值。因此，影子价格

不同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商品的市场价格。影子价格是以资源的有限性为起点，以资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为核心，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一种测算价格。影子价格综合了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既反映了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又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是资源有效利用的边界值。因此它在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参数。

为减少西方国家中不平等现象，丁伯根发展了收入分配理论。在供给与需求理论基础之上，他对生产要素的价格方程进行了估计，并对与这些要素价格相应的收入分配进行考察。他以个人效用函数分析劳动力的供给，以生产函数分析劳动力的需求，得出结论，不平等不能靠生产能力分布的不平等为解释，只能用特殊类型生产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来解释。正是过度供给，而不是某种特殊劳动技能的绝对缺乏，导致了低工资收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使教育超过技术的发展以养活生产所需技能的劳动力。他主张，要有意识地造成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给与非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借以减少收入的不平等。丁伯根认为收入形成就是产生收入的过程，并将收入分配中提出的一个简单的收入形成的宏观经济模型修正成一个准动态模型。通过此模型可以得出结论：受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职业情况在收入形成过程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丁伯根对实现收入分配的平等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他提倡大力发展教育并推动有关平等和福利的研究，且增加个人福利仅仅着眼于经济因素是不够的，应该将工人分配到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也就是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

丁伯根在比较经济体制的研究上来定义福利经济学，他试图用数学方程来表达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他认为，所有经济体制都有使正常效用最大化的相同目标，从而提出了决定最优福利体制的方法。他认为福利体制应该考虑到物理或心理特质，包括引导社会福利的有形物质的数据和心理数据。因此，

福利体制的设计应该适应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税收体制的种类、公共部门的分权制度和生产的分配、企业的规模和位置、市场与价格、社会保障体系等多种因素。

丁伯根的理论在获得广泛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众多批评家们的指责，因为在他的模型中忽略了人的行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如此，经过丁伯根的努力，经济过程至少部分可以被加以计算，这些预报使国家和企业在进行决策时轻松了许多。



主要著作

《经济政策 原理和设计》

这本著作是丁伯根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内容主要采用定量分析而不是定性分析。丁伯根在著作中谈到，自己的研究主要得益于他经历中的两个方面，即在中央计划局的工作以及与朋友们对经济政策多方面的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都得到了荷兰工党的认可。他的基本目标是将经常处于肤浅、盲目方式的争论引导到客观、科学的分析中去。

该书运用经济计量模型，以自身实践检验为基础，分析了西方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在前言中强调指出，我“力图把某些现在常常用口号来进行的讨论引入科学讨论的范围”。丁伯根所说的“科学讨化”归纳起来讲，大致上具有以下特点：不仅要对经济政策进行定性分析，而且更应该进行定量分析。不仅要研究经济分析的逻辑，而且应该更为注重研究与经济分析相反方向的经济政策逻辑。不仅要对一些典型部门（如运输、农业等）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具体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经济政策作为一个大体系来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封闭条件下的经济政策制定问题，而且也考察了开放条件下经济政策的制定问题。

不仅论及经济因素（如产品货币、价格、收入等）的影响，而且也非常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如政治、社会、心理、偏好等）的影响。不仅分析了现行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找出了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病因”；还有针对性地探讨了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可供选择的“疗法”。正因为此，简·丁伯根的这部著作被称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开了一条新路”。

（杨娟）

汉森

A l v i n . H . H a n s e n (1 8 8 7 - 1 9 7 5 年)

美 国 的 凯 恩 斯

“汉森不仅是美国的凯恩斯，就其本身而言，他是一个重要的创新者。”

——保罗·萨缪尔森

“它（IS—LM模型）非常令人发生兴趣，的确没有什么作为批评的话可说。”

——凯恩斯

“凯恩斯理论中隐而不喻的长期停滞观念，在汉森教授手中才发扬光大。”

——戴拉德

阿尔文·哈维·汉森（Alvin Harvey Hansen, 1887—1975 年）为著名的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当代经济学家。1887 年生于南达科他州。1910 年 荻扬克顿学院文学学士，1915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硕士，1918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15—1916 年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1916—1919 年任教于布朗大学，1919—1927 年任明尼苏达大学讲师，1937 到 1962 年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培养出萨缪尔森 托宾 欧根等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先后担任过美国国际经济关系政策委员会研究主任（1933—1934 年），美国统计协会副会长（1937 年），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38 年），联邦储备局特别经济顾问（1940—1945 年），社会安全咨询委员会委员（1941—1943 年）。汉森是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 竭力宣扬凯恩斯学说，成为美国凯恩斯学派中的权威人士之一，他的《凯恩斯学说指南》一书成为解释凯恩斯经济观点的权威经典著作。

 言 论

1

“我们可以很稳当地说，为任何一大群有资格的经济学家所长期接受的任何经济学 永远不会全无价值。”

2

“全面的物价稳定包括价格结构内部的各种不同的物价趋势。那些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一般水平的企业当然能够降低价格，而那些生产率的提高低于一般水平的企业则不得不提高价格。”

3

“为了满足有高度文明的福利国家的需要，劳动力应该是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即使在物质产品部门，也越来越需要有训练的技术人员，而一般劳动者则在减少中。”

4

“所有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事实上都是双重经济——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而政府越来越多地提供社会服务。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政府（联邦的，州的和地方的）在社会计划方面起主要作用……各种有利于一个真正文明社会的计划和活动。”



学术思想

汉森是最早站出来解释、传播凯恩斯理论的美国经济学家

之一。当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问世以后，英国的学术界有一大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为《通论》的理论框架辩护、修改和扩展，而这本书对美国的影响却远没有在英国那么迅速。可以说，正是汉森的努力，才推动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广泛学习和研究。因此，汉森被称为美国的凯恩斯，被以后的经济学家看作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同时，汉森在若干理论上与凯恩斯持有异议，他在多个方面修正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汉森和希克斯通过对 IS—LM 模型的阐述，把《通论》中的四个基本概念资本边际效率、灵活偏好、消费函数和货币数量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理论，从而说明利率与收入的相互影响以及使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实现均衡的条件。汉森认为，储蓄水平既与利率相关、也与收入相关，也就是说，公众手中所持货币数量既随着利率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又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改变而改变；而凯恩斯则仅仅考虑到流动偏好陷阱。用 IS—LM 模型对《通论》进行的解释，得到了凯恩斯的明确赞同，凯恩斯曾经赞赏道，它（IS—LM 模型）非常令人发生兴趣，的确没有什么作为批评的话可说。

IS—LM 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在 IS 曲线上有一系列可使产品市场均衡的利率与相应收入的组合，在 LM 曲线上也有一系列可使货币市场均衡的利率与相应的收入组合。只有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交点所对应的收入（ y ）和利率（ i ）可使货币市场与产品市场同时均衡，而这一均衡的利率和收入可以通过解 IS 曲线方程和 LM 曲线方程的联立方程获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政府降低税收，或增加支出，或二者同时进行，IS 曲线会向右移动，导致均衡利率和均衡收入同时增加。当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给，LM 曲线将向右移动导致均衡收入增加，均衡利率下降。这样就可以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来达到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

汉森对乘数和加速数这两个凯恩斯学派的重要概念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乘数显示了总需求的微小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增加投资和政府支出会使收入和就业若干倍地增加。加速数则表示收入或消费增加引起投资增加到什么程度的系数。汉森将民间投资或政府支出创造的国民收入，称为杠杆率或杠杆作用。增加的消费诱发投资进而使所得增加，称为加速杠杆作用，投资经由消费而使国民所得增加，称为乘数杠杆作用。乘数与加速数原理相互作用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汉森运用该模型把乘数和加速数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收入、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乘数与加速数的相互作用可以部分地解释西方经济出现周期波动的原因。为了减少经济的周期波动，以维持经济的长期稳定，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干预的办法是影响私人投资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影响人们的消费在收入增量中的比例，即人们的消费倾向或消费习惯。

汉森在凯恩斯的短期理论上加入了长期观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汉森认为，萧条本身意味着一种趋向于静止状态的趋势，但现实产出水平与潜在产出水平之间存在一个增长缺口。当前产出可能正在增长，但必然有一个趋势使它越来越多地落后于潜在产出水平，大萧条之后的投资前景依然十分严峻，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因素造成的：首先，过去人口扩张是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动力，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动力不再像以往那么明显。其次，汉森对新技术的应用表现得非常悲观，他没有看到由新兴技术带来的新兴行业正在填补必要的投资支出。最后，新地区的开拓和居住而带来的投资机会逐渐消失。总之，汉森认为投资是经济进步的启动力，他曾经用“起动的经济”这句名言，与不进行新投资循环反复的经济相对照，来表达投资的重要性和投资对生产的巨大推动。

汉森提出了“混合经济论”，即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混合体制。在他看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早已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而社会主义那种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强制力使个人自由行动受到限制。而混合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相比，权力有

所分散，自由有所保障；另一方面，混合经济企图改变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集中对自由的压抑，以维护个人自由。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混合经济又有其集中的一面，可以避免因过度自由而导致的浪费和损失。汉森认为，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市场经济才会在高度而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水平上发挥作用。

汉森还提出补偿性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政策在刺激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主张，在萧条时期，政府要扩大预算开支，降低税率，提高社会总需求；在繁荣时期，政府要收缩预算开支，提高税率，缩小社会总需求，这样在整个经济周期内补偿盈亏，又叫做长期预算平衡论。现实生活中，利润率是投资的基本决定因素，但是投资机会的缺乏使得利润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说明了实际收入和可利用资源所能产生的潜在收入之间的差距。汉森强调应该运用补偿财政理论，通过一系列政府支出和政府工程来不断弥补潜在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距离。他认为仅靠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是完全不够的。他沿袭了凯恩斯的理论，主张政府通过增加直接支出，充分利用乘数加速数原理，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汉森的补偿财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均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主要著作

《凯恩斯学说指南》

《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出版。这本书详细讨论了《通论》中每一章提出的问题，以通俗易懂的风格向读者全面介绍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从而显著推动了凯恩斯经济观点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的广为传播，是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基础教学辅导材料，有助于理解和接受凯恩斯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生往往通过这本书来了解《通论》，而不是直接读原著，该

书因此成为学习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权威经典著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问题》

这本书主要对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危机十分严峻的形势下，国内经济中生产过剩、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该书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通货膨胀，阐述其“补偿性财政政策”的理论，建立一种“自动的或半自动的”所得税率调整制度。第二部分论述“双重经济论”，强调要想达到充分就业，一方面应扩大“公共投资”，加强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公债和税收来增加资金。一方面要鼓励私人投资和技术更新为实现预期目的，既不能完全寄托于政府投资，也不能忽视私人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从而达到一种公私合伙的双重经济。其中私人企业生产物质财富，政府广泛地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在著作中，作者以高超的分析才能，敏锐的判断能力，简明扼要的观点阐述了对经济增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周期等方面的意见与看法，对于指导当时美国经济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杨龙）

欧根

Walter Eucken (1891-1950年)

弗莱堡学派的领袖人物

“如果欧根在 1945 年以后提出的建议都得到实现的话，那么现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将是另外一个德国。即使是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瓦尔特·欧根的意见中发展出解决当今严重问题的办法，以一种合理的符合生态学的经济秩序的形式。”

——庇巴·尼古拉斯

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1891—1950年)是弗莱堡学派的领袖人物。他出生于耶拿，父亲是一个哲学家。欧根早年就学于基尔、波恩和耶拿，1913年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一战期间，他应召服役四年，1921年考取大学教师资格，曾任柏林大学讲师，图宾根大学教授。从1927年起，欧根一直担任弗莱堡大学教授。二战后，他曾兼任西德联邦政府经济部咨询委员会委员。1950年3月，欧根在伦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逝世。欧根的主要著作有《经济政策原理》、《德中货币问题的批判研究》、《资本理论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基础》、《经济政策原理》等。其中《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较集中地反映出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与研究方法。



言 论

1

“市场上普遍存在形成垄断的偏好。”

2

“经济秩序表现作为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事实。它是已经实现了的那些形式的总和；在这些形式中，当时的日常经济过程具体地运行着。”

3

“每一个人的每一个经济计划和每个经济活动总是产生于某种‘经济秩序’的范围之内，并且只有在这个当下的秩序的范围内才有意义。经济过程总是并且到处是在历史上既定的经济秩序中运行的。这些历史上既定的、实际的秩序可能是坏的；但是没有秩序，一个经济就根本不能运行。”

4

“只有价格机制才能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国家的权力加强，将会破坏个人自由，无以实现公正；但市场也有自己的弊端，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最终只会出现垄断，同样破坏自由、竞争。”



学术思想

欧根是弗莱堡学派的领袖人物。弗莱堡学派又称之为“奥

尔多学派”或“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因为弗莱堡学派所构筑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奥尔多”这块基石之上的。“奥尔多”是拉丁文“Ordo”的译音，意思为一种有别于现存秩序但又与现存秩序有联系的正确秩序。欧根把“奥尔多”或“经济的秩序”理解为合乎人和事物的本质的秩序。这种经济的秩序是一种赋予新的工业化经济一个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持久的秩序。

弗莱堡学派把经济秩序看成经济活动的一个必要前提，面对杂乱无章的众多的经济秩序形式，欧根使用了“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这一分析经济形式的特殊方法，从经济事实中找出决定性因素并了解其相互联系，去提炼各个经济事实的不同方面，把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经济秩序还原为它们的要素形式，从经济事实的多样性实在中抽象出纯粹形式，即“理想模型”。欧根认为，经济秩序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历史上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是在当时的某种经济秩序之中进行的。欧根把经济秩序理解为对事实的实证主义的客观描述，实际上就是指某种客观存在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内在联系。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因而，历史上的经济秩序，总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

欧根在对历史上不同经济秩序形式进行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奥尔多”，即现代人类社会最为完美的经济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种“第三条道路”的解决办法，表达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主张。

对于自由放任政策，，欧根认，自由放任的结果使垄断组织能够滥用自由权力，阻碍自由竞争和自由的市场价格的实现，导致失业和经济危机发生。同时，市场失调，大量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出现，会引起国家对经济过程越来越多的干预，最终可能导致中央管理经济。另一方面，这种政策忽视了个别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一面。因而，自由放任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一种适当的保证个人自由的经济秩序，而且极易走向自己的反面即

集中领导经济而自生自灭，同时国家也就没有完成法治国家的任务，个人自由不复存在。由此看来，自由放任是一种不稳定的交换经济

对于集中领导经济过程政策，欧根认为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掌握经济控制大权的中央当局根本没有能力使纷繁复杂的无数经济变量相互协调，只能使整个经济在低效率和混乱状态下运行并且浪费资源；第二，由于一个中央计划机构控制了具体的生产、消费经济过程，企业和劳动者都失去了经济的自由决定权与责任心，于是，人民丧失了个性与自由，经济也丧失了动力与活力。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而是无效率的，同时这种经济与政治、思想的民主自由是不相容的。

由于中央管理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都有不可容忍的缺陷，欧根认为，现实的经济秩序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走中间道路，对这两种“理想类型”进行整合，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秩序，即建立“竞争秩序”。对于中间道路的政策，欧根把它们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部分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政策，这种政策主张集中控制煤、铁、电力等基础工业，而让个别经济独立自由地经营机器制造、纺织等加工工业和其他行业。欧根认为这种政策的错误在于忽视了经济过程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认为这种经济将最终导向集中领导经济。第二类是划分等级秩序政策，这种政策主张把每个行业都组织成一个自我管理的团体，形成一种职业等级秩序。欧根认为这种行业团体会把市场封闭起来形成垄断，垄断权力的扩张最终也将导致集中领导经济。第三类是凯恩斯主义的充分就业政策，弗莱堡学派认为，重视充分就业问题是合理的，但充分就业并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应是资源最优配置。弗莱堡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干预原则，本质上是国家应当实行有限的干预，并且这种干预不应当撇开市场。自由竞争不但是国家干预要达到的目的，而且是国家干预发生作用的基础。积极的、有限的、间接的国家干预成为保障自由竞争的根本手段。它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后者

着眼于经济总量关系的控制，因而是一种事后的干预；前者则侧重于事前干预，通过国家干预为各个经济主体营造平等的竞争环境，给市场调节功能的自动实现创造条件。

欧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追求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形式来保证永久的个人自由和资源最优配置的效率，即一种规范的、最为理想的经济秩序“奥尔多”。这种经济秩序的形式就是完全竞争的秩序，这种秩序是由国家的法规、政策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但国家并不干预具体的经济过程，因而又区别于中央管理经济。这种模式就是国家确立并维护完全竞争的经济秩序，市场自由调节经济的具体过程。它把完全竞争、自由主义、最大福利及国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弗莱堡学派追求的理想模式。

二次大战结束后，德国处境异常艰难。战争的破坏、占领国的惩处以及对纳粹战争孽债的偿还，最终让德国人民背上了难以想像的重负，德国经济的重建和发展极为缓慢。欧根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拯救了德国。在战后西德的社会经济发展中，社会市场经济理论重新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值得世人借鉴的经济模式，使得西德经济在战后出现了奇迹般的增长，史称“西德经济奇迹”。



主要著作

《经济政策原理》

1952年，欧根夫人与欧根的学生恩塞尔根据欧根的遗稿编辑出版了《经济政策原理》。这本书系统阐述了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的思想，这是弗莱堡学派的经典之作。欧根主张建立市场经济，同时认为市场也需要许多调节原则，包括：使权力分散而反对垄断；对收入和财产进行再分配；在经济萧条时期

实行最低工资标准；主张个人和社会成本均等化等。对于国家干预，欧根认为应该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国家必须限制利益集团的权力；二是所有的国家干预必须是针对经济秩序的政策，而不能针对经济过程；三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必须是系统的，而不能是特定性的。欧根的这些思想基本上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整体思想基础，他也成为弗莱堡学派的领袖和核心人物，他的思想和理论研究对学派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直接影响着学派发展。

（马洪博）

萨 缪 尔 森

Paul A. Samuelson (1915—)

新 古 典 综 合 体 系 的 创 立 人

“萨缪尔森以科学方法发展了静态和动态经济理论，为提高经济科学的分析水平作出了空前的贡献。他不仅改写了许多经济理论，而且在古典经济理论领域做出了一些突破性的贡献。”

——1970 年瑞士皇家科学院公告

保罗·安·萨缪尔森 (Paul Anthony Samuelson) 1915 年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20 岁时 毕业于芝加哥大学 获文学学士学位 翌年 又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5 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外，萨缪尔森还曾获得多所大学的名誉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经济理论的运营意义》 获哈佛大学威尔斯奖。在 1947 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保罗·道格拉斯以学会会长的身份把美国第一届克拉克奖章授予了当时未满 40 岁的萨缪尔森，并预言萨缪尔森在经济学领域将有无可限量的前途。果然，萨缪尔森不负所望，23 年后便获得了世界经济学的最高奖，诺贝尔经济学奖。从 1940 年起 萨缪尔森还曾担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和终身荣誉会长，以及在一系列政府机构和公司任经济顾问和研究员。萨缪尔森由于发展了静态与动态经济理论并提高了经济科学分析水平而被授予 197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经济学》、《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等。



言 论

1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的研究一文不值——只是为了自身的荣耀。”

2

“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我指的不单是金钱的报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3

“当年《通论》是以意想不到的巨大威力捉住了几乎所有 35 岁以下经济学家，犹如一场瘟疫最先袭击南海岛民中孤立的种族并把它消灭殆尽一样。”

4

“市场经济最终的主宰是消费者和技术。”

5

“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

6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的大萧条年代里，很多人转而信

奉凯恩斯主义。那时极度衰退的反例成为现实情况。1938年，国库券利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即使是货币主义者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感到失望。”

7

“……斯密向个人主义发出两次赞美的欢呼；但对于19世纪前的那种政府干预他只是微表称赞。毫无疑问，斯密是对的那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大部分都有害于繁荣和自由……事实上，今天仍需重申斯密所讲过的话：政府的良好企图是不够的，如果要想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考虑行为所产生的后果。”



学术思想

萨缪尔森是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看似矛盾，其实具有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不但存在“综合”的可能，而且存在“综合”的必要。萨缪尔森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结合在一起，把前者称为微观经济学，把后者称为宏观经济学，形成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

对于“新古典综合”凯恩斯阵营和反对派都存在一些反对意见。萨缪尔森及时认识并接受了这些批评意见，并从各种反对意见中吸收了有益成分。鉴于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流派日益发展，仅仅对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的“综合”难以充分反映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状况，萨缪尔森用“主流经济学”代替了“新古典综合”一词，以广泛吸收能够为己所用的研究成果。这种不断吸收其他学派的批评和观点来充实自己思想的做法也是萨缪尔森得以不断发展自己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萨缪尔森关于消费者选择的研究试图使微观经济学的假设经验化和可验证化。萨缪尔森从需求理论中剥离出心理内省的范畴，去除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这种不可验证的假设。消费者偏好理论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重要基础，但消费者偏好本身却是人们观察不到的。因此，传统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皆因建立在消费者偏好可以直接测量或比较的基础上而受到人们的责难。他还发现关于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是同义反复，消费者的定义是购买自己最想要的商品的人，因此，无论消费者买什么都将使它们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行为可以根据偏好来解释，而偏好反过来只能由消费者行为来定义，结果就陷入了“逻辑”循环。

萨缪尔森指出，观察到的消费者支出可用于解释消费者对从不同商品中获得的效用的偏好。萨缪尔森的显示偏好理论一改由消费者偏好推得消费者行为的传统做法，试图通过观测消费者行为来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并试图以之作为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一。

“显示偏好”指的是消费者在其购买行为中所显示出来的对不同商品组合（消费束）的喜爱顺序（偏好）的比较。显示偏好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消费者行为入手，我们能够得出一些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偏好”是通过对其购买或消费行为的观察和比较而“显示”出来的。萨缪尔森明确提出了显示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并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显示偏好的弱公理认为，如果商品组合一是商品组合二的直接偏好，那么后者就不会是前者的显示偏好；显示偏好的强公理则认为，它不仅对于直接显示偏好成立，对间接显示偏好（多种商品组合之间的传递、而非直接的对比）同样成立。萨缪尔森是显示偏好理论最重要的贡献者。

萨缪尔森通过分析投资乘数和加速数的共同作用，来阐明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理论模型。在此之前，俄国经济学家图干·巴拉诺夫斯基和瑞典经济学家威克赛尔在解释经济周期问

题时曾提出了投资增量与收入增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最早表述了乘数的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在论述公共支出所引起的初始就业与就业总量时首次明确提出了“乘数”的概念；凯恩斯在《通论》中进一步完善了乘数理论，并把乘数边际消费倾向联系起来用于说明总支出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倍数作用，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现代经济研究中的重要分析工具。

萨缪尔森发展了“加速器”的概念，以阐明当经济扩张时，商业决策将变得更加乐观，加速或增加投资支出。萨缪尔森认为，卡恩和凯恩斯的乘数分析只注意到了政府的支出对消费的作用，而忽视了消费支出的增加又反过来带动私人投资，如果考虑后一种作用，那么政府支出的增加就又可能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而非简单的国民收入增加，从而可以为经济周期提供一种解释。通过将加速原理（消费对投资的作用）引入经济分析，不但可以看到政府支出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还可以看到其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有利于更为全面地认识政府支出的作用。这样，从综合乘数原理和加速数原理两个方面，就能够把握住理解经济周期的关键。

萨缪尔森的国际贸易理论检验了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贸易的不同的经济结果。萨缪尔森指出，即使人们很难移民，即使资金很难在世界上寻找最高的回报率，自由贸易都会使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的回报更加平等。要素价格均衡定理对于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萨缪尔森—斯托尔珀定理检验了对某些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的影响。萨缪尔森和斯托尔珀阐述了关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与被课征的外国商品相竞争的本国产业的投入的收益，然而，关税也会减少其他所有人的收益。

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一起发展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是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大贡献。萨缪尔森将菲利普斯曲线看作是鉴别政府政策选择的工具。如果关心失业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会扩张经济，但这将会使经济沿着菲利普

斯曲线移动，最终引起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另一方面，如果政策制定者关心通货膨胀，他们就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必须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制定一个好的政策就意味着在菲利普斯曲线上选择一个最佳位置，或者找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平衡点。

在萨缪尔森的研究中，关于消费者选择、经济增长和资本理论的分析、关于乘数和加速数相互作用、社会福利函数、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学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方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等的论述，都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继承了凯恩斯和汉森的理论，认为现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政府和私人都实行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其中，市场经济为经济主体，通过价格机制调节生产、消费和分配，而政府则根据市场状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节。他继承和创造的许多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进行调节的方法被西方国家政府广泛接受。但是，他的理论和观点也引起许多争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滞胀出现，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理论束手无策，遭到严重的失败。



主要著作

《经济学》

《经济学》是萨缪尔森的代表作，是当代西方国家最流行的教科书，风靡一时，影响很广。萨缪尔森把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庸俗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理论，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当作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理论。他认为这两种理论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代西方国家经济属于“混合经济”，在“混合经济”中，存在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他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之所以有效

率，就是因为市场制度能够调节私营部门按照高效的原则运行，并且公营部门的干预保证了私营部门的高效运行。

在《经济学》中，萨缪尔森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西方经济理论加以综合，形成了一个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以及各种主要经济学说在内的庞大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理论体系。其理论体系最大特点就是折中与综合。该书结构完整，体系庞大，内容丰富，思路新颖。自 1948 年第一版出版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随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不断加以修改和完善，多次重版，至 1998 年已印行至第十六版。目前该书已被译为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阿拉伯文以及其他国家的文字，目前发行量已超过 1000 万册。

《经济分析的基础》

《经济分析的基础》为现代西方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该书以古典数学为工具，对新古典经济学作了总结。它对西方经济学所作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将数学形式主义与新古典理论结合在一起，开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书中萨缪尔森用数学方法系统地概述、分析和总结了西方经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试图从两个最一般的原理，即最大化原理和对应原理实证性地推导出比较均衡论中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用数学方法重新分析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他提出了若干新见解，着重对比较静态学和动态学理论作了补充和发展。其二是在分析总结已有理论的同时，在经济学某些专门领域提出新的理论。他关于最大化原理和对应原理的论述，关于性质、成本和生产函数、消费理论的分析论，显示的偏好理论和动态稳定性理论的分析，对西方经济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贺庆平）

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年)

自由 主义 旗手

“要领悟哈耶克对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众多方面的贡献，要整整经历另外一代人。”

——马克·布劳格

“哈耶克的一生就是这门有关自由的科学发展成长的过程。为了探索自由的真谛，哈耶克从经济学进入心理学，又进入政治哲学，最后探索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如炬的自由之光穿透了专业化的隔膜。”

——阿兰·爱伯斯坦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 年) , 英籍奥地利人 1899 年 5 月 8 日 , 哈耶克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21 年获法学博士之后 , 他开始研究经济学并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们做过助理研究员。1924 年返回维也纳 , 与几个才华出众的年轻经济学家们一起 , 从师路德维克·冯·米塞斯。1923—1924 年 , 他作为研究生在纽约大学学习 , 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27 年出任奥地利经济周期研究所所长 , 1929—1931 年任维也纳大学经济学和统计学讲师 , 1931—1950 年任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 , 并发表其第一部主要著作《价格与生产》。这使他在经济学界初露头角。1930 年 , 哈耶克因不同意凯恩斯货币理论而卷入了与凯恩斯和斯拉法的论战。1950—1962 年 哈耶克任芝加哥大学社会和道德科学教授 , 在那里 , 他写出了《自由宪章》 , 代表着哈耶克对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系统阐述。1974 年 因为他对货币和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 ,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2 年 哈耶克在弗莱堡去世 享年 92 岁。哈耶克的一生 在经济学、政治、法律、哲学和心理学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和影响 , 因此我们很难说他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言 论

1

“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2

“虽然在短期内，我们为多样化和选择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有时可能是很高的，但是在长期内，即使是物质福利的进展，也将有赖于这种多样性。因为我们不能预见从那些可提供商品或劳务的许多形态中，究竟哪一种可能发展出更好的东西来。”

3

“我们不仅正在迅速放弃科布登、布赖特、亚当·斯密和休谟的思想——甚至洛克和弥尔顿的思想——而且还由于西方文明是从基督教、希腊人和罗马人所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甚至放弃了西方文明的一些显著特征。”

4

“凯恩斯主义革命会成为一个小插曲——在这个插曲中，对正确的科学方法的错误理解将会暂时抹杀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我们要付出非常痛苦的代价才能把损失弥补回来。”

5

“我坚信：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

进行和平改革的惟一有效方式。但目前人们显然已渐渐地不再把它看作施政的理想方法，而是不断地滥用该词来代表施政的既定目标——我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如此，我还是越来越相信：政治领袖们将会不顾一切地把我们从所面临的僵局中解救出来。”

6

“经济学的一般性规律只能通过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历史事实之中而得以确立——这正是历史学派的观点的本质。历史事实的本质在于，上述做法注定会退化成为对历史事实的单纯记录和描述。并使人们对一般性规律的存在与否产生彻底的怀疑。”

7

“国家是有意识地组织起来和加以引导的权力的体现，它应该只是社会这一更为复杂的有机体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国家应该只是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在此框架之下达到最大的自由协作（因此，这种自由协作不应该得到‘有意识地引导’）”



学术思想

作为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耶克始终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从经济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心智史学等诸领域对自由主义进行论证。他以经济学为出发点，以哲学认识论为基础逐步进展到对政治理念的阐述。用知识传播的分散性原理来证明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将经济生活中形成的自发自生秩序延伸到社会政治发展中，把普通的经济问题提升到对人类自由的终极关怀。

哈耶克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长达 60 年，虽然在较长时间里是凯恩斯主义占了上风，但哈耶克使人们认识到了他的价值——他的预言往往带有较大的准确性——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导致经济的滞胀。他的这一发现为他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他在那一年和缪尔达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们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也因为他们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刻分析，这便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对他的学术价值的高度肯定。他的名望兴衰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戏剧性的循环，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在长时间处于学术大圈子之外的冷僻角落仍能获得如此的肯定和这样大的声誉。

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继承了北欧学派威克塞尔的中性货币学说和维也纳学派米塞斯的信息周期学说。其中，他的货币理论主要通过私有货币论、中性货币论、中性利率论和强制储蓄四个主要论点说明货币在什么时候对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影响，在什么时候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即保持“中性”或“中立”以及货币保持中性的条件。

哈耶克的早期思想阐述了与凯恩斯主义完全相反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指出，繁荣时期物价上升导致实际工资下降，而实际工资下降又引起以劳动力替代机器并普遍缩短生产期，这会产生利率上升，投资下降，最后导致经济衰退的结果。相反，衰退时期实际工资上升导致投资过热，人工劳动力被机器生产替代，生产期延长。哈耶克还认为，投资随着消费水平超越某个临界点的提高而减少，消费水平低于某个临界点又会使投资增加。这是与凯恩斯经济理论完全相反的论调。

哈耶克对失业成因的分析与凯恩斯的分析有很大不同。他认为并不是因为需求缺乏导致了失业；相反，需求的构成会对失业起重大影响。这种状况只能通过消费品的需求的减少来纠正。哈耶克反对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为解决失业而实施的扩张性政策行为。他反对刺激消费者需求，扩张公共工程项目或扶持价格。他认为凯恩斯的政策会将原来也许轻微的不景气转

化为一场被暂时延缓的大萧条。此外，由于凯恩斯的政策而爆发的通货膨胀最终将损害经济。哈耶克指出，通货膨胀的根源是国家的货币发行垄断，只有通过金融制度的改变，如取消政府垄断发行货币的权力，代之以独立的商业银行发行竞争性货币，并借助金融体制和市场机制制约通货膨胀，才能达到预期目的。

哈耶克是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哈耶克眼中，自由是一种状态，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但它包含着积极的内容。哈耶克从道德方面和功利方面讨论了自由的价值。自由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道德方面，自由首先是一种道德原则，它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它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从功利方面看，自由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人拥有自由，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爱好和其他因素设定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并有针对性地选择具体方式实现这个目标。经过不断地尝试 最终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哈耶克认为通过立法可以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自由。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普通人拥有自由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利。立法这种“人造秩序”并不与“自生自发秩序”产生矛盾。在哈耶克的政治著作中，他曾多次声明自己并非任意鼓吹自由放任，相反他相信自发竞争也需要用一个有效的规则框架来约束，而深思熟虑的立法行为和制度设计是自发力量正常运作的前提条件。应该说，哈耶克关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社会演化的不确定性、理性预期的局限性以及强调传统、经验和不断试错等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既适合传统保守派，又可能被激进无政府主义所利用。广泛被接受的是他的学说的一般含义，而对于具体制度主张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他作为杰出的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伦理学家所留下的丰富和深刻的学术思想，在未来的时间里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吸收和借鉴。

哈耶克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所谓“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或所谓“自发秩序”。哈耶克提出的这一概念，虽然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制度实质，但作为这一概念的基础的哈耶克道德哲学却与古典自由主义从洛克到托克维尔对人类思想史上两个核心概念自由和个人主义的解释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哈耶克“扩展秩序”概念的认识论基础又与从休谟到波普的“演进理性”的知识论密切相关。最后，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其体系构造深受康德哲学思辨传统以及维也纳小组例如马赫的影响，在表述上缺少英美学术传统那种形式逻辑的直截了当性。这三方面的特征使得哈耶克思想长期以来难以被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塑造的大批急功近利的学生和学者掌握。总体而言，这种“自由秩序”就是超个人的秩序，是个人自由、社会稳定与经济繁荣的基础。



主要著作

《通向奴役之路》

《通向奴役之路》是哈耶克各种著作中最为公众熟悉的经典名著。该书表现了哈耶克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极端派对国家干预经济和任何改良主义措施的强烈反对，反映了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极端派政策主张。即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与任何改良主义措施，鼓吹最大限度地运用“法治”代替“人治”，声称“个人自由”高于一切。全书的总结论为：趋向集体主义是通向奴役的道路。由于其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一度被列为“禁书”。

该书的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者认为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第二，该书中涉及到哈耶克抨击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依据，即人的自由权利的损

失。哈耶克深信：“我们选择的自由，就一个竞争社会而言，依赖于这样的事实，若某人拒绝满足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与另一人谈判。但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了我们命脉的权威，我们就只能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因此，在著作中，哈耶克认为当社会的创造力和思想进步的源泉衰竭的时候，无论是完善的计划经济还是以竞争来改善计划的经济，都会由于缺乏创新而变得效率低下。这是哈耶克不相信所谓“中间道路”会有效率的根本之所在。他根本不相信在一个没有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其经济会是有效率的。他认为越是现代化生产，人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要求有个人的创造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越无法实行“舆论一致”和“统一思想”。

（贺庆平）

哈 罗 德

Roy Forbes Harrod (1900-1978年)

当 代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的 先 驱

“哈罗德模型所描绘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世界……也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利益的冲突。”

——罗宾逊夫人

罗·福勃斯·哈罗德 Roy Forbes Harrod,1900–1978 年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的奠基者之一，也是最权威的凯恩斯传记的作者。1900 年出生于英格兰的诺福克，1922 年毕业于牛津大学，所学专业是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讲师，后成为高级学监（学院的实际主持人）和牛津大学理事会的成员。在担任牛津大学职务之前，他曾被派往剑桥大学向凯恩斯进修经济学。此后他一直是凯恩斯的最热心的通信者之一，也是在 1935 年最先看到凯恩斯《通论》手稿的人之一，并为该书最后定稿中出现的唯一一幅示意图出过力。哈罗德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母校牛津大学讲授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罗德在丘吉尔首相私人统计班子 里工作。1945 年继凯恩斯之后，担任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刊物《经济学杂志》的第三任主编 此外 还在战后担任过联合国就业与经济稳定委员会委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等职务。1958 年至 1963 年任保守党首相麦克米伦的顾问，1959 年哈罗德被封为勋爵，1967 年他从教职退休。1978 年 3 月 19 日哈罗德逝世。哈罗德的主要著作有《动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循环》、《动态经济学导论》、《凯恩斯传》、《经济论文集》、《货币论》等。



言 论

1

“经济实际增长率取决于人们的投资率和资本的边际效率。”

2

“一个国家若有产生出比它能够有效地用于净投资的还要多的储蓄的倾向，则它的问题显然没有那个储蓄还不足的国家那么尖锐。”

3

“我总觉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赢利率，对于市场利息率的中等程度的变动以及对于一切短期的变动 总多少有点不大敏感。”

4

“我不准备把凯恩斯的理论——即使是成了被他的批评家们所说的那种干巴巴的样子——看作是站不住脚的东西而予以摒弃。它肯定要比我已谈到过的其他两种可能存在的理论更为现实得多。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凯恩斯硬要我们去设想：市场在盘算着未来价格以及价格的不确定时，就一点儿也不考虑罗伯逊教授的‘生产率和节俭’。”

5

“关于总需求（实际的）的上升和下降的运动，有两种完全独立的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随着环境之不同而在性质上各

异。这就是‘哈罗德二分法’的实质所在。”

6

“无论是改变国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抑或是改变外汇率，将不会通过需求的价格弹性而对粮食进口产生任何影响。前者自然通过收入弹性而产生影响。要使粮食进口有重大变动，主要的工具便是直接调节。”

7

“经济学，无论是理论经济学还是应用经济学，如同那些负责制订政策的人所了解的，自 1945 年以来已有了巨大的进展，并且从那时以来已对人类的福利作出了许多贡献。”



学术思想

哈罗德以创立所谓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闻名于经济学界。他通过把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转换成一种稳态增长的必要条件理论而使之动态化。由于伊夫塞·多马稍后不久也提出了一种类似形式的理论，因此该理论被称作“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均衡稳定发展所需的条件。此外，哈罗德对不完全竞争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及经济周期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涉足经济学之外去考察归纳逻辑的基础，试图解决大卫·休谟的归纳法难题。哈罗德将此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认为比他在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任何成就都要大。

哈罗德对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为基本内容的动态经济学，他提出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中，存在三个动态决定因素：(1) 贮蓄率；(2) 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动；(3) 产出量与所需资本量的比例。并由此提出

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循环的理论，即将“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结合起来，把两者的相互作用作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循环变动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所谓“加速原理”，就是指随着消费品需求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成倍扩大。而“乘数原理”则是指一定量的投资会引起收入和消费的连续增加，最终引起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多倍增加。当经济周期从复苏阶段转入繁荣阶段后，随着投资增加，通过“乘数原理”与“加速数原理”的相互作用，即投资导致收入和用费需求的多倍扩大，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又引起投资支出的多倍增长，这表现为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生产积累性扩张，随生产增长、从而收入增长，储蓄率将提高，储蓄率的提高就意味着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下降，一旦消费的增长率下降，按加速原理，净投资的绝对量将相对减少，社会经济转入积累性收缩阶段。

哈罗德认为凯恩斯的分析仅局限于一种短期的、静态的分析，主张经济分析应该长期化、动态化。他试图建立起一种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为基本内容的动态经济学。哈罗德的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形式是由以下三个变量组成：产量增长率 G 、储蓄率 S 和资本—产出比率 C ，它们组成基本方程式 $G=S/C$ ，其中 C 被定义为同一单位时间内的资本增量除以这个时间内生产出来的货物的增量。他通过这个经济增长模型表述了如下的基本思想：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基本条件，乃是把产量的增长率提高到使它所“引致”的投资恰好能吸收本期的全部储蓄的程度，也就是，凯恩斯的投资等于储蓄的观点。

哈罗德提出，只有储蓄才是经济增长的惟一重要的动态因素。他把储蓄分为两种：实际储蓄和必要储蓄，前者取决于实际收入水平，后者取决于实际收入的增加速度。继而，他又提出了三种增长率的概念：(1) 实际增长率 G_t ，它由实际储蓄率和实际资本—产出率决定；(2) 有保证的增长率 G_w ，它由必要储蓄率和必要资本—产出率决定，即是那种能够使企业家感到满意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增长率；(3) 自然增长率 G_n ，它是在劳动

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所能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他认为，实际增长率是实际进行的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与人们想要进行储蓄和投资活动相适应的增长率，自然增长率是社会最适宜的增长率。哈罗德的经济增长理论就是围绕这三个增长率的关系展开的。当这三种增长率取得一致性时，能够充分发挥生产能力，实现充分就业，并能避免通货膨胀，经济就获得了最佳均衡增长；当这三种增长率发生偏离，会破坏均衡增长条件，造成短期经济波动。然而，从理论分析和从实际经验的结果来看，这三种增长率都表现出一种互相偏离的状态。因此，哈罗德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偏离，并将之称为“不稳定原理”。

哈罗德进一步分析说，当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不一致的时候，将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当实际增长率、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相一致的时候，经济就实现了稳定增长的条件，这种情况被称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但是，由于经济中决定这三者的因素各不相同，没有一种内生力量可以促使它们保持一致。因此，三种增长率一致的情况发生的概率很低，所以经济就是不稳定的，实现“黄金时代”的途径像刀刃一样狭窄。人们将哈罗德提出的长期稳定的增长称作“刃锋式”的经济增长，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增长模型所表明的增长途径非常艰难，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哈罗德模型的重要政策结论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经济长期、有效、稳定的增长。哈罗德赞同凯恩斯国家调节和需求管理的主张，认为应该用膨胀性财政政策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哈罗德的长期动态分析，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充分就业，即加强政府需求管理使经济能按自然增长率进行。这就使得他与凯恩斯一样，主张政府以扩张主义政策来调节经济。哈罗德否认扩张主义政策是引致通货膨胀的原因，认为战后通货膨胀属于成本推进型而不是需求拉动型。因此，医治的办法，就是采取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即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

的进程加以干预。他甚至认为扩张主义政策是克服战后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

◆ 主要著作

《动态经济学》

本书是哈罗德的代表作之一哈罗德著名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就是在《动态经济学》这一著作中提出的。这一理论本来是建立在封闭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必要研究开放经济条件的增长问题。

哈罗德依据自己的增长理论和模型，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做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阐述他认为一切对外经济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政策。为了维持国内经济活动水平和就业水平，应该对进出口贸易实施国家干预，并且通过固定汇率制或非固定汇率制的办法来恢复对外收支平衡。哈罗德赞同凯恩斯以国家调节和实际需求管理的主张，认为应该用膨胀性财政政策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通过政府的干预，实现经济长期有效稳定的增长。这就使得他与凯恩斯一样，主张政府以扩张主义政策来调节经济。

在本书中，哈罗德除了对他过去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进行修订和补充之外，还针对战后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等问题，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修补，特别是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国内经济战略进行辩护。

(沈晓英)

缪 尔 达 尔

Gunnar Myrdal (1889-)

瑞 典 学 派 的 杰 出 代 表

“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中他最早阐述了政治价值判断对经济分析的作用。在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充分肯定的学术巨著《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中，缪尔达尔充分地显示了他把经济分析与广泛的社会学事业结合起来的才能。缪尔达尔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各种问题，这是一种涉及面较广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其中对政治、制度、人口、教育和健康等因素均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1974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冈纳·缪尔达尔 (Gunnar Myrdal) 瑞典学派的杰出代表，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始祖。1889年12月6日出生于瑞典卡尔卡利亚省。长期在政界担任重要职务。1948年，他出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58年缪尔达尔结束他在联合国的任职后，便立即接受二十世纪基金会的资助，对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历经10载的深入调查研究。

在他科学生涯的早期，缪尔达尔就已表现出对各种经济问题的广泛兴趣。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中他最早阐述了政治价值判断对经济分析的作用。在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充分肯定的学术巨著《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1944)中，缪尔达尔充分地显示了他把经济分析与广泛的社会学事业结合起来的才能。1974年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和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精辟分析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探讨落后国家贫穷根源的著作《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着重从社会平等出发探讨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切实的解决途径。这些著作问世以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被有识者誉为“充满智慧的著作”随着时日的推移，最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言 论

1

“歧视繁殖了歧视。”

2

“占人类 20%—30% 的人住在发达国家，但却使用着 80% 或 80% 以上的世界自然资源。这 80% 的世界资源大部分是从不发达国家进口的，而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

3

“事实是，同权力体制的经济理论相反，不受阻碍的国际贸易——以及资本的流通——一般往往会产生不平等，而当十分不平等的现象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时，这种产生不平等的趋势就会进一步强化。我称之为有积累作用的因果循环，只要任凭市场支配力自由发挥作用，一个生产率非常高的国家的生产率往往会变得更高，而生产率水平低的国家则往往继续保持原有的水平，甚至进一步恶化。”

4

“我们已经把南亚国家绝大多数人的低生活标准进行了分类。这些低水平显示了各方面特别的不足：食品的缺乏，住房差，恶劣的公共和个人卫生条件以及医疗护理，职业和专业指导以及总的教育设施的不足。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

5

“例如，如果我们假定一些原因使白人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的上升；黑人生活水平的上升又会减少白人的偏见。白人偏见的减少又进一步使黑人水平上升，通过彼此的相互作用使循环加强”

6

“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是引起自然利率的变动的技术变化，不能把货币利率调整得和它相适应，自然便迫使这一情况成为商业循环”

7

“如果不发达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可悲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妨碍那些国家的学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对不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学术创见更充耳不闻。”

8

“在计算、储蓄和投资等经济数量时，预测的方法和回顾的方法存在着重大差别，在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规定这些数量的方法之间，也必须划分出相应的在理论上的重大区别。”

9

“乐观主义同悲观主义一样，只意味着一种偏见的观点，因此学者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哪怕因此与自己职业内流行的观点相冲突。”

10

“有勇气抛弃那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

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想。”



学术思想

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他早年侧重于对动态宏观经济理论进行研究，但后来研究主题发生了变化，侧重于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进行研究，并且采用了制度分析方法，成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

缪尔达尔早期的经济学说主要反映在他的货币均衡理论方面。他认为，现实的货币均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某一时点上的均衡是暂时的、静态的均衡，而从一个时点到另一个时点的均衡则是动态的、长期的均衡。用大多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采用的静态方法来说明均衡条件的满足是不现实的。要使分析面对现实并具有政策意义，就必须说明从一种情况变化到另一种情况的进程问题，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时点上的不同条件及其满足。这样，缪尔达尔将时点和时期问题引入动态分析之中，并认为积累过程中发生的变量调整需要加入时间因素。

缪尔达尔在分析动态均衡过程时，还提出“事前”和“事后”概念以说明经济均衡条件，说明社会储蓄与投资等式的事前的观察，如何经过供给与需求的调整达到事后的平衡。他指出，就预期、愿望和计划而言，储蓄可以等于投资，但在事后，它们未必完全相等。因为社会的储蓄只能通过实物资产的累积来达到。正是事前预期与事后结果上的差异，揭示了意外收益和损失，也揭示了价格的波动。只有在均衡时，事前储蓄才等于事后投资，因而价格才不会发生变化。这样，缪尔达尔通过把预期引入到经济过程的分析中去，对把经济学从静态的理论中解放出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也铺平了动态分析的道路。

缪尔达尔对经济、社会和制度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集中体现在“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之中，这个原理被认为是缪尔达尔对制度经济学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相互为因果的。最初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动会引起具有强化作用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引申变动，而这一级的变动会使社会经济过程依最初变动方面作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累积因果关系包括三个阶段，即最初的变动、强化的引申变动及向上的累积过程。所以说社会经济诸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均衡或趋于均衡，而是以循环的方式运动，但不是简单的流转，而是具有累积效果的运动，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缪尔达尔将循环累积运动分为上升的和下降的两种，即“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用以说明国际间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扩散效应”指某一地区兴办了若干工业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个经济中心，它的发展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并使其附近地区的消费品生产不断增加。“回波效应”指某一地区经济中心的形成和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引起其他地区经济的衰落。缪尔达尔认为，从国际经济体系来观察，正是因为存在着“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使国际贸易加剧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并且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加大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回波效应”。所以，国际贸易并不是对贸易国双方都有利，只有在双方工业化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才是互利的。

缪尔达尔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产量与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制度、政策等。因此，为求得一个国家的发展，就要顾及影响发展的各种因素，而不能只考虑经济因素。现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在制度和结构的缺陷，经济上和社会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影响了经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缪尔达尔认为应实行平等主义的

社会改革。只有公平分配的平等改革才富有生产性，不平等只阻碍了不发达国家获得更快发展

缪尔达尔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太抽象，其理论前提的假定太脱离实际，所考虑的变量太少，主流经济学使经济学成为只关心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的技术经济学。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因此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同时要研究与此相关的文化、政治等，对社会经济作综合考察。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把社会文化、政治结构等非经济因素全部作为外生变量，研究方式已经趋于抽象化的短期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把所谓动态积累分析完全弃置不顾。缪尔达尔反对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论，主张用他自己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来说明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

缪尔达尔是一位难得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该理论推导出的关于减少贫困与失业的建议，为传统的放任政策“药方”提供了可替代的选择。对于仍旧陷于贫困泥沼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值得思考的。



主要著作

《亚洲的戏剧》

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不朽之作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是由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历经 10 年时间考察完东南亚深陷腐败陷阱的根源之后于 1968 年写成的。本书另辟蹊径，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去发掘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使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复杂性和结构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者在书中指出，东南亚一些国家已经深陷极权统治与政治腐败的陷阱，不研究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而

纯粹探讨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亚洲的戏剧》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性问题：政权的软化与分利集团的存在。其特征是：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对法律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反法制的互利性，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进行利益交换，分利集团寻租又进一步加剧软政权化，进而恶性循环。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缪尔达尔还强调“参与”的意义他对于“民主计划”的概念与实践曾进行过深入探讨。他指出：制定计划和在计划中直辖市的政策不仅应该取得民众的支持，而且在准备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应该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后来人们赋予参与式发展的含义中的“让群众成为受益群体、让群体参与到发展的过程之中去”的内容。正因如此，缪尔达尔被称为“为经济学引回人类关怀”的经济学家。

(刘云喜)

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1898-1984年)

伦敦学派的中坚人物

“这是罗宾斯教授的特点，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继续坚持一贯的思想体系，他的实际结论和他的理论属于同一体系。”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莱昂内尔·罗宾斯 (Lionel Robbins, 1898—1984 年) 生于英国的米德尔塞克斯。1920—1923 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他几乎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其中，1923—1924 年任研究助教，1925—1927 年任讲师，1929—1961 年任经济学教授，1962—1969 年在辞去教授职务后，任兼职教授，1967—1980 年，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在校期间，罗宾斯还长期担任过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的系主任。除此之外，还在牛津大学干过短期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担任过战时内阁办公室部门的负责人，1944 年还与凯恩斯一起，代表英国出席了布雷顿森林城会议。罗宾斯还是一个兴趣广泛、活跃的社会活动家，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艺术方面的兴趣日增，特别爱好油画和歌剧。他曾担任伦敦国家美术馆的理事、皇家歌剧院的负责人，罗宾斯还担任过高等教育委员会的主席和英国著名的报纸《金融时报》的董事长。1959 年 英国授予他终身贵族称号。



言 论

1

“经济科学的研究客体并非某一特定的活动，而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经济稀缺这个‘事实’——个人和社会方面的目标无限，而满足那些目标的资源供应有限。”

2

“经济科学是一门研究目标同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当我们面对各种最终目的而必须进行选择时，它使我们能充分了解我们所作选择的含义。”

3

“经济学家研究如何配置稀缺手段，对不同商品的不同稀缺程度如何使不同商品之间估价比率发生变化感兴趣，对稀缺条件的变化（不论是目的的变化造成的，还是手段的变化造成的，也不论是需求造成的，还是供给造成的）如何影响这种比率感兴趣。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处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4

“我所主张的是，表述方式要更为精确，思考范围不要过于狭窄。”

5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经济学家不应就伦理问题发表自己

的看法，这如同主张植物学不是美学，并不等于说植物学家不应对花园的设计有自己的看法相反，我们企盼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进行长期而广泛的思考，因为只有这样，在需要他们解决问题时，他们才能对各种既定的目的作出评价。”



学术思想

罗宾斯的经济思想集中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等方面。他在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上有突出贡献，而且长期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确立伦敦学派作出过独特的作用。

罗宾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目的和有可替代用途的手段之间关系的科学，而这一命题是从各种先决条件中推演出来的结论。这里最主要的先决条件是以某种方式涉及一些简单的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的全部假设，这些经验事实又与物品的稀缺性借以在现实世界中表现自己的方式有关，物品的稀缺性是我们的科学的主要议题。罗宾斯特别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和选择的重要性，从稀缺这一问题出发，罗宾斯认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客体并非某一特定的活动，而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就是经济稀缺这个事实——个人和社会方面的目标无限，而满足那些目标的资源供应有限。经济科学是一门研究目标同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之间关系的科学。

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罗宾斯坚持抽象的演绎法，反对历史归纳法、心理分析和价值判断。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的命题是从各种先决条件中推演出来的结论，最主要的先决条件是以某种方式涉及一些简单的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的全部假设。除了这一种假设以外，还存在另一种假设，这一类假设只具有更为有限的性质，它们的基础是理论所要解释的一些特殊关系或关系的各种类型的一般特点。罗宾斯认为，在经济学的研究

方法中，包括理论假设、概括、特定命题的广泛推论几个部分。

与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一样，罗宾斯认为，经济研究应超越价值判断，使它成为一门反映客观真理的实证科学。为此，罗宾斯把经济学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研究财富或福利，要对福利作出主观价值判断，超出了经验科学范围，不可能具有客观真理性质；另一类则是研究目的与手段的均衡关系，是研究“是什么”的问题，因而具有客观真理性质。并认为，经济学应该是后者，要和前者分开。他还指出，经济科学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科学（如社会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

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罗宾斯反对马歇尔“代表性企业”的概念。罗宾斯认为，对厂商的均衡和行业的均衡理解中，不必要用“代表性企业”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在一个均衡的、不断变动的环境中，代表性企业难以确定。他这种看法取得了成功，以致一度把这一概念从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删了出去。

在序数效用和基数效用问题的争论中，罗宾斯坚持序数效用论。因为他认为，效用产生于人们的主观评价，不可能依此建立客观的度量和比较标准。据此理由，罗宾斯反对消费者剩余的观点，也反对福利经济学的创立者阿瑟·庇古依据边际效用价值论引申而得到的福利经济学。并认为，庇古把收入均等化看为增大社会福利的途径，也是建立在边际效用的主观评价上的，因而同样不具备客观的性质，由此而得到的种种政策只是伦理的改革。

作为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罗宾斯在宏观经济理论上长期支持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他认为，私有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组织生产和有效使用资源方面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在产品、收入和资本的分配已定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市场机制那样在分配方面具有效率。自由价格正好使市场出清，既不会过剩，也不会短缺。这反映罗宾斯对政府干预的一种基本

看法，即政府干预即使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也只能局限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如果超过了某个限度，不但不会促进，反而还会影响经济增长。

罗宾斯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否定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他所持的公平、效率和分配观是分不开的。或者说，他是用公平和效率作为衡量和认识社会的标准去分析、评价经济自由、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的。他认为，一种主义或思想，它的好坏只能用公平和效率作为标准进行评价。有助于公平实现而不利于效率提高的主义，不能说是一种好的主义只能说既有助于公平实现，同时也有利于效率提高的思想才是好的思想。罗宾斯从公平、效率和分配的角度认识经济自由、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应该说比较好地掌握了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罗宾斯主张的经济政策有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提倡自由竞争的特色，但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为分野的两个时期，罗宾斯的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就构成了罗宾斯经济政策的重要特点。罗宾斯在经济政策的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在其整个生涯中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尽管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早期思想的纯正性有所搅乱。但他的主要政策主张，笼统地说，仍是倡导经济自由主义。罗宾斯倡导经济自由所依据的理由，并非因为市场解决方法比集体主义或干预主义计划拥有一些理论优势或先天优势，而是凭经验认为，自由主义的办法似乎更有利把自由与效率结合起来。



主要著作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本书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领域中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 20

世纪西方经济学有影响的著作之一。罗宾斯对经济学的贡献可分以下四个方面：经济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政策理论以及经济思想史。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第二个领域，即经济学方法论，而本书便是他在此领域的代表作。1932—1960 年间，此著作即使未得到人们最广泛的阅读，也得到了最广泛的引用，它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学家对经济科学性质的看法。作者在本书中力求明确经济科学研究的内容和经济科学法则的性质，并试图说明这些法则作为解释现实的指南和政治实践的基础所具有的局限性和意义。本书分为六章：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二、目的与手段；三、经济“量”的相对性；四、经济法则的性质；五、经济学法则与现实；六、经济科学的意义。第一，作者在本书中直接提出问题，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什么；第二，他认为这些问题与实践有关；第三，他摒弃了历史归纳主义；第四，他认识到经济学中受人控制的试验具有局限性；第五，他认为微观经济学的正确性并不依赖于特别的心理学原理；第六，他指出经济学不依赖于伦理上恰如其分的个人评价；第七，在书中的不同地方，他都强调抽象的作用，这种抽象是由一些特定的假设构成的。因此，一方面可视本书为对纯理论的方法和假设所作的评述，另一方面可视本书为应用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绪论。

（周光辉）

诺 依 曼

John von Neumann (1903-1957年)

博 弈 论 的 奠 基 人

“我有时不禁这样想，像约翰·冯·诺依曼那样聪明的脑子，是不是显示着世界上还有一种比我们人类更超越的种族？”

——汉斯贝德

“诺依曼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

——尤金·威格纳

约翰·冯·诺依曼 (John von Neuman, 1903—1957 年)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 博弈论思想的奠基人。1903 年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父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富有的犹太籍银行家。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读书过目不忘。据说他 6 岁时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一生掌握了七种语言，最擅德语。可在他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以阅读的速度译成英语，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而且若干年之后，仍可如此。诺依曼先在柏林读大学，后来又转入瑞士工学院读书。在那里他得到了他那个时代杰出的数学家的指导。1923 年他获得瑞士工学院化学工程的学位，1926 年获得布达佩斯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26—1930 年 约翰·冯·诺依曼先后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任教，其间发表了有关集合论、代数学和量子物理学方面的文章。1930 年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33 年以后他一直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诺依曼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秘鲁国立自然科学院和意大利国立林且学院等院的院士。1954 年他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1951 年至 1953 年任美国数学会主席。1954 年夏，冯·诺依曼被发现患有癌症，1957 年 2 月 8 日在华盛顿去世，终年 54 岁。



言 论

1

“策略博弈论是用来发展出一套经济行为理论的恰当工具，经济行为的典型问题是与一些适当的策略博弈的数学概念完全相同的。”

2

“为了在经济学领域中得到决定性的成功，需要在数学上有一些新的发现，这些发现将具有可以与微积分相比拟的规模”

3

“在二人零和博弈中，由于两个支付函数的和是零，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来代表两个人的利益，即函数对甲是代表支付，对乙则是代表收益。对甲来说，他采取的策略应保证使他支付越少越好，但由于他不知道乙采取什么策略，于是他采取的一种谨慎的做法就是对自己所有可采取的策略都预作最坏的打算，考虑其每一策略都可能有的最大支付，而在所有这些最大支付中的最小者，由此可得到甲的所谓‘最小最大策略’。同理也可提出对乙的‘最大最小策略’。”

4

“让我们较仔细地看一看‘鲁滨逊’模型所代表的那一类经济，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个人的经济，不然就是一个按照单一的意志组合起来的经济。这个经济面临着一定数量的物品和它们所能满足的一些需要的问题。问题是要取得最大的满足。

这的确是一个普通的大值问题——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前面所作关于效用的数量特性的假定，它的困难显然决定变量的数目和要求使之为最大的那个函数的性质；但是，这主要是实际工作中的困难，而非理论上的困难。”

5

“要想解释——而且是‘系统地’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乃是徒劳的。踏实的做法是：首先在一个有限的领域内取得最大的精确性和熟练，然后再进入另一个范围稍广一些的领域，并这样进行下去。这同时也能去掉那种将一些所谓理论应用于经济或社会改革，而其实是全然无效的不健全的做法。”

6

“一个理论，在没有对它给予证明之前，实际上是并不能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而存在的。在以牛顿的理论对行星的轨道作出计算和解释之前，人们很早就已经知道行星的运行；在不少较小和较不引人注意的例子中，情况也是如此。同样，在经济理论中，某些结果——比方说，双边垄断的不定性——可能已经是人们所知道的。然而，再一次把它们从严密的理论中推导出来，是很有教益的。对于几乎所有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定理，都可以而且应该这样说。”

7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能希望有任何系统或穷尽的方法。因此，合理的办法是：寻找一些包含许多个参加者的特殊博弈类，它们是能够确切地加以处理的。在一些精确的自然科学的许多部分里，一项普遍的经验是，对一些适当的特殊情形（这些情形是在技术上能够解决的，但它们是能体现基本原则的情形）的彻底了解，很可能成为发展系统和穷尽的理论的先导。”



学术思想

约翰·冯·诺依曼是伟大的天才人物，本世纪几乎一切最重要的科学成就都曾受惠于他的思想，如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动力气象学、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等。同时，诺依曼对经济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对经济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并不是像其他人那样用微积分去解释经济关系，而是将博弈论的策略引入了经济学。

博弈论的出现与发展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其最初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从竞赛与游戏中引申出来的严格竞争博弈，即二人零和博弈。这类博弈中不存在合作或联合行为，对弈双方的利益严格对立，一方所得必然意味着存在另一方的等量损失。它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的标志是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在 1944 年所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诺依曼“博弈论”的主要贡献是利用与不动点定理有关的论证，建立了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最小最大定理表明，对于任一实数矩阵 A ，都存在实数 v 及概率向量 x 和 y ，使

$$\max_{x} \min_{y} (x A y) = \min_{y} \max_{x} (x A y) = v$$

这就是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这条定理明确定义了 2 人零和博弈的“解”概念，证明了解的存在性，奠定了零和博弈理论的基础，也为后来“纳什均衡”问题的证明提供了范例。

此外，诺伊曼与摩根斯顿认识到纯粹零和博弈的情形在现实中并非通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非零和博弈这一事实，因而对讨论非零和博弈问题给予很大的关注。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他们用了很大的篇幅详细论述了“非零和博弈”如何转化为“零和博弈”的问题。如果这种转换是合

理的，那么关于“零和博弈”的全部理论也就是“非零和博弈”理论的基础，从而关于“非零和博弈”转换问题的讨论，就成了诺伊曼与摩根斯顿的博弈论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然而，后人发现，诺伊曼与摩根斯顿关于非零和博弈的转换方法存在问题。正因为如此，以后关于博弈论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非零和博弈的“解”的存在性证明和“解”概念的构建研究等领域。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最经典的例子。“囚徒困境”内容如下：有两个囚犯一起做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他们被告知：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后，各判刑五年；如果两个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其中一个人坦白后，另一个抵赖，则坦白者被释放，而抵赖者被判刑十年。该情况可用如下矩阵表示：

		囚徒 B	
		坦白	抵赖
坦白	坦白	-5,-5	0,10
	抵赖	-10,0	-1,-1

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囚徒的理性选择会出现以下两种可能情形。以 A 为例，第一种可能的情形是：B 坦白，这时 A 坦白要判刑 5 年；A 不坦白情况更糟，要判刑 10 年。两相比较，则 A 应采取坦白策略对付 B 的坦白策略。第二种可能的情形是：B 不坦白，A 也不坦白，则 A 判刑一年；若 A 坦白，则可以获自由。两相比较，A 应以坦白策略对付 B 的不坦白策略。因此，无论 B 的策略如何，A 采取坦白策略都是最优的。B 经同样的推理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这样两个囚徒经过精心推理后均采取了坦白的策略，结果两个人都被判刑 5 年，这里显然存在着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因为若两个人都

抵赖，两个人都只判 1 年徒刑，显然比两人都坦白而被判刑 5 年更好，但这种结果是办不到的，原因是它不满足个人理性的要求因此，“囚徒困境”向我们展示了由于双方均选择对自己受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而导致的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之间的明争，麦当劳与肯德基之间的暗斗，柯达与富士的较量。经济学把两个企业联合起来垄断或几乎垄断了某种商品的市场，称为双寡头经济。双寡头经济是经济生活中最典型的博弈现象。显然，二虎争斗的目的当然是增加自己企业的利润。正如坦白的“囚徒”一样，在价格博弈中，只以对方为敌手，不管对方的决策怎样，自己总是采取低价策略才会占便宜，这就是诱发价格战的原因。“囚徒的困境”可以用来研究很多问题，如用来解释“军备竞赛”的现实，假设美国与前苏联不建立武器库的话，他们将无法抵御对手的进攻；它也可以用来解释商品的供给情况，垄断者不是通过竞争降低价格，而愿意通过共谋提高价格；它还被用来解释即使两个国家都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利益，他们也将采用保护性措施的问题。

博弈论的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不总能提供确定性的解决方案。然而，现实社会本身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结果，再者，实际的结果更多的时候依赖于一系列不同的因素，于是博弈论就成为分析这些现实情况，捕捉多变的因素，帮助人们选择特殊情况下最佳策略的很有用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诺依曼对很多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和思路上的转变做出了贡献。在《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博弈论的蓬勃发展使冯·诺依曼的博弈理论中的一些陈述和论证显得陈旧，但是该理论在对人类行为的规范研究并使之纳入严格的科学轨道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它对后人研究“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方面所带来的启迪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主要著作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

1944 年 , 约翰 · 冯 · 诺依曼和经济学家奥斯卡 · 摩根斯坦 (Oskar Morgenstern) 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奠基性著作。该书不仅解释了 2 人零和博弈理论 , 同时也拓展了博弈理论的新内容 ,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作博弈。本书理论的线索是 : 首先 , 建立 2 人零和博弈的完整理论 ; 其次 , 在 2 人零和博弈论的基础上建立 n 人零和博弈的理论 ; 最后 , 证明一个一般的 n 人非零和博弈可以化为一个 $(n+1)$ 人零和博弈。这样 , 就在理论上解决了一切有穷博弈的问题。

该巨著汇集了当时博弈论的研究成果 , 将其框架首次完整而清晰地表述出来 , 使其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该书详尽地讨论了 2 人零和博弈 , 并对合作博弈作了深入探讨 , 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将博弈论加以空前广泛的应用 , 尤其是在经济学上 , 由于博弈论数学上的严密性与经济学应用上的广泛性 , 一些经济学家将该巨著的出版视为数理经济学确立的里程碑。

(哈 娜)

加 尔 布 雷 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

新 制 度 学 派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我可爱的祖国，不能只让加尔布雷斯
这样的雄心勃勃的思想家支配。

——萨缪尔森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 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908 年出生于加拿大的一个农场主家庭 , 早年在加拿大就学 ,1931 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农学院。大学毕业后 , 他到美国伯克莱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 ,1933 年获得硕士学位 , 次年获得博士学位。 1934 年 加尔布雷斯到哈佛大学任讲师 讲授农业经济学 直到 1975 年从哈佛大学退休。 1941—1943 年任美国价格管理局局长帮办 ;1944 年任《幸福》杂志编辑 ;1945—1948 年任美国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 ;1961—1963 年任美国驻印度大使 ;1967—1967 年任美国民主活动会主席 ;1972 年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会长。加尔布雷斯的著作颇丰 , 主要有 1952 年的《美国资本主义 抗衡力量的概念》、 1954 年的《 1929 年的大崩溃》、 1958 年的《丰裕社会》、 1967 年的《新工业国》、 1973 年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等。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 , 提出权力转移论等新理论 , 其目的在于改善资本主义制度 , 维护资产阶级的自身利益。



言 论

1

“经济体系的合理目标是，让社会中每个人，不计性别追求他们的善意的目标。在男女两性之间，不应存在必要的或有条件的屈从关系。”

2

“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新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考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他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我们怀疑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

3

“钱是最奇怪的东西，当它和爱情在一起的时候，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源泉；当它和死亡在一起的时候，是人类焦虑的最重要缘由。”

4

“我同意，联邦政府是一个极不完备的手段。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不时地提醒自己，在它的同盟者中它始终是最好的一个。”

5

“信念的解放是改革任务中最艰难的，也是其他变革所依赖的基础。它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因为，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权

力具有独特的专制性；当权力充分发挥效力时，出于其本性它会排除一切可能削弱其控制的思想。”

6

“很容易就可看出传统智慧为何如此顽固的抵制变化。因为让一个工厂停留在愚昧思想中远远要比让农业经济在思想的海洋上迷航好得多。”

7

“现代经济应被视为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占据私人部门一半之多的极少数的超大企业——少于 2000 家的巨型企业生产将近一半的所有私人产品。另一方面，经济中的另一半是由 1000—1200 家小企业占领，具体数字取决于对企业的定义。”

8

“跨国制度兴起以后，使资本、技术和合格的人力得以处于一个单一组织的权力范围之内。这种权力还扩展到国境以外——这样，跨国制度就突出了现在发达和不发达世界之间的不平衡现象。”

9

“我坚持这样一个普遍观点，如果一家企业陷入资金困难，经过破产程序的最大收益是管理的改变，管理不善所面临的处罚就是通过破产将其抛出去。”

10

“这个……集团非常庞大：从公司最高层的领导者到程度不同的遵守规章条例的白领和蓝领工人。它包括所有为集体决策提供专业知识、潜能和经验的人。这才是企业的领导者——

企业的大脑——而不是狭义的管理者。所有参加这个集体决策的人或他们所组成的机构还没有名称，我建议把这个组织称为专家组合。”



学术思想

加尔布雷斯是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从制度的角度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提出权力转移等新理论。在方法论上强调演进的、整体的研究方法，指出经济理论要有价值判断的标准，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前人未曾注意或者很少提及的“工业化以后社会”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建议，为新制度学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加尔布雷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失业、通货膨胀、贫富不均、经济畸形化、环境污染、道德败坏、生活质量下降等等一系列问题，关键是“公共目标”的被忽视。如果不重视公共目标，任何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措施都无济于事。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家总是信奉促进经济增长就是“善”、妨碍经济增长就是“恶”的信条，只注重经济的量的增加，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公共目标，忽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关心。加尔布雷斯进一步认为，如果以经济增长作为目标必然导致为生产而生产，而不问实际的效用如何。于是，他提出了要尽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的“公共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质的分析”上去，把人们从以往的正统经济学所造成的错误观念中解放出来。

加尔布雷斯提出增长价值怀疑论。他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一切问题和严重危机都是由于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生产的商品越多越好，经济增长也就越来越快。而在加尔布雷斯看来，商品生产并非越多越好，比如，香烟生产得越来越多，但得癌症的人也越来越多。

经济增长使环境不断遭到污染，从而使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加尔布雷斯提倡“信念的解放”要人们从当前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对政策目标的解释和公司高级经理们和政府官员们对经济增长的宣传影响中解放出来，重新树立对人生的看法，选择生活的道路，确定应当值得争取的目标。

加尔布雷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于 100 年前甚至 50 年前的资本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不断进步、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新的大公司不断出现，在大公司存在的同时，还存在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美国的企业结构是这两种企业并存。他认为，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经济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规模庞大、技术复杂、投资巨大的大公司。同时，由于公司权力的转移和公司新目标的形成，又进一步扩大了这些大公司的权力。现在公司的权力从股东手中转移到了新的“技术结构阶层”即“专家组合”的手中。因为伴随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专门知识实际上是掌握在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会计师、律师等手中，因而权力也就掌握在这些“专家组合”的手中。随着公司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公司的股份持有者越来越分散，股权也越来越分散。原来在企业中掌权的资本家，由于他们没有作为企业生产所必须的专门知识，因此尽管公司的章程规定把权力划归于资本所有者，但技术和计划的要求把权力移归于技术结构阶层。技术阶层掌权后，公司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最大利润。因为技术阶层的收入主要是薪水和奖金，而不是股息，如果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其结果是股东们得到最大好处，而“技术结构阶层”却承担很大的风险。

加尔布雷斯在分析了企业的权力结构变化以后，进一步分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两个互相对立又互相联系的经济系统，一个是计划系统，另外一个是市场系统。计划系统是由一千家左右的大公司组成的有

组织的计划经济系统，市场系统是由很多分散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受市场支配的市场经济系统。在此种二元体系结构中，计划体系力量最大，而市场体系的力量最小，前者处于有利地位，后者处于不利地位。计划体系有能力影响和控制政府，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政府在许多方面为大公司效力，资本主义政府只关心大公司的利益，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有利于计划系统，这就给市场系统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加尔布雷斯进一步认为，二元体系的存在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造成了社会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计划体系发展过快，而市场体系发展相对缓慢。二是这两个体系间人们收入不平等，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整个社会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但贫困现象依然存在，其他一系列的弊端也随着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又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必须进行改革，一方面提倡人们信念的解放，使“公共目标”受到政府重视，另一方面使权力和收入分配实现均等化。

以加尔布雷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在二战后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传统经济理论的姿态出现，在分析方法、理论体系上独树一帜，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主要著作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

《经济学和公共目标》是加尔布雷斯的最重要的理论代表作，可以说是他经济思想的集大成该书最集中、最全面地反映了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要点和特征，主要论述了“公共目标”、“两个系统”和“新社会主义”三大主题。该书是以整个经济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所谓“整个经济体系”是指既包括大公司

组织的活动领域，又包括农场主、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的活动领域。它试图把各方面综合起来，勾画出一个全体的轮廓。他认为，西方传统经济学把大公司组织的目标冒充为“公共目标”，似乎“经济增长”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不能动摇的信念。但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诸如贫富不均、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生活质量下降等，都是同忽视“公共目标”相联系的。因此，他特别重视“公共目标”问题，并以《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为本书书名，以突出“公共目标”这一核心思想。《目标》一书的出版，使新制度学派义活跃起来，他们提出了新的改良主义理论，并以此批判西方传统的经济学说和凯恩斯主义，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颇具影响的经济学派。但是，他的学说却经常遭到主流派的反对。

(薛梅)

弗 里 德 曼

Milton Friedman (1912—)

现 代 货 币 主 义 理 论 的 创 始 人

“像弗里德曼这样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
研究方向及实际政策的制定有如此大的影
响的经济学家是很少见的。”

——197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
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
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
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
成的标志。”

——丹尼尔·哈蒙德

弗里德曼于 1912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塞尔区。他的父亲经营绸缎呢绒的批发，他的母亲在纽约一家雇用廉价劳动力的工厂作裁缝，后来经营一家绸缎呢绒零售店。15 岁时父亲去世后，弗里德曼靠部分奖学金进入路特吉斯大学，用兼职的收入补足不够的学费。1932 年毕业的时候，他获得经济学和数学双学位，然后在阿瑟·F·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尊敬的另外一位老师霍默·琼斯 (Homer Jones) 的劝说下到芝加哥大学继续其经济学学业。弗里德曼进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并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罗丝·迪雷克特。1935 年毕业以后 先后在国家资源委员会、国家经济研究局、美国财政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就职，并且从 1977 年开始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胡弗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虽然弗里德曼的理论曾被人们嘲弄，但是经过历史的验证，他的理论终于被人们接受，在 1951 年弗里德曼获得美国经济学联合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67 年担任了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并于 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88 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此外，弗里德曼在 13 年中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访问，对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进行了了解，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言 论

1

“经济学是一门有强烈吸引力的学科。其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基本原理非常简单，任何人都能写在纸上，任何人都能理解，但这样去做的人却寥寥无几。”

2

“人们普遍地相信政治和经济是可以分开的，并且基本上是互不联系的；相信个人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而物质福利是一个经济问题，并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都可以和任何经济安排结合在一起……这些是不正确的观点。”

3

“我所谈的利益不是狭隘的关心自己的利益。相反地，它们包括整个一系列人们认为是宝贵的东西，为此他们愿意耗尽他们的钱财和牺牲他们的生命。”

4

“竞争制度是一架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发生无意识的协调作用。它也是一台传达讯息的机器，把千百万不同的个人的知识和行动汇合在一起。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可以想像到的牵涉到数以千计未知数和关系的最复杂的问题。没有人去设计它，它自然而然地演化出来；像人类的本性一样，它总在变动。但是，它经受了任何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的考验——它可以生存。”

5

“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

6

“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坚持认为货币是至关重要的——即坚持认为，如果忽略了货币方面的变动及其影响，如果不对人们为什么愿意持有存在的名义货币的某一特定数量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将失之偏颇。”



学术思想

作为现代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成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经济方法论上赞同和宣扬实证经济学，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和现代货币数量论，为了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他又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弗里德曼是能与凯恩斯比美的经济学家。

弗里德曼推崇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经济学，他认为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经验分析或者计量分析的重要性。他指出，作为经济学家在客观地研究经济现象本身的内在规律时要超越价值判断，不要把个人的价值观念带进经济学说中，实证经济学就是从规范经济学的不同价值观中解脱出来的，这很重要。

弗里德曼在大量的计量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消费函数理论 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弗里德曼认为 要正确分析、预测人们的消费行为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就必须

严格区分两种收入：另一种是持久性收入，一种是一时性收入。相应地，消费也应该区分为持久性消费和一时性消费。持久性收入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性收入，它实际上是每个家庭或个人长期收入的一个平均值，是消费者使消费行为与之相一致的稳定性收入。一时性收入与之相对，是指瞬间、非连续性的、带有偶然性质的现期收入，如工资、奖金、遗产、馈赠、意外所得等等。弗里德曼认为，一时性消费与一时性收入之间不存在固定的比例关系；但是，持久性消费和持久性收入之间却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货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总财富，总财富实际上是无法衡量的，所以可以用人们的收入来代表。然而，人们的一时收入是非常不稳定的，不能确切地代表财富；但是，持久性收入却是相对稳定的收入流量，用它来代表财富，则基本上可以反映财富的状况。因此，可以说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货币需求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持久性收入变动的支配。

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的根据。他的货币需求理论是深受凯恩斯流动偏好分析方法的影响而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论。他认为货币数量论基本上是有效的，他在接受了旧的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它。弗里德曼对早期货币数量论的现金交易方程和现金余额方程做了对比分析，认为剑桥方程更为可取。因为剑桥方程强调了货币储存购买力的功能和作为资产的功能，是比较符合现实情况的。弗里德曼对凯恩斯关于公众货币需求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推崇，认为凯恩斯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理论分析的意义重大。

弗里德曼提出“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以考察了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货币数量的变化对长期的实际收入变化的作用无足轻重，但是对长期的名义收入变化却有决定性的意义。价格水平取决于经济中的货币因素和实际因素共同的作用，而货币数量是决定名义收入和实际

收入的主要因素。因此货币当局操纵货币供给 短期内就会影响名义收入，并直接引起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为了维持经济稳定只能实行货币增长率保持不变的稳定货币政策，货币当局应该按照平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来规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增长率是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这就是弗里德曼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在不具备采用单一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货币当局应该避免采用货币数量大幅度变动的做法。

弗里德曼强调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功能，认为它是保持财富的一种方式。他认为实际货币的需求基本上是由总财富和各种不同形式财富的报酬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可分为以下三类因素：持久收入（总财富）、各种财富的比例及其报酬率、财富所有者的兴趣和偏好。弗里德曼认为，个人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取决于总财富、非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货币与其他资产的预期名义报酬率，以及其他一些变量。人们是按效用最大化原则将财富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形式之间做出分割的，而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存在递减的边际替代率。一个人持有的货币越多，就越有可能把货币更多地花费在股票和物质资产上，以使各种财富形式的边际效用趋于相等，从而货币供给数量增加后，经过人们在各种财富形式之间的进一步选择，会使人们对证券和物质资产的需求增加。

为了解释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水平共存的“滞胀”问题，弗里德曼提出了“自然失业率”假说。所谓自然失业率是与实际工资率结构相对应的实际因素，如劳动市场的年龄性别结构，竞争，垄断的程度，阻碍或促进人们变换岗位的因素等等相适应的失业率。这个自然失业率是经常变动的，但是它的变动并不取决于价格水平这一类名义因素。所以，从根本上说，通货膨胀既不能提高也不能减少失业。

弗里德曼的名字总是和强调货币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以及重新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1976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评价：对弗里德曼学说的广泛辩论导致了重新评论中

央银行采用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像弗里德曼这样直接或间接地对科学研究方向及实际政策的制定有如此大的影响的经济学家是很少见的。



主要著作

《货币数量论》

弗里德曼在 1956 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论著：《货币数量论——一种重新表述》。这部论著正是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奠基之作。弗里德曼认为，现代货币数量论的中心是“坚持认为货币是至关重要的——即坚持认为，如果忽略了货币方面的变动及其影响，如果不对人们为什么愿意持有存在的名义货币的某一特定数量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经济活动的短期波动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将失之偏颇”。

本部论著集中叙述了货币主义的学说观点。首先，强调了货币对解释经济变量的作用，重整了现代货币数量论，以新的方式论证交换方程，论述了货币数量和价格之间的稳定关系；在著作中，还提出了自然率假说，以适应性预期说明长期的菲力普斯曲线趋于垂直。此外，在需求管理上，反对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规则，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收入不公问题上，主张采取收入政策。最后，在书中反复强调了经济自由，反对政府干预，这也是货币主义学派不变的呼声。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的领袖，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可以说，现代货币数量论是整个弗里德曼理论体系的核心。

(刘荣)

西 蒙

A. Simon (1916-2001年)

现 代 管 理 经 济 学 大 师

“他的研究成果涉及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西蒙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们完全可以以他的思想为框架来对该领域的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但西蒙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因终生从事经济组织的管理行为和决策的研究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1978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赫伯特·西蒙 (Harbert A.Simen 1916—2001 年),西方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都有较深厚的造诣,堪称社会学科的通才。1916 年 赫伯特·西蒙出生于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他早年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于 1943 年获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伯克里大学、伊利诺伊工艺学院。自 1949 年担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与心理学教授,1961—1965 年间任美国科学院研究委员会主席。西蒙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对经营管理科学产生兴趣,其对公司行为理论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又研究大型组织的信息管理问题,为大公司决策人员提供了一套决策的辅助系统。由于“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而获得 197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管理方面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1988 年西蒙从卡内基—梅隆大学退休,2001 年 2 月 9 日逝世。他的主要著作有:《管理行为》、《公共管理》、《人的模型》、《组织》、《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中的决策理论》、《管理决策的新科学》、《自动化的形成》、《人工的科学》、《人们的解决问题》、《发现的模型》、《思维的模型》等。他在《管理行为》、《组织》和《管理决策的新科学》等书中对决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系统的决策过程理论。



言 论

1

“管理就是决策。”

2

“决策的失误 是企业最大的成本。”

3

“不把经济刺激放在重要位置的管理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 是不完全的模式。”

4

“实际行动和客观上是合理的行动不同。实际行动时决策是在受到使人只注意一定方向的刺激之后才开始的，而且对一种刺激的反应，一部分是逻辑性的，大部分是习惯性的。”

5

“凯恩斯先生并不满足于指出传统经济学的缺点，他还拥护一群思想怪异的异教徒们的目标，仅仅是因为他们的体系和理论能顺带地减轻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倾向……试图危害或激怒其对手……他只会成为最恶劣的异教徒和冒充内行者的学术偶像——更不用提他的书成为法西斯运动的经济学圣经的可能性了。”

6

“决策制定过程的第一阶段是，探查环境，寻求要求决策

的条件，我将称之为‘情报活动’（借用军事用语情报）；第二阶段是，创造、制定和分析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我将称之为‘设计活动’；第三阶段是，从可利用的方案中选出一条特别行动方案，我将称之为‘抉择活动’；第四阶段是，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价，我将称之为‘审查活动’。”

7

“传统管理理论中所提倡的管理原则，其意义模糊不清，且只停留在概念描述性，缺乏现实的指导性。而现代管理科学使用决策工具的显著特征是：它必须能实际作出决策或建议决策，将真实世界中现有的经验数据作为它们的输入，设计模型，放弃最优化，在模型能保留较丰富的真实世界的性质的集合通过计算机作出计算获得满意解。”

8

“在我们这样的群居社会，一个生来只具有贪婪基因的人将不可能获得社会以感化和教育形式所给予的一切利益。相比之下，一个生来具有一些驯良基因的人即愿意从所处社会环境接受教导、感化、信息和信仰的人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假如你建立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型，如果缺少驯良机制这类东西，你会发现要想使适应性和利他主义协调起来将十分困难。”

9

“人们接受信息的能力有限，信息不是什么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人们的注意力，这就制约了你引入某个系统的信息量的多少。这也是目前的管理信息系统为什么如此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些系统在设计时甚至没有考虑到人们能接收多少信息或者什么信息是有关的。”

10

“知识的进化是总进化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过，在这种进化过程中，看得出的惟一目标，就是思想的增生，以丰富世界上的现有知识库。我们可以把知识的增多，说成是整个过程的目的，其自身即为目的。”



学术思想

西蒙是西方管理决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管理学、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方面都有较深厚的造诣，堪称社会学科的通才。

西蒙特别强调决策在组织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管理就是决策”是他最具影响力的一句名言。在西蒙看来，决策是管理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于管理过程的始终。无论是计划、组织还是领导、控制，任何一项管理职能的履行和管理工作的展开，都离不开决策。决策是管理工作的基本要素，管理实际上就是由一连串的决策组成的。

西蒙将管理理论分为三类：一是“机械人”模式，它认为组织成员是只能被动接受命令并进行操作的生产工具，如古典管理理论；二是“动机人”模式，它开始强调管理中的人的因素，认为组织成员是为满足个人需要和动机而进行劳动的，如行为科学管理理论；三是“决策人”模式（又称“管理人”模式），它认为组织成员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目的而合理选择决策手段的决策者、整个管理过程就是决策人进行决策的过程，如社会系统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西蒙认为，只有“决策人”模式才是更为现实合理的模式。

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西蒙决策理论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前提。西蒙将人的思考过程看作是一种信息处理过程，他认

为，尽管可以利用程序使计算机也能像人一样思考和创造，但是这并不能取代决策过程。管理人员还必须对可供决策的方案评价以后进行抉择。一旦选定方案，管理人员就要对其承担责任和负担一定的风险。

在决策过程和程序方面，西蒙认为，一个组织的决策根据其活动是否反复出现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程序化决策是结构良好的决策，非程序化决策是结构不良的决策。一些例行的反复出现的决策属于程序化决策；而对不经常出现的、非常规的事情做出的决策一般都是非程序化决策。程序化与非程序化决策并不相互排斥的，而是组成一个从高度程序化决策到高度非程序化决策的混合态。决策一定程度上是程序化的，这样它们就是可重复的和常规的，甚至可用确定的程序来处理它们，因而不必每一次都从头开始。例如那些涉及满足顾客要求，决定员工保险福利或从事日常工作的决策。决策一定程度上又是非程序化的，这样它们是崭新的和非结构化的，甚至没有处理问题的惯常方法可用，这或者因为以前未曾有过，或因为特别难，或特别重要。例如引进新材料，裁员或迁入新区域的决策。所有这些决策是非程序化的（尽管可能有一些程序化的子决策问题），因为组织没有细致的规章来告诉我们对各种情况如何做反应，它将不得不靠我们解决问题的一般能力。事实上，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并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这两者很多情况下都是混合在一起的，一端是高度的程序化决策，另一端是高度的非程序化决策，这中间是逐渐的过渡过程。

“有限理性”原理是西蒙的现代决策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也是对经济学的一项重大贡献。新古典经济理论假定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认为决策者趋向于采取最优策略，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西蒙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认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应该用“管理人”假设代替“理性人”假设。由于掌握的信息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有限性、预测的困难性以及穷尽可行性

的困难性，人不可能做出最优的决策。因此，在西蒙看来，古典决策理论从抽象的“经济人”假设出发而推导出的一套规范性决策理论无法正确解释现实生活中决策者的实际行为，它不符合实际决策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与主客观约束条件，即现实无法满足“经济人”假设的几个基本条件。而这些就是古典管理决策理论的不足，它的缺陷急需新的理论进行修补或替代。

基于人和组织不可能全知全能的这个前提，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管理人”理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人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经常是多元的，不仅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甚至矛盾状态；“管理人”的信息、知识、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能得出满意解。在实际决策中，“有限理性”表现为：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还不具备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西蒙的管理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线，它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极具特色的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找最优的答案而转向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决策都是某种折中，最终的方案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是最好的。

西蒙的决策理论不但适用于企业组织，而且也适用于一切正式组织机构的决策。他对于决策过程的理论研究工作是开创性的。目前这种理论已经渗透到管理学的不同分支，成为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基石之一。虽然说随着现代企业和现代技术的发展，组织的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在最现代的组织中，西蒙的某些理论已经不太适用，但是，西蒙的决策理论仍然是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



主要著作

《管理行为》

《管理行为》是西蒙的重要著作之一。本书讨论的是组织和管理的核心内容——决策制定过程，全书核心假设是决策制定过程，是理解组织现象的关键所在，主要关注组织有效运作的决策制定和人员管理过程，尤其关注组织顺利运行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此本书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来考察组织决策，首先分析人类决策，然后解释组织和人之间的关联，组织对人的影响，最终得以完整考察组织中人所做出的决策。

西蒙在《管理行为》中指出，“这本论著关心的问题是导致行动的选择过程”。又说“重点放在提供敏捷行动的过程和方法上”。因此，西蒙决策理论是基本上属于程序问题，具有普遍意义。西蒙认为“传统管理理论中所提倡的管理原则模糊不清，只停留在概念描述性，缺乏现实的指导性”。基于这种批评的立场，西蒙首先将“决策”作为“管理”的统一概念，进而对管理、组织等范畴作深入系统的分析，此为其方法论上一个最大的特色。

在著作中，作者指出决策是由决策前提引申出来的。现实经济中，由于决策者在认识能力上和时间、经费、信息来源的限制，以及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人们不可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可以说，西蒙的贡献已经成为每一位经济学家知识中的宝贵财富，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西蒙学术思想的价值必将产生更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将越来越清楚地为世界所认识。

（刘云喜）

舒 尔 茨

Theodore William Schultz(1902-1998年)

农 业 经 济 学 与 人 力 资 本 理 论 先 驱

“舒尔茨是第一位系统分析了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和对整个经济中生产率的影响的学者。”

——1979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 (Theodore William Schultz, 1902—1998 年), 1902 年 4 月 30 日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阿灵顿, 1927 年获得南达科他州立学院理学学士, 1928 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理学硕士, 1930 年 获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经先后在依阿华州立学院经济社会学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 从 1949 到 1967 年担任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会成员。并以学者身份先后担任美国农业部、商业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建设开发银行等机构的顾问, 参与经济咨询工作。 1960 年担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1972 年获得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最高荣誉奖章——沃克奖章, 1976 年获得国际农业经济学联合会伦纳德·埃尔姆赫斯特奖。1979 年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研究领域所做出的先驱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 年于美国芝加哥市去世。

舒尔茨著述颇丰, 出版了 21 本专著和 200 多篇论文 其主要著作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的生产和福利》、《农业的经济组织》、《由教育形成的资本》、《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的经济价值》、《改造传统农业》、《世界农业的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和农业》等。



言 论

1

“世界上大多数人尚处在贫困中，所以，懂得穷国经济学就懂得了许多真正有用的经济学；世界上大多数穷国的人靠农业为主，所以，懂得了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了许多穷国经济学。”

2

“我们发明了耕地替代物，这是李嘉图无法预期的；由于收入增加了，父母表现出愿意少生孩子，孩子的质量代替了孩子的数量，这是马尔萨斯无法预见的。……人类的未来没有尽头，人类的未来并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地，而将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

3

“土地本身不是成为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前途和福利。儿童保育、家庭和工作经验，通过上学得到信息和技能，以及主要包括投资于健康和上学的其他方式能改善人口质量。我将说明，低收入各国的这类投资，只要在它们未被政治不稳定破坏的任何地方，对改善经济前途一直是成功的。”

4

“在非洲，无论是生活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边境不毛之地上的人们，还是住在大峡谷那陡峭山坡上稍稍肥沃一些的土地上的人们，或者是生长在尼罗河口及其冲积平原这类大粮仓上

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全很贫穷。……
欧洲的原始土壤之质量大都十分低劣，今天它们却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芬兰的土质原本比其邻近的苏联西部之土地的生产效率要低，然而现在芬兰耕地的质量却大大超过了苏联。日本耕地的生产率最初远远低于北印度的耕地，而目前却大大地高于后者”

5

“教育的目标除了发展文化以外，还可能会提高一个民族的工作能力以及管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人的能力得以提高，义会增加国民收入。因此，教育所能带来的，应当说是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

6

“在一个由于存在市场竞争而不断发生变化的经济体系中，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过教育者更适于严格地对新机会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能够迅速地分辨出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有规律的系统因素与杂乱无章的因素之间的区别，所以受过教育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7

“人们普遍认为，国家贫穷主要是因为它们极端缺乏资本，而且，追加资本正是它们更迅速地取得经济增长的关键。我认为，仍然需要重视资本的特殊类型方能求得这种协调。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新的外国资本通常被用于建筑物、设备，有时也被用来购置存货，而一般不被用来增加人力投资。因此，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保持齐头并进 而变成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

8

“人力资源显然既有量的方面又有质的方面。人口数量、

投身于有用工作的人口比例及实际劳动量，是基本的数量特征。为了使我有可能解决这个任务，我将忽略这些问题而只考虑技术、知识及影响人的生产能力的属性之类的质量成分。由于提高人的这种能力的费用也增加人类活动（劳动）的生产能力的价值，所以，它们将产生一个正数正益率。”

9

“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小小的、个人的和分配的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他们总是能那样敏锐地适应经济形势，使得许多专家都无法了解这些人是多么有效率。尽管由于教育、健康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对新知识的接受、理解和采取适当行动的能力方面尚有差距，但是他们却具有企业家的最本质的素质。”

10

“学校教育，健康，现代化经验，这些是比土地更重要的因素。”靠知识进步 我们确能增加资源。”



学术思想

舒尔茨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由农业经济、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理论三个部分组成的。他最初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被称为农业经济学的先驱者。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农业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他的奋斗，使得农业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原因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缺乏一套有利可图的新技术和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因此，要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施，而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决定性因素。提高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提高，贫穷的关键因素不是土地而是人。舒尔茨极力反对把农民看作保守、落后的人，更不能忽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最重要的是正确引导农民适应经济发展与竞争。他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贫困人对改善经济的向往，并为此进行斗争。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关键是没有机会在经济上施展能力，因此，要使他们能得到激励和与之俱来的机会。他用经验资料证明，传统农业中的农民根据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自觉地对可用资源进行了最优分配，农民的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对于各种经济刺激会及时作出反应。

舒尔茨指出，从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看，农业的增长不是单纯依靠土地面积的扩大，而是主要依靠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质量的提高。也就是说，土地在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土地面积、肥沃程度以及自然气候等等这些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减少，关键是激励农民的生产欲望，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激励农民自己做主去支配和经营，从而给他们更多机会在经济上施展才能。他还指出，农业对国民经济是可以做出突出贡献的，农业的作用不仅仅是通过税收和价格为工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世界上许多国家，如欧洲、日本、墨西哥等等正是通过农业而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那些采取了重工轻农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结果反而不容乐观，不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实现富裕，而且城市人口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舒尔茨对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政策提出批评，指出农产品价格是对农民激励的体现。这种激励明确体现在他们的产品所得到的价格和他们为购买其生产和消费所需的货品和劳务而付出的价格之中。政府实行剪刀差是歧视农业，原因是国内政治通常偏爱城市人口而牺牲农业人口。而人为扭曲农产

品价格，对农产品过低定价完全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只有建立高效率的价格制度，许多投资机会才能在农业中显露出来，而农民也会对此作出反应，指导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为了使再分配公平高效，可以采取对低收入的农民给予直接补贴和救济的方法，这和对贫困市民的援助有相似之处。

舒尔茨还是人力资本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他是西方第一个把研究焦点直接集中在人力资源的现代经济学家，他所倡导的人力资本理论，已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重要新兴学科。按照舒尔茨的解说，所谓“人力资本”是相对于物力资本而存在的一种资本形态，表现为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舒尔茨说：人力资本的显著标志是它属于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类的，因为它表现在人的身上；它又是资本，因为它是未来满足或未来收入的源泉或两者的源泉这一语道出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舒尔茨认为人的质量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人的质量的重要性远远大于自然资源和资本存量的多寡，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大于物力资源。他否定资本只能是有形的、物质的传统观点。提出把教育、培训、健康卫生等方面作为投资来加速经济发展，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舒尔茨甚至估测，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只有 20% 是物质资本投资引起的，80% 主要是教育、科技的作用，即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舒尔茨不仅论述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重要性，而且就投资的具体方面做了阐述，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正规教育投资和在职培训投资，这是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研究的重点问题。他把教育当作一种对人的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成果是一种收益。他多次强调，学校教育、健康、现代化经验，这些是比土地更重要的因素。不论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国家，人力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都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报酬率高出许多。他指出，同样的投资，用在教育上要比用在其他方面可以得到更多的回报。二是医疗卫生健康投资，即为提高人口身体素质所进行的投资，它包括花在医疗保健、母婴健康、营养、

休息等有关身体健康方面的费用支出。健康投资有助于“健康资本存量”的增加。舒尔茨认为，过去二三十年间，由于健康改善，不同年龄的人口的平均寿命提高了 30%。三是迁移投资，指个人和家庭为谋求更好的生活或更大的效益，通过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的投资。四是科研投资，舒尔茨把科研界定为一种需要特殊技能和设施来发现和开发特殊形式的新信息的专门活动，指出科研投资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具有特殊意义。

舒尔茨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能够著称于世，享有极高的学术声望，不只是因为该理论鲜明的观点——充满了对传统理论的大胆质疑，也不只是因为该理论精辟的论证——透射出对生存世界的深刻洞见，同时还因为该理论发人深省——带给世人诸多富有挑战性的启示。



主要著作

《改造传统农业》于 1964 年出版。这本书是舒尔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舒尔茨首先对传统农业的特征进行了说明，他说“不能根据文化特征、制度结构或生产要素的技术特征来严格定义传统农业这一经济概念”，而应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传统农业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原始而又长期稳定、发展长期停滞的农业。在传统农业中，农民对经济刺激的反应是正常的，资源配置是合理的。

舒尔茨认为，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墨西哥、日本、欧洲等国正是通过农业而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他又强调仅使用传统生产要素的农业是无法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要发挥其在经济展中的作用，关键是要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能否改造为现代化农业主要取决于能否

为农民提供一些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基本的收入来源。同时，还要建立一套适于现代农业成长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要纠正轻视农业的思想倾向，采取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给予农业以应有的政策待遇；建立富有效率的价格制度，改变农产品高价和低价政策，按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等。

该书融早期农业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理论于一体，对农业经济、人力资本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再三强调农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指出农民的行为也是合乎经济理性的，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激励和更多的教育，为改造传统农业创造条件。

（杨龙）

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1915-1991年)

黑人发展经济学家

“阿瑟·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领导者和先驱。刘易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并引起了广泛的科学辩论，由此形成了对刘易斯原来的前提的一系列发展和补充，该模型亦被运用于实际以验证其应用性。有趣的是刘易斯的简单模型分析不只表明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也有助于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统计发展模式做多方面的透视。”

——197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刘易斯 1915 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圣·卢西亚岛 ,1937 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1940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 留校任教直至 1948 年 , 这期间曾任职于英国政府的商务部和殖民部。 1948 年 , 任曼彻斯特大学斯坦利 ·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 在这期间 , 曾担任联合国欠发达国家专家小组的成员、黄金海岸政府的顾问和尼日利亚政府的顾问。 1957 年任加纳共和国总理经济顾问 ,1959 年任西印度大学第一副校长 ,1963 年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1969 年任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研究员。接着他帮助创建并于 1970—1974 年担任加勒比开发银行的第一总裁 , 但在 1974 年又回到普林斯顿 , 并在那里一直担任经济学教授直至 1986 年退休 之后一直住在巴巴多斯岛上 继续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并为各国提供发展指导。 1991 年去世。在刘易斯的一生中 , 获得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等 20 多所大学的名誉学位。



言论

1

“倘若农民把节省下来的钱去买金子和珠宝，那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同样，如果他们用这些钱去买更多的土地，它的影响不是提高家业产量，而是改变土地的价格和所有权。对增长来说，起作用的是生产资本的形成，这类资本不一定与工作愿望和节约愿望有关。”

2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产那样可以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变得迅速扩大的。”

3

“实际上很清楚，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现在是、而且也应当是比过去大得多，这是因为现在已可以一般地预计到增长的速度更快。不少已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前头的国家，是通过独特的努力，经历几个世纪才慢慢发展起来的。现在可以预期，那些刚刚走上同样道路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府主持下至多用几十年就可做到。政府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日益增长，而且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增长。”

4

“所有手工业生产，同工厂生产相比，都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节省了两个难得的因素，一是资本，一是管理技能。在不发达国家里，资本是十分缺乏的，所以那些与土地和其他资源相比，劳力资源充足的国家，发展一种使用劳动力而不是资本的生产方法是明智的。”

5

“如在手工艺人和最终消费者之间有一个中间人，这样组织生产最经济。中间人可以储存货物；在商店里安排大型的展览以扩大市场；如果市场需要标准化的产品，可以安排几个手艺人生产相同的物品；如果这种物品本身适合专业分工和集中装配，他可以安排不同的手工艺人生产各种部件然后进行组装。”

6

“因为最先进的工业国现在对所有其他国家的技术优势比在它们开始自己的工业历程的时候更大。如果欠发达国家不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那么仅仅因为专业化的势头，它们和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就将继续扩大。为经典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主张对工业进行暂时的保护的理由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足。”



学术思想

刘易斯在发展问题研究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最早构造出两个用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模式，即封闭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和开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这两个模式不仅奠定了刘易斯整个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基础，而且在发展经济学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部门或现代部门，该部门以工业生产为主要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另一种称为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该部门主要以自给经济为基础，并且包括了大多数的人口。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这就是典型的封闭性二元经济结构。

封闭性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与工人高工资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状况导致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再加上农业中“隐蔽性失业”的存在，有无限的劳动供给可用于工业化，因而劳动力丰富、资本稀缺。在这种条件下，较小的工业资本只能吸收一定量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在现行的一个固定工资水平上工业资本家可以不停地赚取高额利润，然后把利润转化为资本，这时会出现一个利润急剧增长、资本加速积累、剩余劳动迅速被吸收的时期。这时，在二元经济的历史中会出现某个点，即当资本增长赶上劳动力供给时，剩余劳动的供给会枯竭，只有工资率上升才能将更多的劳动从农业中抽出来。在随后的阶段里，资本与劳动力等所有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工资是可变的，技术进步的利益不全归于利润，工农业部门的收入随劳动边际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工农业将得到协调均衡的发展，国民经济结构逐渐转变，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同质经济。刘易斯指出，开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模式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一旦赶上了劳动资源的供给，该国的剩余劳动就趋于枯竭，该国的封闭经济发展过程就趋于完结。但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其他国家仍有可能存在着富余劳动力，通过移民、资本输出或国际贸易等形式，继续谋求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愿望和努力。这种努力既可以通过降低某一产出水平的成本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投入所带来的产出来表示。如果人们在某一制度环境中没有改变自身的经济意

愿，或者由于制度构成中非正式约束即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限制了这种意愿，人们没有作出这种努力，因而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二是知识的增长。从各国的经济发展来看，一国产出增长显然与知识传播和运用有着必然联系。而知识的传播又得益于知识产权制度，它提供了一系列规则界定了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保护了产权，推动经济增长的实现。三是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国要由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进入“起飞”阶段，一定的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刘易斯强调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储蓄（包括自愿的储蓄和强制性储蓄），还应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其具体措施包括：保证投资盈利，增税，实行通货膨胀，引进外资，建立相应的金融机构，以及建立能动员大众参与公司冒险而又不必承担全部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等。

刘易斯系统分析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的决定因素。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和热带产品，工业化国家主要出口工业产品。两组国家分别是南部国家和北部国家、富裕国和贫穷国，分别生产出两种产品：一种是两者共同的食品，另一种是相互交换的“咖啡”和“钢铁”。贸易条件决定理论中的重点是资本流动问题。输入资本能减少国内固定资本的创造，并因此减少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这样，本国的剩余劳动力继续存在，有助于工资不变，利润与资本形成条件不变或缓变，从而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资本输出对输出国和输入国而言所产生的影响很复杂。资本输出既可以提高也可以降低资本输出国的生活标准，其结果如何取决于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存在的竞争类型。而资本输出倾向于降低资本输出国国内工人的工资。如果资本的应用是为了使工人需要的进口物品便宜，或者为了提高在第三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国家

的工资成本，那么，这种倾向会全部或部分地被抵消。但是，如果资本的应用是为了提高进口物品的生产率，那么，剩余劳动力输出国的工人工资的下降就会扩大，他们不会从资本输出国的投资得到实际工资的好处，除非这些投资的结果是促使它们国内消费商品的生产率有所提高。

刘易斯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过程中还得出这样两点重要结论：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用于提高这些国家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时，这种资本输出会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运用比较成本规律就会支持保护贸易。比较成本规律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和对于其他国家是一样正确的。该结论成为他分析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同时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主张在资本来源上以国内储蓄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二是强调封闭经济中工农业部门的平衡增长；开放经济中工农业与外贸之间的平衡增长。三是肯定政府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进行经济计划则是政府指导经济发展的最好方法。四是在制度改革中要注意保证人们的物质利益、经济自由及贸易与专业化的发展。

刘易斯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位重要人物和先驱者。他深切关心世界的贫穷和需要，致力于寻求摆脱不发达状态的道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贫困及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内在原因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并引起广泛的科学辩论，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选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主要著作

《发展计划》

《发展计划》一书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部影响范围非常广泛

的重要著作。本书的特色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实践的应用。刘易斯说，《经济增长理论》是一本纯理论的书，而《发展计划》则强调实际运用。

在这本书中，作者阐述了一些对经济发展有指导性或借鉴意义的新思路。该书除前言外，包含四章基本理论和实践。第一章介绍计划的模式，区分了“统制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强调指导性计划更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并易于得到投资者的信赖。第二章介绍计划的战略，区分了“高资本密集技术”和“低资本密集技术”，强调了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均衡问题。第三章介绍计划的计算，分析了计划期内的一些基本问题。第四章介绍计划的过程，强调计划机构的组织协调问题。

本书的结构大体上是按制订计划过程来安排的，把制订经济发展计划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强调经济发展理论的应用。当然，宏观的发展计划是由政府来制订的，而政府制订计划又离不开经济政策的引导。本书反对古典学派的“看不见的手”的传统观念，强调“一系列政策是私人部门计划的核心”。本书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杨娴）

托宾

J ames Tobin (1918-2002年)

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大师

托宾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以一种理论为基础，这种理论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资产的构成。这种理论称为证券箱选择理论，他是其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全部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研究把金融市场上的变化传送到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的传送机制。这个经济研究的古典问题以前并未被满意地和结论性地研究过。托宾的研究成为中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 年)出生于伊利诺斯州小城香槟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5 年夏天 , 托宾获得了哈佛大学提供的柯南特奖学金 (Conant Prize Fellowship) 。当时 哈佛已经是北美首屈一指的经济学研究中心 , 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包括资深教授熊彼特、开始执教的里昂惕夫和担任初级研究员的研究生萨缪尔森。能够与之匹敌的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及芝加哥大学。托宾选择了哈佛大学作为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从 1939 年到 1941 年 , 托宾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 并完成了全部博士课程的学习。从 1950 年开始 , 托宾到耶鲁大学执教 ,1957 年晋升为耶鲁大学斯特林教授。在 1961 年 1 月至 1962 年 7 月期间 , 托宾中断教职 , 担任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托宾参与制定了 1962 年的总统经济报告。托宾把该报告看作 “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应用于美国和当今世界经济条件的宣言 ” 。托宾获得了 1955 年美国经济协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58 年任经济计量学会的会长 , 1971 年任美国经济协会的会长 , 他还从五所美国的和欧洲的大学获得荣誉学位。托宾被授予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的主要著作有《货币、信贷与资本》、《国民经济政策》、《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经济学论文选 宏观经济学》、《十年来的新经济学》、《经济学论文选 消费与经济计量学》、《经济学论文选 理论与政策》等。



言 论

1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2

“每增加一份风险资产，边际收益就减少一点，风险则增加一点在风险资产与无风险资产之间有一个最优组合，即预期的资本价值损益总是等于零”

3

“我赞赏凯恩斯与正统的经典经济学家在理论领域中展开的决斗凯恩斯挺身而出，起来反对传统的谬误。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经济学革新运动，真理将使我们自由，也会被我们充分享用。我已成为一名狂热的‘新政拥护者’，密切关注萧条、失业和贫困等问题。根据凯恩斯理论来衡量，罗斯福总统搞美元贬值和赤字预算，都是健全的经济政策。”

4

“金融体系是一个由互相关联的资产债务市场组成的复合体。由这些市场所决定的资产的价格、利率，以及资产的数量，既会影响真实经济，又会受到真实经济的影响。所谓真实经济，就是现实生产中的商品、劳务市场的复合体。”

5

“新古典派的企业投资理论是建立在假定企业经营者目标是使企业的价值，或者说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基础之

上的。投资项目只在能使已发行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变高的时候，也仅在此时才会被采用。资产市场会对投资计划将能够期待着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收益及风险作出评价。如果投资家们对投资项目的评价高于投资项目的成本，则企业的股价将会由于举办投资项目而上升 股东就可以获得收益……因而 投资家们所期望的资本增加速度（即投资），不论怎么说，是同资本的价值与再生产其的成本的比（ q ）相关连的。”

6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 可能再生产的资产 并且实际上被再生产的资产相对应的一般均衡时的 q 为 1，此外的资产相对应的 q 应小于 1。 q 大于 1（且越大的话）投资将越过正常资本损耗及一般正常增长所需而进行。 q 小于 1（且越小的话）投资将减退”

7

“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separation theory），正是林特纳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订价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beta）。”

8

“对公司企业而言，公司的市价是由证券市场来决定的。当 q 值大于 1 时，公司的股票因为未来的盈余良好，而可以用比投资成本更高的价值出售，按照一般常识，这时会有诱因去从事新的资本投资。当 q 值小于 1 时，通过买进股票来取得生产性资产，将会比重置新设备来得便宜。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

的模型里头，^q 值乃是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质经济面的因素”



学术思想

詹姆士·托宾是美国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之一。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展了一种金融和实物资产的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理论亦是其货币理论的基础，他把这一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决定理论中，对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货币需求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修正和发展。此外，托宾在消费和储蓄的经验研究、金融变量对支出决策效应分析以及货币和经济周期结合研究等领域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托宾因主张对外汇交易征税而广为人知，1972年詹姆斯·托宾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提议“往飞速运转国际金融市场的车轮中掷些沙子”，首次提出对现货外汇交易课征一全球性统一交易税，经济学家后来把这种外汇交易税称为“托宾税”。托宾税有两个理想的功能：第一，对现货外汇交易课税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有效地抑制货币投机、稳定汇率，从而提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征收外汇交易税可以稳定地获得大量收入来源，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可以把这笔收入用于全球性再分配，支持发展与环境合作和经济转型，可以缩小南北差距，提高世界整体福利。托宾税旨在减少货币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他认为这种投机行为是非生产性的。托宾还主张托宾税的收入应当用以资助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联合国的有益的项目。

托宾是资产选择理论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资产选择理论研究家庭和企业持有各种实物和金融资产并同时发生债务的决策的问题。托宾阐述这些决策是怎样受风险和期望报酬率的权衡支配的。不同于这个领域中的其他学者，托宾的分析并不仅

仅限于货币，而考虑全部资产和债务范围。托宾把这些思想发展为一种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一般均衡理论，并且分析了金融和实物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该分析方法研究金融市场上的变化引起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变化的传送机制。在该领域，以往的研究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成果。托宾的研究成为经济理论中实物资产和金融市场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对资产选择理论有贡献的其他经济学家主要指出合理投资决策的规则，托宾的目标在于提供一个基础，以便理解人们在取得各种资产和发生债务时，其实际行为是怎样的。其直接成果是金融市场和经济中的各种流量的描述和分析。

托宾认为人们不能仅仅依赖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来预测货币政策对产出和失业的影响。他指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资本投资，无论是厂房、设备还是耐用品来施加影响。虽然利率是影响资本投资的重要因素，但决不是惟一因素。托宾引入了“托宾_q值”的概念，作为预测资本投资应该增加还是减少的度量指标。_q值是资产的市场价值和该资产的重置成本的比率。托宾指出如果_q值小于1（这意味着资产的价值小于它的重置成本），那么追加投资是无利可图的。反之，如果_q值大于1，则应该在未来追加投资。托宾的真知灼见还与他跟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持续的争论有关。托宾指出他的_q值，通过预测未来的资本投资，是很好的经济景气状况的预测指标。

托宾强调时间对实物资产的需求、投资和消费者需求的影响。这方面，他研究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例如税率的变化或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公债和国库券是如何影响国民收入的“传送机制”。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的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化将如何分布在生产量和价格水平的变化之中。为了回答后一问题，托宾注意到工资形成问题。由于短期中工资不易变动，商品和劳动市场上的需求变化导致就业变动而不是价格水平和膨胀率的变化。工资不易

变化也使家庭和企业在实践中和在短期内难以按照新信息调整它们的计划，这是托宾批判“理性预期”理论的有力论据。

按照托宾的理论，不是通过一个“一般”利息率水平或以某种方式定义的货币存量，而是通过整个金融结构发生影响，这也正是早期研究者忽视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托宾认为，金融系统并非主要由银行组成，而是由具有不同资产选择政策的许多不同单位组成的。由于指出了金融和实物现象之间的接触渠道，托宾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阐明了金融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化对消费量的影响。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对影响企业实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分析，托宾成功地提出了一个假设，即企业实际投资强烈地受现有实物资本的市价和取得相应的新生产的实物资本的成本之间的关系影响。当取得新实物资本的成本是给定的或上升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之类的现有实物资本的价格下降，则投资被抵消。

托宾根据他对金融系统和传送机制的研究，对近几十年中的经济状况和稳定政策进行了彻底分析。托宾对分析金融市场和金融与实物现象之间的传送机理的创造性的和广博的工作，无疑启发了 20 世纪 70 年代对货币政策效果、政府预算赤字和一般稳定政策的大量研究。可以说，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生动且高质量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托宾的基本贡献为基础的。



主要著作

《货币、信贷与资本》

托宾教授的一部“集大成”式的著作。书中就国民财富与个人财富、资产组合选择、金融市场与资产定价、货币与银行体系、一般均衡框架中的货币与政府债务等到前沿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分析和平实的阐释，其中包括资产组合选择及其平

衡、美国货币政策和银行制度史、 q 比率等托宾教授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作为对付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

在著作中，托宾从投资者避免风险的行为动机来解释人们对货币的需求和资产的选择。托宾认为，资产有两种类型：风险性资产和安全性资产。风险性资产的主要代表有如股票、债券等，安全性资产有如货币。风险性资产能带来更多收益，但要冒损失的风险。一般来说，每增加一份风险资产，正效用就减少一点，因为收益受报酬递减规律支配；而每增加一份风险资产所带来的风险却是递增的，因此负效用则随风险资产的增加而递增。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只持有货币而不去投资获利，但也不会使他的资产全都由风险资产构成，他会寻找一种风险资产与安全资产的最优组合。

作者认为，如果投资者的资产结构中没有风险资产而只有货币，他会用一些货币投资于债券等风险资产。当新增风险资产的正效用与风险负效用之和为零时，他的总效用最大。同样，如果一位投资者的资产全部为风险资产，为了安全起见，他会出售风险资产，增加现金的持有量，直到抛出的最后一张债券所带来的收益正效用与风险负效用之和为零时为止，这时，他的总效用也是最大的。这样，托宾就提出了资产最优组合的原则：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即风险）相抵，也就是所谓“预期的资本价值损益总是等于零”的资产组合原则。

（郑伟）

斯通

Richard John Stone (1931-1985年)

国 民 经 济 核 算 体 系 之 父

“斯通教授的首创精神和对国民会计体系这个题目的先驱性研究意味着对经济科学发展的重要贡献。自从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这些体系取得了独特的国际影响，而且在它们产生据以做出国民预算的预测系统性文件的同时，是周期性和结构性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1984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理查德·约翰·斯通 (Richard John Stone) 英国人，1913 年出生于伦敦。1931—1935 年，斯通就读于剑桥大学冈维尔·凯厄斯学院，在学习了两年法律后改学经济学，1935 年获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48 年，获得剑桥大学硕士学位，1957 年 获理学博士学位。1939 年，在战时经济部工作了 9 个月。从 1940 年到 1945 年 斯通是战时内阁办公室的中央经济信息处官员。1945 年二战结束，斯通被选任为剑桥新成立的应用经济学系首届主任。1949—1951 年，斯通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下设的国民账户组的负责人。1952 年 7 月 斯通被联合国统计局召往纽约，负责建立一个标准国民账户体系。1978 年被选为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1980 年退休。斯通曾于 1946 年获 C. B. E 奖，1978 年获骑士奖。1984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斯通的主要著作有《国民收入和支出》、《经济学中度量的作用》、《国民账户》、《社会科学中的数学和其他论文》、《国民经济数学模型及其他论文集》、《人口核算和模型的建立》、《建立经济和社会模型的若干问题》、《社会人口统计中的过渡与承认模型》、《调节观察值的直接与间接限制》、《人口统计计算与国民收入和产值计算的关系》等。



言论

1

“统计学将我们带进一个快乐的新时代。”

2

“只要经济学被人们更好地理解，世界会是更美好的地方”

3

“我的贡献是建议怎样整理数据最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利用这些数据做出决策。”

4

“在估算国民收入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四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即重新加上得自国外的净转移支付，减去个人所得到的种种补贴与赠予，再减去消费者债务利息，最后加上英国政府对应归于国外的利润所征的税收。原则上，这就是所要得到的国民收入。”

5

“经济体系是这样一种体系，它以生产商品和服务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最终目标。生产令商品和服务得以产生，在矿山、农场、工厂和商店等地方进行，而任何时期的总产品分为两个部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6

“生产、消费和积累是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形式：在一个孤立的经济中它们将形成一个封闭的流量系统。但实际上，国家的经济不是孤立的，所以必须把与其他经济的交易表示出来。某一国家的生产用进口来补充，而一个国家的全部最终产品没有因国内消费和积累耗尽而有一部分作为出口流到国外。因此，必须记录那个国家的生产、消费、积累和世界其余地方以及相互间的一切交易。”

7

“国民账户体系通常用于各个国家，但是做一些补充，它可用于一国的各地区或世界的各地区。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国家的各地区，首先要明确地区的定义；然后必须承认有些交易者如中央政府没有明显的地区位置；并且，一般没有许多地区间流量的信息，要收集可能费钱。尽管如此，一些国家成功地编制了地区账户。”



学术思想

斯通在发展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是一位对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体系的理论基础及实际应用进行研究的先驱和推动者，这些形成了各国所普遍缺乏的平衡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运用的基础。为了考察和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单位中的无限个体和复杂的交易网络，必须设计系统的总结和加总的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通根据 J·R·希克斯提出的社会核算的思想，具体编制了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模式。这一模式为当时英国政府有效利用战时资源，战胜纳粹德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通的工作很快扩大到涉及国际应用体系，而不仅仅用于英国。战争结束后，斯通被任命为联合国支持的国际专家组组长，编制可以推荐国际使用的标准化国民会计格式。国民经济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缩写 SNA）是当今世通行的两大核算体系之一，联合国于 1968 年采用了它，目前世界上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编制了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理论根据和模式皆来自斯通的《国民收入与支出》一书。今天使不同经济部门相互联系的平衡计算的国民经济核算，被认为是国家资金状况和发展模式系统报告的一个自身说明和必不可少的部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表示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联系。该体系是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为制订一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统计数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微观经济簿记原理与宏观经济原理相结合，综合运用统计、会计和数学方法，系统测算某一时期内一国（地区、部门）的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结果、各种重要的总量指标及有关的组成要素。它可以反映一国的国民经济结构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建立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为制订一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经济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统计数据。

斯通为了发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先定义了生产、积累和消费的概念，因为生产、积累和消费是经济活动的三个主要形式。生产应当包括那些打算销售的一切商品和服务。但是，如果一种服务永远不上市场，就不可能有一个市场标准。政府行政、国防、教育和健康服务等政府的非商业活动，由于这些服务不出售，它们只能按成本计值。家务及业余爱好者的活动，由于他们无偿地提供服务，也没有记录，因此，无法测量其成本。这样，这些部分就不能包括在生产中，并且不能记入账目内。斯通认为，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只是实际问题。因为：第一，用政府服务支持的市场经济自身是一个有趣和有用

的研究对象；第二，为了评价非市场活动的产出而提出的方法，虽然没有对它们的价值提供独立的度量方法，但趋向改进成本的测量；第三，可供测量或评价无偿的家务和业务爱好者活动的信息非常少。消费是购买的在记账期中使用的最终产品。问题是，私人汽车、家用电器之类的耐用消费品不能在购买的当年消费完。斯通就把主要耐用消费品当作投资品处理，其中一年里的折旧包括在消费中，其余部分则作为储蓄的一部分计入账户支出一边。

斯通除了在提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外，在其他应用经济学领域也有重大贡献，其中主要是消费者需求分析和剑桥增长计划。

斯通对消费需求分析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关于耐用商品导致的动态问题的处理，他探讨了耐用与非耐用商品导致了对耐用商品长期与短期需求弹性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体现在耐用商品的存量长期处于令人满意的水平上，但在短期中却不一定如此。关于储蓄行为的经济计算分析，斯通提出了一些数学模型，这些模型把财富和收入结合在一起作为解释性变量，并通过区分这些变量的临时值和长期值，对凯恩斯学派关于储蓄行为简要说明进行了改进。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斯通领导由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执行的“发展计划”。实行“发展计划”的动机是出于对英国战后相对缓慢的增长率及这种增长率所引起的经济失败意识的关切。发展计划验证了税收制度的变化、汇率的变化等政策手段，它包括两个模型，一个是处于稳定状态的模型，另一个是说明经济达到它稳定状态的暂时性模型，它考虑资本调整和控制有效劳动力与资本能力的问题。

◆ 主要著作

《国民收入与支出》

1977 年斯通与吉奥瓦纳·斯通一道重写了《国民收入与支出》，对他和米德在 1944 年合写的著作加以全面修正和重大补充这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英文版本已出到第 10 版，其中所阐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用。

《国民收入与支出》的正文分为六章。第一章对国民收入下定义并将它与其他的收入总量及产值总量联系起来；第二章从核算体系的原理出发阐述生产、消费和积累三种基本的经济活动；第三章探究了国民收入由各部门发源后再经过一系列的转移到最终由各部门使用的过程；第四章论述有关比较不同时期的收入总量及产值总量的问题；第五章讨论关于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和产出水平的问题；最后一章阐述了国民收入核算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按斯通的表述，经济核算的重要任务，是对经济现实进行全面的、有条理的和前后一致的描述，其中的概念、定义和分类，都是用来帮助实际测度的。这样，即使从经验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人们也会发现自己处处都得到理论的启示。本书出版后，在经济界广为流传，影响较大，目前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张卉）

布 坎 南

B u c h a n a n (1 9 1 9 -)

公 共 选 择 学 派 的 重 要 创 始 人

“布坎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于是，政治过程便成为一种旨在达到互利的合作手段。但政治秩序的形成要求人们接受一套规则、一种宪法。这反过来又强调了规则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和宪法改革的可能性。布坎南认为，劝导政治家或试图影响特定问题的结局常常是徒劳的，事情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则体系决定的。”

——1986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 (James M. Buchanan), 1919 年生于美国。1941 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学士、文学硕士学位。1948 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6 年以前，他在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教。1956 年至 1968 年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 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并于 1958 年至 1969 年担任该中心主任，在此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1962 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和出版了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布坎南被称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1968 年至 1969 年，布坎南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69 年以后，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 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至今。198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的著作主要有《价格、收入与公共政策》、《公债的公共原则》、《财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赞同的计算》、《成本与选择》、《公共选择理论》、《宪法契约中的自由》、《赤字民主》、《财政学》、《自由、市场和国家》等。



言 论

1

“要让本世纪这一时期几乎每个地方差不多每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人驱除那些描绘数学观的错误解释和错误假设，的确很难。放弃下面的想法不是件容易的事：‘那里’确确实实存在着有效的资源配置，它有待经济学家从概念上加以定义，一切制度安排都可能受到它的检验。尽管近来开始强调过程，反对终局性的哲学思考，但是经济学家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

2

“人们如果共同忠于一个集体，他们就是属于一个道德社会；如果他们接受共同公认的行为准则，以便属于不同的道德社会的成员之间进行生产性的交往，那么他们就参与了一种‘道德制度’。”

3

“凯恩斯的革命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标准，这个革命把国家未来的收入作抵押已不再是不道德的事情，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得不到赞同的误事行为而已。”

4

“就公共利益来说，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利益这种东西。最多也只能说我在此时此地受到了我认为对公众有益的想法的促动。——既然独立的个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之说在我看来就是无稽之谈了。”

5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个人主义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分析最终都被消解为个人作为决策者时所面临的考虑。”

6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 40 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公共选择理论知识明确地提出有关公共经济的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

7

“那些似乎最好地表达了古典自由主义灵魂之原理的人们，正是那些经历过从社会主义世界的转换的人们。”

8

“制度环境是一种把市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冲突、关系极为复杂的网络中环境。”

9

“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部分经济学者只把市场单纯地视为一种配置机制，无关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动的种类与范围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这种扩大分析。”



学术思想

布坎南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他首次系

统地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运用于政治决策过程，独创性地发展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决策理论相对应的政治或集体决策理论，并给予政治过程以全新的理解，使其不再像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利益再分配的零和博弈，而是类似于市场资源交换的过程。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公共选择学的方法论，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个人行为的经济人假说他的公共选择的方法可归纳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与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

布坎南认为，只有个体是选择和行动的惟一和最终的实体，一个集体或社会从来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行为，也不会对某种目标采取最大化努力。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有一个简单的要求，即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分析最终都被消解为个人作为决策者时所面临的考虑。他同时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他在理论分析中实际上又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像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布坎南指出政治活动比经济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经济活动比政治活动对活动结果所承担的责任要轻的多，因而不大会进行理性的比较计算。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即将政治理解为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布坎南认为，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个人同样是经济人，对于集体活动、公共物品等“好的东西”总是力求其多，而对于“坏的东西”则总是力求其少。这里，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并不

意味着总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们所追求的最大效用，可以是财富、地位、权力等利己主义因素或个人物质利益，也可以是和平、友谊、社会进步等精神因素和利己主义因素。理性假设只是说利己主义因素或个人物质利益是值得追求的，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利他主义的存在，相反，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因素都能实现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一句话，公共选择论者中的“经济人”是“新经济人”，而不是凡勃伦所指责的那种追求个人最大经济利益的“洁白无暇的经济人”。

布坎南指出，个人决策和选择的变动取决于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动，个人在市场安排和政治安排中的行为变化只能由他所处的不同制度环境来解释，而不能说同一个人在市场结构中是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者，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就成了一个克己奉公的利他主义者。个人参加政治决策和参与市场决策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因此，在简单多数制下，必然会出现多数对少数的剥夺，出现多数获利集团中的个人边际收益大于社会边际收益或个人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的结果，这正是类似于市场失灵的外部性问题。

在布坎南看来，由于从事公共选择的政治家和官僚都是经济人、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过度使用以及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政府失灵。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任何一种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与政府相互结合的结果，而任何一种结合都是在不完善的市场与同样不完善的政府间的一种次优结合。布坎南并非极端自由主义者，并非完全否认政府的存在，而是认为政府干预永远是第二位的，只有当政府缺陷明显小于市场缺陷的情况下，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政府干预。政府与市场既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双方合理边界的确定就必须依赖于不同行业和不同情况来具体比较和分析。

针对现存公共选择规则存在的问题，布坎南认为应该改变决策规则，进行宪法改革。他指出，决策规则的选择（即立宪）比决策的选择关键，因此主张立宪和宪法改革应需要一致。

同意，而对未来“无知的面纱”使得一致同意成为可能。在后立宪阶段的立法和行政决策时，主张应以多于简单多数的多数组来通过，从而有效地改变互相抬轿子的程序结构。此外，他还提出了改革官僚政治的做法。首先，应加强普通选民对政府的控制，使得政府更能按老百姓的爱好办事，更接近群众准则的目标。其次，主张在官僚制度中引进竞争机制，政府部门间的竞争应该受到鼓励，而非压抑。最后，主张让政府的一些活动“承包出去”，或者在真正的意义上全部转让给市场。布坎南倡导的政治改革模式，对于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如何进行体制改革，是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布坎南还提出了契约主义财政理论和俱乐部理论。他论证了介于私人物品和纯公共物品之间的俱乐部产品的性质，探讨了俱乐部的最优规模和均衡条件，为非市场组织和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富有启示的理论框架。他从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开始进入到公共选择领域，不仅提出了一套建立在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契约主义财政理论，而且提出了制约政治财政膨胀，以减少其对市场或个人产权侵犯的改革建议。



主要著作

《自由、市场和国家》

《自由、市场和国家》是布坎南的重要著作之一。它的出版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诞生起了奠基作用。布坎南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一种对政治的看法，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市场的决策的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应用于对政治领域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被概括为交易经济学的经济学方法。第二个方面是较为熟悉的关于个人行为的经济人假说。把经济人假设用于经常

被理想化的政治领域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接受政府总是在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而行使其职能与权力的。布坎南则主要是从公共选择学派的根本宗旨——制度比较分析与选择的角度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

该书指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在于提供一种关于各种备选的社会制度安排的比较分析。它主要关心各种备选制度约束下个人的选择问题，这是它与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就制度分析的目的而言，行为假设的合理性主要取决于由该假设推出的分析结论是否有助于制度的明确选择。公共选择活动的分析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而不像传统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不存在个人利益只存在公共利益。他说：“就公共利益来说，我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利益这种东西。最多也只能说我在此时此地受到了我认为对公众有益的想法的促动。——既然独立的个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之说在我看来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本书中，布坎南开创性地将经济人行为准则、自由交换等经济学工具和方法引入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弥补了传统经济理论缺乏独立的政治决策分析的缺陷，为公共选择理论的诞生起了奠基作用。

（刘伟）

索 洛

Robert Merton Solow (1924-)

现 代 经 济 增 长 理 论 之 父

“罗伯特·索洛教授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对增长过程的经验研究的贡献，对经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他的确是一位杰出人物，他把整个学科推向了生机勃勃的方向。他不但对我，同时也对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卢卡斯

罗伯特·默顿·索洛 (Robert Merton Solow) 美国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24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1940 年在哈佛大学学习，1942 年，他加入美国陆军，参加了在意大利的战争。1945 年 8 月退役。退役后，他重返哈佛大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9 年获得哈佛大学的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51 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 1949 年起，索洛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他曾在肯尼迪总统任职期间，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在约翰逊总统任职期间，担任收入委员会主席。1975—1980 年他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后出任该银行董事会主席。

索洛曾在牛津、剑桥等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从事专项研究，并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日内瓦大学、布朗大学等 8 所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1951 年索洛获哈佛大学戴维·韦尔斯奖，1961 年获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章，1983 年获赛德曼政治经济学奖，1987 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大贡献。索洛的主要著作有《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美国失业的性质与根源》、《资本理论与收益率》、《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投资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就业对产出的短期调整》、《短期生产率之谜的某些证据》、《充分就业发生了什么》、《财政政策的分析基础》、《关于增长理论的各种观点》等。



言 论

1

“要赢得全球新的经济竞赛，就要抢先窥视并领悟新游戏。”

2

“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严密团体的一部分，应该熟练而互相忠诚地做艰苦工作。”

3

“我一直主要致力于总量经济学的研究，甚至我研究可耗尽资源经济学的著作，也起因于对逐渐变动的资源稀缺性成为经济增长的阻力这一点的好奇我的有关增长理论的著述，旨在解释一种病状的经济由于市场失灵而围绕着其波动的均衡轨道；而我的短期宏观经济学则试图‘离析’出那些能够解释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病状现象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

4

“我自然希望增长理论有两方面的作用：提供构筑多部门模型的背景；或者为宏观经济学中因果关系的简单的、有力的、松弛的数量命题提供一个框架。这两种作用，明智的需要是对均衡增长的中期偏离有普遍了解。那是日常宏观经济学的实质。在英语国家中自从凯恩斯以来和在瑞典从林达尔和斯德哥尔摩学派以来，它一直向前延伸，今天它仍在两地发展着。”

5

“长期的稳定增长所追求的是‘自然增长率’，暂时性增长所追求的是通过提高积累率来大量追求投资来取得超过自然增长率的经济增长速度。”

6

“在开始阶段，产出的增长率必定高于稳定状态时的增长率，因为产出的增加快于旧的稳定状态下的增加。但是，经济系统最终会趋近其新的稳定状态；产出的增长率下降到自然增长率的水平，并且，劳动增长率、单位资本产出和人均产出皆趋近于他们的新的稳定状态值。”



学术思想

索洛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影响是惊人的，足足影响了美国一代年轻的经济学家。

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背景是研究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过程。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根据凯恩斯理论，分别研究了经济在稳定状态中增长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他们认为，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需要储蓄或投资的增长与就业的增长、资本—产出的增长保持一致，在此一致条件下，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轨道向前发展，而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就会出现危机。显然，这个模型要求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取决于有效需求大小的实际增长率会一定与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必然相等，这使得哈罗德—多马模型有理论意义而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索洛修正了 20 世纪 40 年代在经济学界占垄断地位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认为这一模型是片面的。他提出了索洛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这是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主要贡献。索洛模型描述的是投入要素增长速度、产值增长速度与科技进步速度之间的函数关系，它的基本公式表示如下： $Y = A + \alpha K + \beta L$ 。其中 Y 表示产值增长速度， A 表示科技进步速度， K 表示资金投入增长速度， L 表示劳动力增长速度； α 表示资金产出弹性系数， β 表示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索洛模型假定资金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资金产出效率和劳动生产效率对产值增量的贡献当然就是技术进步的贡献。不难理解，索洛模型实际上是表述理想状态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数学模型。他的模型同哈罗德—多马模型的主要区别，反映在索洛模型的两个假定上。第一，假定有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但这两个生产要素是能够相互替换的，即资本和劳动力能够有可变的比例组合。依据这一假定，索洛认为资本一产量比率或其倒数即资本生产率是可变的。第二，假定在任何时候，资本和劳动力这两个生产要素都能得到充分利用，不存在需求不足而使生产要素闲置的问题。由此，索洛得出结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有趋向于和自然增长率 G_n 相一致的必然趋势。

索洛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对所有对经济增长做贡献的生产要素加以区分，从而得出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各自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根据美国 1909—1949 年的经济资料，他论证了当时人均工时产量增长的八分之一是由于所用资本的增加，大致八分之七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导致的。所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把这种进步用于生产，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他指出，只要能维持技术进步，就可以获得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正是索洛等人的研究成果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注意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致力于技术研究的投资。

索洛创立的增长模型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在当时，哈罗德和多马的极其不稳定的研究刀锋增长模型一直让人们担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长期经济增长是不稳定的。而索洛模型提出了资本主义模式的资本积累过程，从长期来讲将收敛于经济增长稳定状态（Steady state），这一结论无疑是给当时关心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今天已成为宏观经济学的组织结构和许多宏观经济问题分析的理论框架。普雷斯顿在一篇评价索洛贡献的文章中指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不限制于增长研究。该模型在组织和指导以后的总量经济研究方面发挥了中心的作用。”世界银行至今仍然采用他的经济增长模型。在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许多在此基础上的扩充模型被不断提出。例如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就是在索洛模型基础上考虑最优消费问题的一个崭新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基础理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内生经济增长研究热潮，通过放弃新古典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假定，对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并不意味着是对索洛在经济学中贡献的否定，恰恰相反，它说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强大生命力，增添了索洛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除经济增长理论外，索洛还对宏观经济理论的其他方面进行了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就业理论方面，索洛对市场出清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考察。第二，研究了通胀与物价之间的关系。他与萨缪尔森在1960年用菲利普斯曲线考察了美国的情况，并据此分析了它对反通胀政策的意义。第三，他强调了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计量工作”重要性，指出它们在实际工作和理论分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实际工作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用来估计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在理论分析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用来解释以“劳动”和“资本”投入代表的产出水平，索洛还运用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收入的分配水平。



主要著作

《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

《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是索洛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最重要著作。他在此书中把经济增长理论表述成一个说明某些经济制度运动规律的理论。全书围绕着哈罗德—多马的均衡增长条件，从一个简单的实物经济模型到复杂的货币经济模型逐步展开讨论，最后阐述了有关这一增长经济过程的若干政策问题。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内容。第一，资本—产量比率可变的增长模型。索洛认为，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长期资料来看，在增长过程中，经济的产量与就业量的比率、净投资或净储蓄占产量的比重、投资与产量两者的增长速度、资本与产量的指数增长率、资本与产量的比率都不是稳定的，对于增长理论来说，稳定状态只能作为一个出发点。第二，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稳定增长。索洛认为，现代工业经济中的产量和资本比人口增长的快，假定它的三个量同等增加是不现实的。因此，模型必须进一步考虑技术进步因素。同时，资本概念也变得模糊了，分别适用于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两部分资本无法进行直接比较和加总，这样，单一的资本量数字不复存在，前面作为关键变量的资本—产量比率便失去了意义。第三，货币经济的增长模型。前面两个部分研究的模型都是实物经济模型。索洛认为，有必要把它扩充为货币经济模型，因为：首先，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增长是在这个环境下实现的；其次，只有在货币经济中，许多经济现象才有意义。为此索洛构造了一个既有实物资产又有金融资产的经济模型。同时，索洛把政府的经济活动也引入了模型。第四，增长过程中

的经济政策。任何有关现实世界的理论总有其政策含义，增长理论也不例外。索洛从比较抽象的层次上，讨论了增长理论对社会决策者或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政策理论和方案。

(张卉)

米 勒
Merton Miller (1923-2000年)
现 代 公 司 金 融 理 论 大 师

“米勒在财务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对企业财务理论贡献重大，获奖乃实至名归……米勒参与革新企业财务守则，将之从一系列松散的规则转化成可尽量扩大股东价值的守则，影响深远。”

——1990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默顿·米勒 (Merton Miller, 1923—2000 年) 美国经济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中学就读于波士顿拉丁学校，1940 年进入哈佛大学学习，3 年后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二战期间，米勒先后任职于美国财政部税务研究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研究及统计部。1949 年，他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学习，1952 年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和卡内基一米伦大学，1961—1966 年任芝加哥大学金融与经济学教授；1966—1981 年任芝加哥大学银行与金融学教授；1981—1993 年为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教授直至 1993 年退休。在此期间 米勒于 1983 年至 1985 年还曾兼任芝加哥交易所理事。此外，米勒还是美国经济计量学会会员，曾经担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和《商业杂志》副主编。米勒的主要论著有：《资本成本、公司理财与投资理论》(1958 年 与莫迪利阿尼合作)《金融理论》(1972 年 与费玛合作) 1990 年由于他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 年以后，米勒还一直担任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理事。2000 年因癌症逝世 享年 77 岁。



言 论

1

“从本质上来说，研究改革等于是对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司治理的各种可能方略作一番选择”

2

“期货是人类二十世纪伟大的金融创举。”

3

“18世纪曾风行一时的重农主义将物质性产品（特别是农产品）的生产界定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惟一源泉；今天，对金融创新所致社会负面影响的某些指责，看起来只不过是重农主义的翻版，这就是产品制造之外的任何职业都是非生产性的。现代重农学派藐视任何针对消费者主权的呼吁，他们机械、武断地将成千上万正利用新产品的华尔街从业者划入非生产性阶层。”

4

“我并不认为应该‘放松，要愉快，而不要着急’。在美国我们应当着急，不过是面对我们的严重问题，例如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将政府开支置于理性控制之下或者阻止我们曾一度自负的公共教育系统的不断退化。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有限的着急能力于次要的和大部分自我校正的像金融操纵之类的问题。”



学术思想

米勒的贡献主要在于发展企业金融理论方面，他最突出的贡献是与莫迪利阿尼共同创立的关于资本结构与股息分配的“MM 定理”，这一定理构成了企业金融的理论基础。此外，米勒还推动了企业金融实践活动的变革，把这一实践的松散的习惯做法转变成了一套精确完善的方法，在财务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

早期的“MM 理论”包括如下三个重要结论：第一，股权融资和借款之间的选择不影响公司价值。“MM 理论”认为，如果不考虑公司所得税和破产风险，且资本市场充分发育并有效运行，则公司的股权融资与公司资本总成本和公司价值无关，这是因为，尽管负债资金成本低，但随着负债比率的上升，投资者会要求较高的收益率，因而公司的股权资金成本也会上升。第二，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MM 理论”认为，对股票上市公司而言，在完善的资本市场条件下，资本向高收益公司自由地流动，最终会使不同资本结构的公司价值相等。因此，若以股票市价总值来衡量公司价值，那么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第三，一个公司的股息政策不影响均衡中公司的市场价值。这是因为，公司价值完全由公司资产的获利能力或投资组合决定，股息与保留盈余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影响公司价值，因为股息支付虽能暂时提高股票市价，但公司必须为此而扩大筹资，这样会使企业资金成本提高和财务风险上升，从而引起公司股价下跌。因此，米勒认为，股息政策仅能反映目前收入与未来期望收入的关系，其本身并不能决定股票市价或公司价值，这一论断与传统财务理论也有很大区别。

必须明确的是，MM 理论所谓的资本结构无关紧要，只是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下才成立的。它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第

一，个人和企业一样能进入同一资本市场，个人借贷和企业借贷是充分替代的；第二，任何企业想通过改变财务资产结构从而改变企业市场价值的意图，都会被股东改变自身投资组合的对策所抵消。“MM 理论”的前提是完善的资本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考虑公司所得税。由于现实中不存在完善的资本市场，且还有许多阻碍资本流动的因素，尤其是所得税对各个公司而言都是存在的。所以后来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论述各种放松 MM 理论最初的立论条件会导致的后果，并不断修正、完善 MM 理论。

为了使“MM 理论”更接近现实生活，米勒等人又对“MM 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米勒 1977 年发表的《债务与税收》一文，对债务融资的税收因素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他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股票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少于债券收益的所得税，则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债券的税前收益必须要大到足以补偿股票收益和债券收益之间个人所得税的差别，否则没有人愿意持有债券。因此，某一层面上税收减免的好处被另一层面上税收的增加的劣处所抵消。米勒由此推导出一个市场均衡模型，认为就公司整体而言，存在着一个使公司和投资者支付的总税收达到最小的均衡水平，但对于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司来说没有最优的负债比率。

MM 理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财务杠杆税收追随者效应”。米勒在《股息政策、增长和股票定价》（1961 年）一文中曾指出：每个公司都会试图以自身来吸引一些喜好它特定股息支付比率的“追随者”。以无债务或低债务融资为策略的公司可以在高税收阶层的投资者中找到市场，而选择高债务融资的公司同样可以在其他税收等级中发现证券的自然客户。米勒还认为，把所得税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后，尽管股权资金成本会随负债比率的提高而上升，但上升速度却会慢于负债比率的提高。可以说，米勒在市场均衡模型中表达的思想再次回到了最初的 MM 理论，即单个企业的金融结构与市场价

值无关他从一般市场均衡条件，科学地阐述了资本结构理论，既保持了 MM 理论的前后一贯性，又使 MM 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完善，使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巩固了 MM 理论作为资本结构理论主流的地位因此，修正后的“MM 理论”认为，在把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引入分析后，公司可以利用免税政策，通过调整其金融结构，提高企业的负债比例，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公司的最佳资本结构应是 100% 的负债。但这种情形在现代社会显然不合理，因此，后来有些学者引入市场均衡理论和代理成本、财务拮据成本（因偿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损失）等因素分析企业金融结构，对“MM 理论”进一步加以完善。

尽管米勒教授引人注目的 MM 理论导致了大量的反对性研究，但所有的人都承认他在金融经济学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他在公司理财中的特殊地位他在开拓人们的视野，推动资本结构理论乃至投资理论的研究，以及引导人们从动态的角度把握资本成本与资金结构、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和股息政策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许多卓越见解，因此，“MM 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一次“革命性变革”和“现代金融理论的基础”。



主要著作

《资本成本、公司理财与投资理论》

《资本成本、公司理财与投资理论》在财务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贡献，开启了理财学现代化进程的大门。这篇论文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对资本成本、财务决策、企业价值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关于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新见解。米勒教授指出，企业价值是企业未

来自自由现金流量的资本化价值，即： $VL=VU=FCF/WACC$ 式中， VL 为有杠杆企业的价值， VU 为完全股权资本企业的价值， FCF 为自由现金流量， $WACC$ 为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它表明：对风险相同的企业而言，企业的资本成本或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组成部分借入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结构无关，企业通过科学的投资决策，可以创造理想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结合合理的风险控制，实现理财目标——企业价值最大化，进而实现投资者财富的最大化。其他的财务决策如融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本政策等与投资决策相比较均为派生的、从属的、次要的财务决策。理财目标的实现最终要依赖于企业投资决策的水平，因而，对投资决策进行分析、判断的过程，就是对企业价值进行长远规划的过程；而投资决策实现的过程，就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实现的过程。 MM 的股利无关论实际上是对 MM 企业价值理论的进一步补充。

(焦剑英)

科 斯
Ronald Harry Coase (1910—)
当 代 新 制 度 经 济 学 创 始 人

“科斯阐述了经济组织的产生原理，为我们理解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点。他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并且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斯的研究成果是经过多年的长期研究逐渐积累起来的，科斯的理论经过很长时间才被认可，直到七八十年代才备受关注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学和法学研究的理论源泉之一。”

——1991 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罗纳德·哈里·科斯 (Ronald Harry Coase), 1910 年出生于英格兰威尔斯登, 1932 年获伦敦大学学士学位。二战期间, 他在政府部门负责统计工作, 先后在森林委员会、中央统计局、战时内阁办公室工作。1946 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 负责教授经济学原理课程, 并且继续从事对公用事业特别是邮局和广播事业的研究。1951 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1964—1982 年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 1994 年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资深会员。科斯的主要著作包括:《企业的性质》、《美国广播业 垄断研究》、《社会成本问题》、《经济学中的灯塔问题》、《企业、市场与法律》等。其两篇经典性著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91 年据称由于其发现和澄清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对经济制度结构和运行的意义而获得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言论

1

“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

2

“在探索企业的定义时，像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首先考察经济体制或许是合适的。”

3

“企业的扩张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家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

4

“研究为什么协调在某一情况下是价格机制的工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企业家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

5

“交易费用的高低影响到生产方式的选择，交易费用过高，

不仅意味着进行既定的交易活动要耗费更多的资源，而且意味着导致生产费用节约的生产方式无法实现，交易费用的浪费会带来生产费用的浪费。”

6

“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然而，这种考察不仅对于防止因对有关理论赖以成立的假设缺乏了解而出现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经济学在一系列不同假设的选择中作出正确的判断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这个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人的使用方式就有所不同。”

7

“当我们考虑企业应多大时，边际原理就会顺利地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始终是，在组织权威下增加额外交易成本，或是等于由价格机制‘组织’这笔交易所包含的成本。实业家们不断地进行实验，多控制一点或少控制一点交易，用这个办法来维持均衡……最后，这样的分析就使我们更准确地叙述企业家的‘边际产品’的含义。”



学术思想

科斯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法学家兼经济学家。他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和“科斯定理”，阐述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容。科斯发现和解释了产权和交易费用如何影响经济的问题，将经济推理应用到法律问题上，掀起了“法律与经济”运动。科斯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为创立企业的现代经济理论，为现实主义经济理论作出了基础性

贡献

科斯的研究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的风险性，这就存在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成本。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即用成本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成本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规模的大小必须达到这一点，即在企业内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公开市场完成这笔交易所需的成本，或者等于由另一个企业来组织这笔交易的成本。换句话说，企业的规模被决定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费用那一点上。因为，谁都明白：如果企业规模偏小、生产量和交易量不足，单位产品成本就会偏高、经济效率就下降；反之，企业规模超过一定程度，企业管理层次过多和宽度过广会难于管理，导致规模经济效益递减。因此，一个给定的企业为什么应是那个规模、不大也不小？为什么有居间人和金融中间机构？为什么采取不同类型协议和合同？以及实行代理、许可证、企业合并等等，都可用“交易费用”作出解释。科斯正是通过对交易概念的一般化而使新制度经济学体系得以形成。从现代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的性质》一文的贡献不仅在于引起了对企业重要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把交易费用明确地引入经济分析”，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作出了新的解释。

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被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如代理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外部性问题、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形态、经济史甚至政治制度等。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待经济组织的效率比正统的理论中所研究的帕雷托效率更接近实际，因此对于实际经济组织效率的改进也就更有帮助。实际生活中要想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选择交易费用较小的契约安排。交易成本概念一般化的过程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科斯指出，企业的组织形式

虽然节省了交易成本，但他本身也要为组织生产付出组织成本。因此企业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的相对关系，企业适度规模的均衡条件是最后一项经营活动扩大后所付出的组织成本等于可能节省的交易成本。

科斯还被看作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关于产权界定以及交易成本对议定契约的影响的理论。科斯认为，客观上不仅存在着资源的产权，而且还存在着很多法定权利，例如按照某种方式使用土地的权利，避免土地受污染的权利以及对事故进行赔偿的权利等。科斯认为交换应该包括这些权利的交换。科斯产权的概念就内容看，不仅限于生产资料，还包括了生活资料等广泛内容；就权利看，包括对所拥有的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以及财产所派生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物品或功效的受益权和不受损害权；就对财产的各种权能因素的重要性来看，各种权能因素并重，否认归属权的决定意义。

科斯的产权理论主要是包含在科斯定理中的，科斯定理的产生首先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是指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危害，却不补偿后者损失（称外部不经济）或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益处却不能得到后者补偿（称外部经济）。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从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差量分析了由于外部性问题（特别是外部不经济问题）而使“市场失效”，认为必须要政府来干预。但科斯在 1960 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把外部性问题和交易费用联系起来，认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无须政府出面，市场机制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须具备一定条件，这就是由科斯的追随者总结的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只要产权明晰，则无论产权在谁一方。人们之间的自愿交易都可以使资源获得有效配置。即只要交易费用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由于现实生活中交易费用是不可能为零的。他们又提出科斯第二定理：在非零交易费用场合，产

权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它的含义是，只要产权明确，即使存在交易费用，人们仍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交易方法（产权制度）使交易费用达到最小，从而降低资源浪费程度。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科斯的有关经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创了用交易成本的框架去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指出了制度选择或安排的经济学原则，从而推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科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实原则，使其研究再现了世界的丰富多彩而避免了单纯逻辑推论可能造成的疏漏。但科斯以交易成本作为其理论的中心概念，使得其理论可操作性较差，不能以系统的形式运用于估价企业和市场之间完成交易的效率。因此，科斯定律被经济学家频繁地誉为“远见卓识”却不被使用达三四十年之久。



主要著作

《社会成本问题》

本书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科斯提出并论证了如果法定权利是明确规定了，并且交换法定权利的合同能够强制履行，则法定权利的均衡分配就是有效率的；也曾被概括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里，不管权利初始是怎样被安排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都能导致财富最大化安排。虽然研究过本书的经济学家们对科斯定理的认识和概括并不统一，对此，科斯本人也没有作出过明确说明，但是这毫不影响本书以及交易成本在现代制度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企业的性质》

《企业的性质》是科斯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产权”经济学的开山之作。科斯在书中写道：研究为什么协调在某一情况下是价格机制的工作，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企业家的工作是极为重要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为了其他一些目的作出的）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我们必须说明在实践中影响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基础。

该书探讨了企业的起源及决定其规模的因素，文中说明了企业在一个专业的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对企业的性质进行了开拓性的解释。指出，市场交易不是无摩擦的，存在正交易费用，企业同市场一样也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两种机制的选择取决于交易费用的比较，节约交易费用作为企业存在的原因，也界定了企业规模的边界。本书被认为是企业理论的真正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具有重大影响。

（甘璐）

诺思

Douglas C. North (1920-)

新 经 济 史 学 的 主 要 缔 造 者

“为了解释经济和制度变化，应用经济理论和定量方法，更新了经济史的研究。”

——199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 North)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920 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42 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文学学士学位。1950 年在华盛顿大学任教。1952 年，诺思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博士学位。1960—1966 年期间，诺思担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在此期间还担任了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1967—1969 年，诺思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期间，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此期间的研究成果为《制度变化和美国经济的增长》(1971)、《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1973) 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3 年诺思担任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院历史研究中心的访问主任。1982 年他重新回到华盛顿大学任教，任经济系主任，还曾任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西方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其代表作有：《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美国 1790—1860 年的经济增长》、《制度变化和美国经济的增长》、《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等。由于在经济史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1993 年诺思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罗伯特·福格尔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言论

1

“历史表明，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

2

“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3

“我一生要为改进社会而工作，而改进社会的方法是找出什么使经济依照自己的方式运行或使之失效。我相信，一旦我们对时间进程中决定经济运行的事物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改善它们的运行。”

4

“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激励，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5

“正式规则、非正式的习俗及其实施困难方式决定着经济绩效。尽管正式规则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非正式的习俗通常变化缓慢。由于只有习俗才为一组正式规则提供‘合法性’，革

命性的变化从来不具有像它的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的革命性，而其绩效也有利于想像。当一些经济实体采用另一个经济实体的正式规则时，其绩效将与那个经济实体有很大不同，因为它们有不同的非正式习俗和实施方式。这意味着把成功的西方经济的政治和经济规则引入第三世界和东欧经济实体不是（产生）好的经济绩效的充分条件私有化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

6

“为什么要专注制度呢？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framework of incentives）”



学术思想

诺思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他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对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革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并试图建立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他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内的广泛的分析框架，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结构、制度变迁与创新为主轴的新经济史理论体系。

诺思在经济研究中发现，用传统的经济理论去阐释某一时期的经济绩效时，总存在一定的“剩余溢出”。在经济增长中，除传统经济学说的增长参数外，忽略了制度这一重要因素，正是制度因素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才使原来对增长现象的解释出现偏差。进一步说，传统经济学在分析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时，忽略了交易成本因素。交易成本不仅客观存在，有时甚至非常昂贵。尤其是随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精细发展以及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成本会不断提高。所以，如果撇开交易成本，就

难以理解交易过程本身。也正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才出现了某些用于降低成本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制度的功效就是要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来界定交易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环境中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使来源于交易活动的潜在收益成为现实。这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极大的交易成本差异上。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其制度因素所导致交易成本过高。因此，经济增长的历史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科学发展的历史融为一体，而是与组织人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体系的历史分不开的。

诺斯理论体系的基础部分是对“制度”的界定及对三种典型的交换形式的区分。他指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另一种更为抽象的定义是，制度是个人与资本存量之间，资本存量、物品和劳务产出及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诺斯认为，制度分析的重点是制度环境，因为它对交易费用，因而对实现交易中的潜在收益产生一种效应，所以除了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之外，还应把构成制度环境核心的交换形式作为理论体系的基础部分。根据诺斯的观点，交换存在三种典型的形式：个人之间的交换、没有第三方实施约束的非个人交换和存在第三方实施约束的非个人交换。这三种典型的交换形式对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在增大，因而实现经济中潜在利益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第三方实施约束的非个人交换使“制度的可信賴度”增大，也使经济发展更快。

诺斯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国家并不是“中性”的，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诺思指出，在实现了同样的制度变革后，由于国家（政府）作用不同，有的国家能

促进经济发展，而有的国家却产生经济衰退，甚至动荡。因此，尽管政府作为政治组织在促进制度变迁方面发挥的作用要受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但从历史上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好的政府往往能促进制度变迁通向好的轨道，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只有当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报酬递增相一致时，制度变迁才会使经济增长。

诺斯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意识形态是影响经济发展和制度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引导，从而使决策方程简单明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伦理道德认识相互交织在一起，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念，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理性。可见，经济增长有赖于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在现有组织和技术的制约下，产权的创立、裁定和行使的代价极为高昂，因此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地提供产权保护与强制力的经济组织便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也起着相当程度的作用，以此促进和维持了经济的增长。

此外，诺思还分析了人口数量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认为，在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必定发挥作用，“人口的继续增长会导致收益递减”。由于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压力加大，从而会进一步增加建立和行使新产权的成本。诺思认为，解决人口数量增长和资源缺乏的方法有两种途径：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制度创新。

诺思的新经济史论在经济史学领域无疑是革命性的。尽管在他之前有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产业革命的起因，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了解经济长期增长的机制和过程，但是很少有人从广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出发，以制度为轴心来探索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诺思在继承新古典传统的基础上，把经济方法用于分析产权产生过程和个人、社会的各种行为，构建了一个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制度理

论，用以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得出经济组织的效率是经济增长关键因素的结论，从而在制度变迁、产权界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一种逻辑关系，对制度研究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要著作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诺斯认为，制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以及这些约束的“实施特征”，即制度主要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它们的实施方式构成。他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是相对稳定的，否则不足以起到减少不确定性的效用，但是，制度又是变迁的。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来自于相对价格或者偏好的变化。诺斯认为，决定制度变迁的轨迹有两个原因：收益递增和不完全市场。诺斯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制度变迁的轨迹。在书中，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混合物，是那些诱致生产率增长的部分和抑制生产率的部分的混合，制度变迁同时为这两类活动创造了机会。在“路径依赖”和“体制锁定”的作用下，社会的进展将造成经济绩效的严重低下。事实上，在诺斯的书中无论是对于论述制度的组成，制度的变迁，还是制度的经济绩效，他始终围绕着交易费用的概念，交易费用不仅作为制度运转的费用，还可以判别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变迁的成本”或“改革成本”来判别不同改革道路的优劣。

《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

在该书中，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

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绩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尤其是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要说明现存的制度结构及其演进的方向，就必须研究它的历史，探明它发展的路径。因此，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

诺思明确指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关于制度变迁的国家理论既要解释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或经济组织的内在活动倾向，又要能说明历史上国家本身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国家提供种种基本服务、基本经济博弈规则和政治制度，以提供保护和公正形式的服务换取收入。制度理论必须有一个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补充。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有“搭便车”的心理，为了克服这种现象，社会就需要通过伦理和道德力量使社会得到稳定。而简单的成本—收益方法无法解释克服“搭便车”行为，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解释制度的变迁。

诺思通过对这三个重要变量的实证研究，以其历史材料和演进轨迹为基础，构筑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并力图用它来对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由此出发，诺思成功地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融合为一体。用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来解释历史；以经济史的材料构筑了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成为新思想的启迪者和提出者。

(焦剑英)

斯 蒂 格 利 茨

Joseph E. Stiglitz (1942-)

当 代 经 济 学 集 大 成 者

“ 基于他广泛与多样的理论贡献以及这些贡献的活力和生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青年经济学家家中无与伦比。从增长资本到歧视经济学，从公共财政到合作金融，从信息到不确定性，从枯竭性资源的竞争性均衡到垄断竞争和产品的多样性等，他的足迹遍布当代经济理论。我们相信他的研究道路会很漫长。”

——1979 年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颂词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 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42 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生产钢铁的小城加利 (Gary), 1964 年在阿默斯特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大名鼎鼎的保罗·萨缪尔森 并于 1967 年获得博士学位。1969 年 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时年仅 26 岁。此后，他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1 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斯蒂格利茨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多数时间内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1993—1997 年间他在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 先为成员 后任主席。1997—1999 年间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的代表著作包括风靡世界近 20 年的《经济学》及最新力作《全球化及其不满》等 其《经济学》在中国成为畅销书 销量达 10 万册以上。1969 年 斯蒂格利茨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克拉克奖”设立的宗旨是表彰 40 岁以下对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 对斯蒂格利茨而言“突出贡献”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描述。2001 年 斯蒂格利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说明中表示，在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对信息不对称理论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许多贡献都改变了经济学家分析研究市场运作的方式。斯蒂格利茨的主要著述有《竞争、激励与风险理论》、《政府经济学》、《国家的经济职能》、《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的福利经济学》、《信息与经济分析》、《农户与城市居民 税收、价格与经济发展的负担》等。



言 论

1

“如果一个政府是腐败的，私有化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

2

“有句古老的格言说，如果你想把某件事做好，那你最好自己去做。这句格言的基本思想就是激励问题。对于一个拥有厂商并且自己就是厂商惟一雇员的人来说，激励问题很清楚，即：使厂商的利润最大化，就能使你的收入达到了最大化。”

3

“在美国，由个人做出主要决策，反映经济学家的信念，这对于保持经济的效率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学家同时也认为：政府进行某些干预也是需要的。找到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在经济上的适度平衡是经济分析的中心问题之一。”

4

“因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所以：第一，即使市场里有人想买，有人想卖，但是交易不一定发生；第二，即使交易发生，可能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第三，当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时，‘非市场’的机制可能应运而生，不过，这些非市场机制可能会造成愈益反损的结果。”

5

“市场经济的特征是高度的非理性和不完整性。旧的模型假定信息是完美和理想的，但即使很小程度的信息不完整也能

够导致很大的经济后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些人知道的比另一些人多’。”

6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工资和价格具有‘黏性’，所以，当遇到需求和供给的冲击，市场不能迅速‘出清’，其中会有一个非均衡状态的时期，在此时期，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思想

斯蒂格利茨才华过人，极富创造力，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已硕果累累。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许多贡献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家分析研究市场运作的方式。

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非均衡量。他运用信息经济学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切都应该作为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因此，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描述经济运行规律，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结论。

斯蒂格利茨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分析框架，认为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存在错误理解，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

论存在两个严重缺陷：第一，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充分性问题，并不当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第二，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为前提条件，斯蒂格利茨提出了新的模型并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拓宽了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视角，并为在转型经济中的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启发性的思路。

斯蒂格利茨与罗斯柴尔德合作提出了“劣势选择”理论。他们深入地研究了保险这个特殊的市场，考察了什么样的无信息代理人在非对称市场上可以改变他们的结局。他们认为，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因为保险公司无法确切地知道投保人对投保的责任心和道德究竟怎样，这种非对称也称隐藏知识。他们论证指出均衡的惟一性是隐藏模型的典型特征，因为隐藏均衡与最有社会效率的信息发送均衡是一致的。此后，斯蒂格利茨也反复指出，如果忽视了信息的非对称性，经济模型可能造成误导。

斯蒂格利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激励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而且有很高的实用性。斯蒂格利茨和夏皮罗共同创立了被称之为效率工资的劳动市场模型，以期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解释非自愿失业问题，这成为现代劳动力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斯蒂格利茨还研究和指出了市场体系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市场失败”）并指出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他认为，完全自由市场经济并非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能排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仅仅依靠自由市场机制是不可能产生最佳效果的。特别是在就业、环保、社会福利等社会效益方面，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修正自由市场机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赞誉斯蒂格利茨是“以经济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与政治问题的开山祖师”。

斯蒂格利茨始终关注经济全球化问题，并明确表示自己是

支持全球化的，认为全球化可以是一个强劲的、积极的力量。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得益于经济全球化，这使它们有更多进入国际社会的机会，也有更多机会接触国际最新技术。但是，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全部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反而，在很多方面受到严重的冲击。全球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戏的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制定的，或者说是为了确保金融寡头的利益而制定的。斯蒂格利茨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关注的就是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减少贫富差距，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斯蒂格利茨的研究几乎遍及现代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信息经济学、货币理论、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公共经济学、财政学等方面都有过开拓性的贡献。斯蒂格利茨深邃广博的学术思想和对他现实公共政策制订的影响力，使他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主要著作

《经济学》

《经济学》被称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本书与那些为数众多的教科书不同，斯蒂格利茨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那些经典式的教科书所阐述的原理已经不是今天的原理。马歇尔的教科书出版于 100 年以前，萨缪尔森的那本书已接近 50 年之久。我们经济学者所理解的本学科的内容已经有了改变，然而，教科书并没有跟上我们的步伐。很显然，推翻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的体系是本书最重要的特点。当然 这里所说的“推翻”主要指理论框架及其有关的学说 并不是推翻过去的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原理。

本书出版后立即受到各国欢迎，成为 20 世纪末经济类图

书中最为畅销的一本。该书洞悉和把握了西方经济学的新潮流和发展方向，打破了新古典主义的微观与宏观的界限，把宏观经济分析基于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而微观经济学以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基础这一方式来表述。并大量引用和阐述了许多新观点和新例子来证明用微观也可以解释宏观现象的事实。该书还拓宽了经济学的领域与视角，内容涉及环保、激励、产权、教育、广告、法律甚至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丰富了经济学的学科内容与研究方向。最为难得的是斯蒂格利茨独立完成了全书，而不像其他经济学原理书籍那样由一位微观经济学家和一位宏观经济学家共同完成，所以全书体系完善，层次分明，而其生动的语言，鲜活的事例更使本书显得深入浅出。

(马莉)

蒙代尔 M u n d e l (1 9 3 2 -) 欧元之父

“我相信供应学派的创始人蒙代尔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里根总统和我们大家站在他的肩膀上，才发动了‘里根革命’，使我们找到了振兴美国经济的道路。”

——杰克·肯普

“蒙代尔教授奠定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理论的基石……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蒙德尔教授的贡献仍显得十分突出，并构成了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内容。”

——19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罗伯特·蒙代尔 (Robert A. Mundell) 经济学家 供应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32 年 10 月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读研究生。1956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荻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 年以来，一直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的顾问 其中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加拿大政府、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等。1970 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委员会货币委员会的顾问，是 1972—1973 年度在布鲁塞尔起草关于统一欧洲货币的报告的九名顾问之一。由于蒙代尔教授在建立统一欧洲货币方面的卓越贡献，他被誉为“欧元之父”。1999 年 10 月 13 日蒙代尔获得了 1999 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发展了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蒙代尔的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学》、《国际货币体系：冲突与改革》、《人、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货币理论 世界经济中的利息、通货膨胀和增长》等。



言论

1

“在固定汇率制下实行财政政策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实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实行货币政策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实行财政政策则是无效的。”

2

“很早以前，我就认为欧洲将逐渐融合，货币联盟对欧洲是一件好事。”

3

“经济在获得持续发展的同时，能够实现低通胀或零通胀。”

4

“并不是货币区域越小越好，货币区域越小，就越容易引起投机，如果开放程度高，汇率变动时物价的影响也将加强。”

5

“惟一正确的做法是减税，然后通过收紧银根来保护国际收支平衡。”



学术思想

蒙代尔最重要的一项贡献是对开放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

进行了创新。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蒙代尔就发表了《固定与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分析》与《固定与浮动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两篇文章，提出了开放型经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分析理论。

1968 年蒙代尔发表了奠定其国际经济学界大师地位的代表性专著《国际经济学》，建立了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这一模型最主要的贡献在于系统地分析了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在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它构成了蒙代尔开放型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为在开放型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可行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得出的结论极其简单，可概括如下：（1）浮动汇率制下，假定资本不能自由流动，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引起：本币贬值，收入增加、利率下降，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得到改善。（2）浮动汇率制下的财政扩张会引起：本币升值，收入增加、利率上升国际收支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状况恶化。从长期看，外汇储备下降，但收入、利率和外汇国际收支状况不变。（3）固定汇率制下的财政扩张会引起以下变动：从短期看，利率和收入上升，国际收支全面盈余（获得净储备）；从长期看，收入进一步增加，而利率略微下降，国际收支总盈余减至零，经常账户出现大额赤字。从政策角度看，该模型的结论是：浮动汇率制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效。此外，资本净供给越有弹性，上述结论越正确。

蒙代尔提出固定汇率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重新构建了开放经济的宏观理论。蒙代尔认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大多数国家的货币由于币值经常变动而影响它们在世界范围内执行支付职能，因而当某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它就不能以向外国发行货币的方式，吸引外国资本和吸收商品劳务资源来调节本国经济。但如果某些国家建立一条约或规则，对各国货币规定一个固定汇价，那么上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因为，两国国家有共同货币，它们承担风险的

范围就随之扩大。一个国家由于歉收、罢工或战争所产生的实际收入的损失，在使用共同货币时，能够利用它的货币储备来抵消这种损失的影响。但在浮动汇率之下，这种损失只能由一国自己承担。蒙代尔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国际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核心内容，而且可以立竿见影地作为宏观政策加以应用。

蒙代尔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提出了“最适度货币区”的概念，这一理论为以后欧洲货币一体化乃至欧元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当结合某种经济特征判断汇率制度的优劣。他提出了在当时被视为激进的、最佳货币区域分析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不能以国家为单位而应以地区为单位来考虑货币区域，应该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确定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在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差的地区之间，调整汇率是有效的，但是在生产要素流动性高的地区可以成为一个货币区域的候选区。蒙代尔认为，只有当一个区域内所有经济体的经济模式和水平相似到一定程度后，该区实施单一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才会对该区内的所有经济体有利。

蒙代尔还指出，并不是货币区域越小越好，货币区域越小，就越容易引起投机，如果开放程度高，汇率变动时物价的影响也将加强。因此，通过汇率来调整宏观经济的效果有时是有限的。在决定货币区域的最佳规模时，应将这些因素充分考虑进去。蒙代尔指出共同货币的优点在于降低贸易的交易费用，减少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促进区内国家的生产专业化，区内贸易和区内投资，进而刺激区内国家的生产专业化。主要缺点在于当需求变动要求缩减这个货币区的真实工资时，保持就业是很困难的。按照蒙代尔的说法，最重要的在于劳动的高度流动性，劳动流动性将消除贬值的需要，不用变动相对价格来消除需求变动。

要素自由流动、汇率统一、经济政策彼此协调，最适度货币区的这三大支柱为欧洲建立货币联盟，统一货币奠定了理论

基础。蒙代尔一直致力于帮助欧洲建立统一货币，作为欧洲经济顾问，他参与制定了欧洲共同货币的首期计划，而他的最适度货币区理论被认为是欧元的起点。因此，蒙代尔被许多人尊称为“欧元之父”。

蒙代尔是供应学派的重要鼻祖，是里根经济学的幕后主笔。供应学派经济学的基本思想最早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美国经济学界出现，到 70 年代下半期其鼓吹者才被冠以“供应学派”的名称。众所周知，从 70 年代起，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落和凯恩斯主义的破产，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摸索替代凯恩斯主义的“新的经济学”。据美国《纽约人》杂志 1982 年发表的长篇文章介绍，供应学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最早是一个名叫罗伯特·蒙代尔的加拿大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随后经过一些经济学家的讨论、补充和发展到 70 年代末逐渐形成一套引人注目的学说。蒙代尔提出的很多经济理论和主张被里根采纳，其中关于减税的措施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多年的持续增长。



主要著作

《国际经济学》

1968 年蒙代尔发表了有代表性的专著《国际经济学》，在该书中，蒙代尔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这一模型最主要的贡献是它系统地分析了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在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分析中的重要作用，它构成了蒙代尔开放型宏观经济理论的重要基础，为在开放型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可行性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一模型得出的结论极其简单，即在固定汇率制下实行财政政策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实行货币政策是有效的。而在固定汇率制下实行货币政策和在浮动汇率制下实行财政政策则是无效

的。它实际上强调了稳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和货币制度（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这意味着一国货币当局既要维持汇率的固定、保持资本的自由流动，又要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实现国内政策目标是不可能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实际上告诉人们，在汇率稳定、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存在着“三元悖论”也就是说在开放型经济中，一国只能实现其中一个或两个目标，而不可能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陈璐）